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挑戰：

瑞典、加拿大與臺灣經驗

The Form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The Experiences of Sweden, Canada and Taiwan

吳鵬飛

Peng-Fei Wu

指導教授：黃長玲 博士、廖小娟 博士

Advisors: Chang-Ling Huang, Ph. D、

Hsiao-Chuan Liao, Ph. D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July, 2023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挑戰：

瑞典、加拿大與臺灣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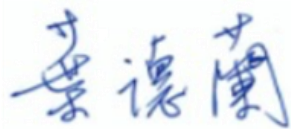
The Formations and Challenges of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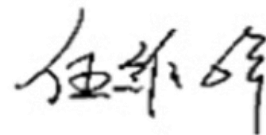
The Experiences of Sweden, Canada and Taiwan

本論文係 吳鵬飛 君（學號：R07322010）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12 年 7 月 3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簽名)

(指導教授)





## 誌謝

前進、後退，又原地踏步，或許在念碩士以前的生涯太過順遂，才導致進入政治碩班後過得跌跌撞撞，但也因此經歷人生更多的面向、擔任更多的角色、發展更多的經驗，同時遇到更多的人、看到更廣的世界、擁有更深邃的回憶與感受。包含休學一年在工作與陪伴家人的五年碩士生涯，雖然只修了二十幾個學分、寫了一篇碩士論文、發表過兩次研討會論文，但做過的事情以及留下的足跡還是比想像中多太多了！

回顧 2017 年的面試中，對面坐著三位國際關係學的生理男性教授，我堅定地說著我要做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研究，最大的理由就是我認為這是讓社會變得更好的一個有效途徑，因為我相信「我們需要有勇氣讓世界變得更良善，而具有同理心的人際乃至國際關係就顯得格外重要。」當然在入學之後開始走這條路就發現它非常的艱難，除了中文文獻較為稀少外，也很難發想研究領域與題目，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直至 2020 年才決定的方向，另外因 2018 年擔任台大管學生指揮、2019 年投身選舉工作、2020 年到國際特赦組織實習、2021 年轉為組織正職、2022 年到彩虹平權大平台做短期工作，這段期間也擔任了小娟老師的課程助教與行政助理、幫貞慧老師做了短期的研究、擔任新北市西區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的講師等，還有 2020 年開始經營社群並於三年內積累 1.7 萬個追蹤者、承接商業案件或互惠合作，更因雙親長時間不在臺灣而負擔許多家務，儘管曾獲頒台大優秀青年與利他獎，但在多重身分與工作之下，學術人生走得非常顛簸。然而或許也因為在這個學生身分的庇蔭與實務工作的交織下，更能從容地經營與維護每段我重視的關係，並充分地學術、職業與多重角色中經驗這個世界。

所以感謝的人真的太多太多。學術上提供專業又清晰建議的長玲老師是最感恩的對象，每次對談都會找到自己很多沒意識到的問題與盲區，在富含性別知識與研究內涵的指教下，讓原本雜亂的文句變得更圓滑又引人興趣，更充實了研究深度與相關論述；而心理上（或工作機會上）提供支持與協助的小娟老師也是很感恩的對象，每次討論都可以舒服自在地表達自己的困境與問題，並得到實用的回應與作法，從大學以來也一路支持我的決定並時時關懷，很幸運這六年的時光能有老師陪伴！最後也非常感謝德蘭老師與維婷老師擔任口試委員，在這冷門的領域能有兩

位性別領域的專家學者提點與指教，分享臺灣性別政策推動的個人經驗，真的為我在研究上提供相當寶貴的建議，讓我在最後修正時有更明確的方向，使論文更加完整，也才有更多政策倡議與推動的可能。

除此之外，也很感謝家人這幾年的支持與協助，尤其感謝雙親盡量照顧到我的心緒而不去施加壓力，並持續提供各方面的協助，在美國的那段日子，是這幾年來最放鬆與自在的時光，也很謝謝阿公在這幾年的歲月裡一直拉著我的手、聽我講著破臺語，讓我可以陪伴你走過最後這條安詳小徑，並持續照亮每個夜裡返家的路；感謝豬女團的各位，柏翔、劉恆、孫杰、鉅昇與晟豪的心理支持是最大的力量，也是共享蕭貪撒幣與碎念喜悅的好夥伴；感謝包含「兩週一次」、「幸福三小女人」、「呃」在內的大學同學，尤其是定期與筠潔、文怡、漢祥見面，或是與芳禾、祥鈺聊聊抒發感受，都能夠在學術苦海裡找到更多的光，也因為我們擁有同理心的培養經驗與學術上對結構論的認知，有些論述與關係議題只有你們更能理解與感受；感謝在民進黨、國際特赦組織、彩虹平權大平台、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認識的大家，特別是幼祺、忠毅與千加，實踐理想的路途上能有夥伴一起，是發展勇氣的強大力量，也期許能繼續帶著這份倡議動能，堅定自己的立場與價值；感謝台大管、台大交與建校的各位朋友，包含聖硯、柏睿、大閎、智翔在內等人，日常壓力之下透過音樂維持連結以及享有團練後的碎念時光，真的協助我舒展身心與調整步調；感謝「麻辣鍋團」、「上山下海」以及所有經營社群而認識的親，尤其是仲仁、長逸、浩翔、俊沅等人，不僅帶我看見更大的世界，也讓我發掘與喜歡自己更多面向。

女性主義有很多流派，都認為要去證實這世界的不公平並改變，它或許就是帶有一種規範性的道德價值，也因此沒有人有責任，但我們有選擇，可以選擇去改變它，當社會變得更好的時候，每個人也會從中受益，而選擇也需要勇氣，希望透過這幾年的學術與實務經驗，為我發展出足夠的勇氣與力量，能讓我繼續地選擇善良、繼續地堅定女性主義的立場。

畢竟，我想做一個溫柔而上進的人。

吳鵬飛

2023年7月7日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613 研究室

## 摘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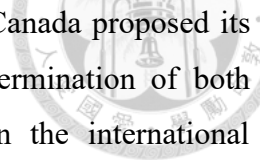
2014 年瑞典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加拿大於 2017 年跟進提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其展現了兩國在國際社會上欲透過外交行動來促進性別平等的決心，然兩國在政策目標與側重面向上有明顯的差異，瑞典重視性別平等、而加拿大則重視經濟賦權，此形塑了本文的問題意識，欲透過國內政治因素來分析使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不同的原因為何，分別從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層次進行探討，涵蓋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政黨、援外組織與公民團體聯盟等五個面向，並以個案研究法與比較外交政策來進行分析，同時兼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於臺灣推行的挑戰。

研究結果發現，使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不同的主要因素乃行動者層次中的關鍵政策領導人，其主導了政策的目標設定與注重面向，而在比較中可以發現瑞典案例中為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加拿大案例中為總理杜魯道，分別透過自身生平經驗、價值觀、重視議題與主導目的來影響政策的走向，也體現在其自傳與不同場合的演講或公開聲明中。另外本文也發現了對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的次要原因，比較後可以發現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層次亦有影響力，但在兩國的作用力不同，瑞典案例中公民社會層次透過實際的倡議行動改變了後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行動措施，而加拿大案例中制度層次則體現了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承接過往援外組織側重方向，擁有幾乎一致的目標設定。

最後，本文在分析與比較臺灣國內政治因素後，認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符合當前政府的踏實外交政策主軸，而本國過往的性別平等經驗可以為政策提供基礎，進一步強化國際連結與良善國家形象，然儘管國家領導人蔡英文對於性別平等有所關注，臺灣在推動政策上仍面臨不少挑戰，除了總統與外交部長對「女性主義」價值缺乏論述，受限於臺灣外交困境之下，制度層次中援外組織亦缺乏性別平等廣泛行動的經驗、公民社會層次缺乏對議題的關注，提升了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成本，因此臺灣在國內政治層面上仍有相當的改善空間。

關鍵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瑞典；加拿大；臺灣；國內政治

## Abstract



Sweden proposed it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 2014, while Canada proposed it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id Policy in 2017, demonstrat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both countries to promote gender equality through foreign a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the two countries have distinct differences in policy objectives and priorities. On the one hand, Sweden places emphasis on gender equality,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Canada emphasizes economic empowerment. These varying points of focus shapes the underlying question of this study, which examines the domestic dimensions to analyze the reasons for the differences in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analysis covers three levels: actors, institutions, and civil society. Furthermore, it encompasses five factors: national leaders, foreign ministers, political parties,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and alliances of civil society groups. The analysis is conducted through case studies and a comparative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ies while discussing the challenges faced in implementing the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 Taiwa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key factor leading to the differences of formations in both countries'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lies in the level of actors, particularly the influential policy makers, who shape the policy orientation and priorities. In the case of Sweden, Foreign Minister Margot Wallström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while in the case of Canada, it was Prime Minister Justin Trudeau.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values, and priorities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of the policies, reflected in their biographies, speeches, and public statements. Additionally, the study identifies the secondary factors that influenced both countries'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found that, in both countries, institutions and civil society also play a role,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influence. In the case of Sweden, the alliances of civil society groups exerted influence through advocacy that changed subsequent measures in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In Canada's case, the analysis of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reflected that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id policy inherited the focus of previous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resulting in almost identical policy objectives.

At the end, after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aiwan's domestic dimension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ligns with the current government's foreign policy. Taiwan's experiences in gender equality provide a foundation for such policy and further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s or foster a positive image of the country. However, despite President Tsai Ing-wen's concern for gender equality, several challenges remain in promoting related policies.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a lack of discourse on “feminism” by the President or Foreign Minister, limitations imposed by Taiwan's diplomatic situation, a lack of experience in extensive action on gender equality within foreign aid organizations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a lack of attention to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t the civil society level. These factors increase the cost of promoting feminist foreign policies and indicate considerable room for improvement within Taiwan’s domestic con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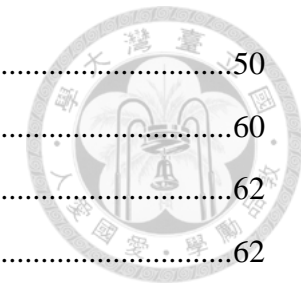
Key Words: Feminism; Foreign Policy;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Sweden; Canada; Taiwan; Domestic Politics

# 目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	i
誌謝 .....	ii
中文摘要 .....	iv
英文摘要 .....	v
第一章 緒論 .....	1
壹、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	1
一、問題意識 .....	1
二、研究重要性 .....	2
貳、文獻回顧與分析 .....	4
一、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定義與內涵 .....	4
二、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與特質 .....	6
三、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與特質 .....	9
四、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比較 .....	11
五、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 .....	14
六、理論基礎與對話：國家女性主義 .....	17
參、研究設計 .....	19
一、研究架構與操作 .....	19
二、個案選擇 .....	22
三、研究方法 .....	24
四、研究假設 .....	25
五、研究資料 .....	25
第二章 瑞典國內政治因素分析 .....	27
壹、行動者層次 .....	29
一、國家領導人 .....	30
二、外交部長 .....	36
三、政黨 .....	42
貳、制度層次 .....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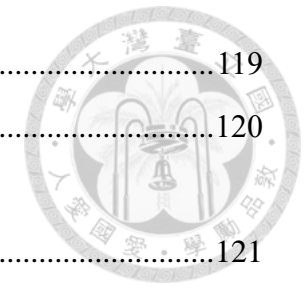
參、公民社會層次 .....	50
第三章 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分析 .....	60
壹、行動者層次 .....	62
一、國家領導人 .....	62
二、外交部長 .....	67
三、政黨 .....	71
貳、制度層次 .....	74
參、公民社會層次 .....	78
第四章 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挑戰與國際比較 .....	83
壹、行動者層次 .....	85
一、國家領導人 .....	85
二、外交部長 .....	90
三、政黨 .....	94
貳、制度層次 .....	96
參、公民社會層次 .....	97
肆、國際比較 .....	101
一、行動者層次 .....	101
(一) 國家領導人 .....	101
(二) 外交部長 .....	103
(三) 政黨 .....	105
二、制度層次 .....	107
三、公民社會層次 .....	109
四、小結 .....	110
第五章 結論 .....	113
壹、研究結果 .....	113
一、領導人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	113
二、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	114
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國家女性主義 .....	116
四、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挑戰 .....	117
貳、研究限制與建議 .....	118



一、拓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觀點與國家比較.....	119
二、臺灣社會與政策的發展方向.....	120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121
英文文獻.....	128



## 圖表目錄



### 圖目錄

圖 1-1、研究架構圖.....	20
圖 5-1、國內政治因素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關係.....	116

### 表目錄

表 1-1、研究架構與操作.....	22
表 2-1、洛夫文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33
表 2-2、瓦爾斯特倫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38
表 3-1、杜魯道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64
表 3-2、方慧蘭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69
表 4-1、蔡英文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87
表 4-2、吳釗燮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92
表 4-3、臺灣公民社會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期刊論述.....	99
表 4-4、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國家領導人比較.....	102
表 4-5、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外交部長比較.....	103
表 4-6、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政黨比較.....	105
表 4-7、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援外組織比較.....	107
表 4-8、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民間組織反應比較.....	109




# 第一章 緒論

## 壹、研究問題與重要性

### 一、問題意識

2014 年瑞典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 (Margot Wallström) 提出歷史上第一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Feminist Foreign Policy)，核心概念強調性別平等乃瑞典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也是發展對外行動的原則，以此確保女性享有基本人權、對抗全球的父權體制、反對制度性且普遍化的女性次等地位問題，且瑞典政府相信此政策亦為達到其他國家目標的有效途徑，如消滅恐怖主義、促進經濟成長、改善民眾健康等。而 2017 年加拿大提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指出加拿大身為全球社群的一份子，將透過援助他國以支持性別平等、賦權女性，如此將能強化自身的安全與繁榮，更可以建立和平、包容的社會，使所有人受益。至 2018 年，瑞典進一步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Handbook on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向女性權益團體、媒體以及他國政府展示瑞典推廣全球婦女權益的理念，手冊內容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一種工作方法和觀點，以三個 R 為主要工作方向，分別為 Rights(權利)、Representation(代表性)、Resource(資源)，並行伸出具體行動措施，包含維護免於生理、心理與性暴力的自由、預防與解決衝突的女性參與、和平建立的女性參與、社會各層面的女性政治參與、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促進與保障等。同年英國工黨表示開始研擬女性主義發展政策、英國婦女平等黨表達支持採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至 2019 年，法國、盧森堡、墨西哥表示願意採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意圖。而這些國家的行動，也成為本文的問題意識：為何在父權外交政策仍當道的國際社會中，該國願意採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方向呢？

自瑞典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至今，相較於其他類型的外交政策實踐經驗時間仍不長，因此這類型外交政策的文獻也不多。以在臺灣所發行的期刊為例，最為直接相關的文獻為《國際性別通訊》中的三篇，分別為〈想像一個更平等的世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同志觀點〉(陳乃嘉，2020)、〈女性主義是潮牌嗎？淺談瑞典



與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顏詩怡, 2020)、〈全球性別平等運動新時刻及我國參與策略〉(張琬琪, 2020), 三篇文章主要介紹了瑞典與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包含內容、挑戰與困境等, 同時述及對臺灣的啟示、機會與可能性, 理解帶來實際的改變為何。而在國際上的研究則多著重在探討單一國家發展過程、背景、評估等, 對於國與國之間的比較或發展因素分析較為稀缺, 其中 Thomson (2020a) 的研究比較了兩國外交政策的目的與內容, 指出即便同是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在側重面向與目標設定上, 瑞典重視性別平等, 加拿大則重視經濟賦權。但為何會產生不同方針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呢? 是什麼影響因素使得兩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差異?

因此本文希冀找出使瑞典與加拿大發展出重視不同面向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因素為何。然而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因素繁多, 舉凡從個人層面的領導者、意見領袖, 到政府層面的官僚體系、政黨政治, 或社會層面的文化、歷史、社會運動, 乃至國際層面的國際壓力、國家間互動、國際組織意見, 都有可能對國家的外交政策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本文將焦點置放在國內政治的影響因素, 以期能找出兩國政治體制與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聯, 如此不僅可以分析與比較最早以女性主義直接命名外交政策的兩個國家, 充實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資料與探討, 更可以探索兩國之間的國內政治因素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 並解釋使兩國發展出重視不同面向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內因素為何。另外為促進外交政策的女性權益倡議, 本文將分析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的挑戰, 並與瑞典、加拿大的經驗進行國際比較, 理解國內政治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 希望藉此為臺灣社會之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提供不同視野, 促進政策的多元想像與對父權體制的反思。

綜上所述, 本文研究問題如下:

- (一) 瑞典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形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 (二) 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形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 (三) 臺灣在國內政治層面上的挑戰與兩國形成經驗有什麼異同?

## 二、研究重要性

本文使用女性主義的研究觀點, 拓展了過往傳統國際關係對安全的定義, 以期能關注到更廣泛的平等, 同時更期許透過外交政策方面的性別研究, 解決該領域缺

乏性別關懷的問題。傳統國際關係學者，特別是現實主義者，主要以國家安全的角度來定義安全，即一個安全的國家，是一個能夠保護它的實體國界免於無政府國際體系侵害的國家，因此國家會尋求權力與軍事，皆是為了促進其安全的方式。然而從 1980 年代開始部分國際關係學者對於這些安全解釋提出質疑，其中女性主義者以多面向與多層次的角度來廣泛定義安全，像是減少包含有形、結構或生態上在內的所有類型暴力，同時也提出安全威脅包括家庭暴力、強暴、性別從屬的毀滅等，(Tickner & Sjoberg, 2010/2013)；而從女性主義觀點關注的國際關係重視全體人類的安全，層次、面向與內涵上更為豐富，涵蓋傳統與非傳統安全議題 (譚偉恩, 2007)。

而國際關係中的女性主義理論，則是批判男性主導了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認為主流國際關係討論的安全、戰爭、主權等富含了陽剛氣質，缺乏對於女性角色的參與，且貶抑陰柔氣質。在 1980 年代中期後，陸續有女性主義學者以性別做為主要觀點著書來探討國際關係議題，強調性別是一個分析範疇，需特別關注符號、語言、文化、各種再現以及檢視一系列抽象概念如權力、安全、理性、暴力等，藉此凸顯性別層級秩序之內容與各種深遠影響 (黃競涓, 2011)，思考社會生活如何成為性別化的產物。在外交政策研究方面，其也被視為一個以男性規範和邏輯為主的領域 (K. Aggestam et al., 2019)。學界雖然對聯合國安理會關於女性、和平與安全的第 1325 號決議<sup>1</sup>進行了大量研究，但對性別在外交政策中作用的研究則較為稀少 (Davies & True, 2017)。

另一部分，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的提升將可以為社會帶來諸多正面效益，因此透過相關研究倡議平等實踐，亦可促進社會繁榮、安全與穩定和平的發展。如經濟部分，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在 2015 年的報告中指出，透過促進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在模型的理想條件下，至 2025 年時，全球 GDP 可以增加 12 兆美元 (Woetzel et al., 2015)；衝突解決與和平方面，O'Reilly 等學者分析自 1989 年以來簽署的 181 項和平協議，指出當女性作為簽署人、調解人或參與和平進程時，最終達成協議的

---

<sup>1</sup> 第 1325 號決議文在 2000 年 10 月 31 日於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上通過，該決議關切武裝衝突中的受害者以及負面影響，尤其是戰鬥人員與武裝份子對婦女與兒童的迫害，將可能衝擊可持續和平與社會和解。決議文重申了女性在預防和衝突解決、和平建設的重要作用，強調女性平等參與和平促進與安全工作的重要性，各國須充分執行在衝突中、衝突後保護女性權利的國際人道主義與人權法，以促進可持續性的國際和平與安全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2000)。

可能性會提高 35% (O' Reilly et al., 2015)。另外，性別平等程度越高，國家之間或國家內部的衝突傾向就越低，較不會使用軍事力量解決國際爭端 (Caprioli, 2005; Hudson et al., 2008/09)。而提升維和部隊方面的女性參與與性別平衡，也可減少性剝削和性虐待的風險 (Karim & Beardsley, 2016)；且當女性人數占立法機構 35% 以上時，國家政治穩定度會有所提升，內戰衝突復發的風險趨近於零，若女性沒有代表席位，復發風險將會隨著時間增加 (DeMeritt et al., 2015)。

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的議題在不管是國際關係或外交政策領域都有其重要性，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目標便是促進性別平等、女性賦權，以期待更為和平與安全的社會。本文在女性主義理論的基礎上，探討由此觀點出發的外交政策，透過比較瑞典與加拿大的發展，試圖找出何種國內政治因素促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及側重不同面向的原因，以供其他國家或公民社會作政策理解與參考，一同參與平權促進的工程，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更多國家內發酵，並透過此研究補充學界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探索，在實務上讓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有脈絡可循。

## 貳、文獻回顧與分析

本研究比較瑞典與加拿大的國內政治因素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經驗，以及理解重視不同面向的原因，首先將分別回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基本論述、概念與意涵，以及瑞典與加拿大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相關文獻，探討文獻提出可能影響兩國政策的因素為何，最後則是歸納學者於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影響的研究以及理論基礎，形塑本文的研究架構。

### 一、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定義與內涵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針對問題為女性受父權體制壓迫之事實與狀況；政策目的為對抗父權體制、解放女性之壓迫與從屬地位、促進性別平等，其中涉及一連串與他國互動、交涉或不作為的策略與行動，但最終結果皆是指向解決女性受壓迫之問題。依據 L. Thompson 與 Clement (2019) 的定義，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為一種優先考慮性別平等的國家政策，透過與其他國家或社群的互動，關注女性與其他邊緣群體的人權、分配資源、批判父權體制和男性主導的權力結構。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心 (Centre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指出該政策是一個框架，關注邊緣社群的

日常經驗，提供對全球議題更廣泛與深入的分析，與傳統外交政策思維不同，其從最邊緣的角度提出了對安全的交織性思考，側重於軍事、暴力和統治等領域(Centre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n.d.)。經由探討女性和邊緣群體的經驗，可以審查父權體制、資本主義、種族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壓迫與暴力，研究中心亦指出，女性主義觀點在學術研究的領域比政策實踐更為豐富，因此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可以提供一個政策實踐的途徑，來實踐女性主義關注之議題與訴求性別平等(Centre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n.d.)。

K. Aggestam 及 Rosamond (2016) 強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道德性，以「女性主義」來命名外交政策，與過往的外交政策有明顯的區隔，標誌著從傳統菁英取向的外交政策實踐，轉向了以規範和道德原則為指導的政策框架，乃全球正義與和平的國際社群規範所建立。L. Thompson (2020) 也論述使用「女性主義」一詞乃是一種重要宣告，表明政府欲採取更具變革性與交織性的方法來促進性別平等與包容，核心概念注重權力關係的改變，而非僅僅提升一些女性的地位。不過女性主義有不同的派別與分支，所以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沒有通用於全球的定義，也使其在制定與運作上充滿彈性，透過當地的脈絡、文化與戰略等，探求屬於自身的樣態，以最適應的方式來實現政策承諾。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目的，乃分析聚焦於性別歧視、不平等、暴力以及對婦女和其他邊緣社群的忽視，並透過國家政府力量加以實踐與扭轉(K. Aggestam et al., 2019)。從理論上論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意圖與目的上都是道德的，並指出現今的道德外交政策和國際行為缺乏性別觀點，且政治的分析觀點狹隘、分析主體經常局限於國家層次，而此種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框架乃根源於父權體制的壓迫結構，將不利於促進女性主義的道德議程(K. Aggestam et al., 2019)。

Thomson (2020a) 則關注女性主義的概念在瑞典與加拿大的外交政策意涵，指出前者將其集中在國內和國際的承諾改變上，關懷性別不平等的議題；而後者則更重視私部門領域，即賦予婦女經濟自主權利。


綜上所述，學界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沒有統一定義與具體內容，且內容意涵與各國家實施狀況會有所差異，對彼此試圖解決的政策核心問題有不同看法。其與女性、和平與安全議程(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Agenda, WPS)不同，各國並未特別商定相關文本、決策或條約作為制定政策的基礎，相反的，採用女性主義一

詞來描述他們的外交政策，在這些國家如何理解這個詞以及他們選擇透過它來側重什麼面向，都擁有相當的靈活性（Thomson, 2020b）。

雖然各學者關注內容不同，但仍可歸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備以下三點特質：第一，女性主義的觀點承認了世界上的不平等問題，不僅在性別層面，也發生在族群、地區、經濟等層面；第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傳統外交方式不同，不再固執於國家為中心的思考模式，形塑一個更具有國際主義色彩與道德的政策實踐；第三，政策著重於與本國以外的社群之互動，不僅包含其他國家，也包含其他社群、團體、私部門等。而此對臺灣現行主流外交政策的意義，即是拓展外交政策的範圍，以更彈性、多元、多邊的方式來參與國際事務，並解決全人類共同所面對之問題。

## 二、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與特質


不同國家發展出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都有其特質，瑞典方面則具有相當的道德概念與實用性，象徵了對過往傳統外交的關懷擴展與轉向。K. Aggestam 及 Rosamond 在 2016 年的研究中指出，此外交政策含有規範性的重新導向，指導方針乃以道德為基礎的框架，與廣泛的全球正義與和平連結在一起，表示願意在全球政治中，站在與父權體制的對立面，關注不同群體或國際社會中其他邊緣群體的獨特需求。另外，K. Aggestam 及 Rosamond (2019) 說明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既是道德行為，又具有實用主義的體現，但也可能引發政策矛盾和緊張局勢，如瑞典提倡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政府卻持續向那些女性未受政府保障的國家出口武器，為政策帶來爭議。不過，即使面臨這些批評與疑慮，學者仍說明外交政策的實踐是透過廣泛政治立場上的各種選擇和妥協來實現，合乎道德的外交政策行為並不意味著消滅國家利益，而是要在考量到他人需求的情況下進行調解，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婦女和其他邊緣群體經常成為政策行為的目標。而瑞典強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有一種對傳統的批判與轉變，此政策使用「Feminist」一字，將政治從廣泛受到認同與支持的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取向提升至更具爭議性的政治，其強調挑戰權力層級制度，更是一種外交政策的規範性重新定位（K. Aggestam & Rosamond, 2016, 2018）。瑞典宣布獨特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標誌著背離了傳統的、精英的外交政策，轉向了以規範和道德原則為指導的政策框架，不僅是前所未有，也具有相當開創性（K. Aggestam & Rosamond, 2018）。



而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乃在過往對 WPS 等國際承諾與國家自我認同的脈絡下，所延伸出更堅定的政策立場。此政策受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關於 WPS 議程的第 1325 號決議文所影響，瑞典透過將性別平等置於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中心，來重塑其外交政策與實踐相關理念 (K. Aggestam & Rosamond, 2016, 2018)。Thomson (2020a) 也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出現，與各國促進政策制定更加性別平等的長期實踐有相當地關聯，如設立婦女部、性別主流化、性別配額等，而瑞典一直是 WPS 議程的堅定支持者，亦是最早制定行動計劃的國家之一，在現有努力的基礎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本身成為一項政策議程。另外政策受到國家內部文化的影響，致力於國內外的性別平等不僅延續瑞典傳統的平權關懷，也強化瑞典作為良好國際主義或性別世界主義國家的自我認同，促進相關政策的推動力道 (K. Aggestam et al., 2019)。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代表了瑞典長期立志成為世界政治的規範力量，並在性別平等實踐上走在前端、成為其他人效仿的榜樣，藉此促進婦女參與和平進程、倡導婦女權利作為人權，並努力實現更加性別敏感和公平的資源分配 (K. Aggestam & Rosamond, 2016)。因此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亦建立在長期穩定的自我敘事基礎上，該敘事由性別正義定義，強調女性及其他邊緣化群體的保護不應受國界的束縛，而這種自我敘事根植於瑞典作為「道德超級大國」的國家身份，此認同與其悠久的社會民主脈絡、對公民和非公民的雙重福利承諾密切相關 (K. Aggestam & Rosamond, 2018, 2019)；Rosamond (2020) 也強調國家女性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社會與政治基礎對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帶來的影響，並連結到其長期的社會民主遺緒和國際主義傳統，儘管自 1990 年開始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但國家政府仍然於平權工作中投入許多心力。

國際事務上，瑞典亦長期積極的追求全球的和平、穩定與人權發展 (Goldmann, 1991；吳振達，2018)。包括批判霸權的傳統，如越戰期間批判美國、21 世紀初批判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非法占領及屯墾區的非法暴力與衝突等，讓瑞典成為民主國家中最富正義價值理念者，而其國際主義表現出來對於正義與平等的追求，乃受到國家歷史經驗與社會固有模式之影響，表現在對外政策與作為 (Bergman, 2007)。瑞典也積極透過保持獨立且強大的國防武力與對中立的完全支持來避免參與任何可能的軍事與政治聯盟，以維持安全與和平地位 (L. Aggestam, 2001；吳振達，2018)。



也有學者認為瑞典外交政策深受北歐模式的影響，該模式指涉北歐國家基於共同理念選擇中立政策，發展出小卻有競爭力、重視和平、共識型政治、社會福利、安全的國家類型，以福利制度理念與團結概念（Solidarity）為基礎，在國際層次利用國內政治、經濟制度理念邏輯作為行為指標（Østergård, 1997）。Kuisma（2007）指出需從國內社會、經濟制度模式來理解瑞典對外政策邏輯，北歐模式的存在並非解決特定的政策問題，而是在意識形態與理念上發展出北歐獨特的政策邏輯，體現在主張正義、團結、公平等國際關係概念。

而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體內容透過三個 R 來表達政策實踐與方向，分別對應到六個面向：充分享有人權、免於身體心理和性暴力的自由、參與預防和衝突解決及衝突後的和平建立、在社會所有領域的政治參與及影響、經濟權利和賦權、性與生殖健康的權利（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 n.d.a, n.d.b）。近年瑞典也開始推動第四個 R，即研究（Research）的概念，將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更深度的研究與事實查核，以明確指出外交政策對於問題解決的效用與倡議效果（K. Aggestam & Rosamond, 2019）。Thomson（2020b）進一步指出，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提出了一個清晰的架構、框架和方法，可以透過相關作為實現目標，在「權利」方面，側重於瑞典先前對國際人權公約的承諾以及在國際組織中的成員身份，包含聯合國人權宣言、各種公約、1325 號決議、日內瓦公約、歐盟條約、各項歐盟行動性別平等計劃。在「代表性」方面，該政策強調外交部將促進婦女在各級決策中的參與和影響，藉由外交部門與歐盟、其他國家和區域組織合作來實施這一點。在「資源」方面，則注重財務與人力資源的分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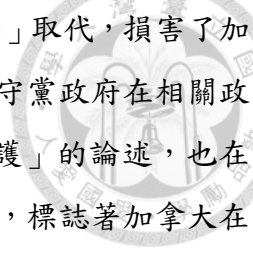
然而瑞典在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也面臨一些批評與困境。包含政府發起的許多非政治化政策倡議中，常將性別和婦女混為一談，使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實踐上，常常產生矛盾或歧異，或讓人不清楚到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以往的性別平等政策的差異與特質為何（K. Aggestam et al., 2019）；另一份針對歐盟會員國對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意見調查研究更指出，雖然多數受訪者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持肯定態度，也認同瑞典是促進性別規範的領導者，但在某些國家或地區，許多政治家或政府官員認為以「feminist」命名容易引起負面反應，並指出女性主義的概念似乎極具爭議，且相信即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對瑞典的國際形象產生積極影響，也不會有其他國家效仿，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抬頭的情況下，當前的局勢

並不適合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使瑞典在該領域作為領導者的角色受到質疑 (Sundström & Elgström, 2019)。除此之外，女性主義內部亦存在許多流派與論述，不同流派之間所關注的議題與倡議方式亦有所不同，也使得在使用「女性主義」一詞上，存在許多樣貌與多元性 (顧燕翎, 2000)，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屬何種流派則未見於政府聲明中。

### 三、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與特質

加拿大長期在國際中推動平等的行動與形塑的國際主義，促進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自 1970 年代，該國即存在著長期且深入的、以婦女平等和兩性平等為重點的話語規範，始於前加拿大國際開發署 (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 1976 年通過的《婦女參與發展準則》(Women in Development, WID)、於 1984 年成立了 WID 理事會 (Swiss & Barry, 2017)。這些行動與規範促進女性人權成為加拿大的核心外交政策優先事項，包含承諾透過憲法促進對外行動中的性別平等政策、制度實踐、國際條約、集會和外交話語等，皆證實婦女權利在加拿大外交政策目標中的重要性 (Tiessen, 2015)。此政策和體制反應促使加拿大成為將性別問題作為國際發展中心的先驅，與當時加拿大慷慨的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捐助者形象一致，反映加拿大的國際主義，促進全球機制、規範、人道主義、自由權利倫理 (Smith, 2003)。而加拿大一直希望成為全球政治中的道德領導，其形塑的形象至今仍受到強調 (Tiessen & Carrier, 2015)。

除了奠基於過往國際主義的政策傾向，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也受到總理以及與美國的關係所影響。Brodie (2008) 指出，在過去約二十年裡加拿大國內和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與美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差異，如同性婚姻、健保、大麻合法化、支持建立國際刑事法院、拒絕參加 2003 年對伊拉克戰爭的初次入侵等，呈現出比美國更為自由的形象。而杜魯道 (Justin Trudeau) 在其執政黨領導時期，也與前總理哈珀 (Stephen Harper)、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 在性別、難民議題上保持距離，如難民政策中承諾接納美國禁止敘利亞難民，顯現出加拿大的形象重塑與擴張，乃美國在全球場域實力下降的回應 (Parisi, 2020)。Tiessen 及 Carrier (2015)、D. Lee (2018) 則表達執政黨與總理輪替後的重要轉變，2006 年保守黨 (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當選為國會多數黨，在前總理哈珀領導下，性別平等政策的討論



都被嚴重削弱，國際發展領域中性別平等的概念也被「男女平等」取代，損害了加拿大作為性別平等領導者的聲譽；Tiessen (2015) 則強調哈珀保守黨政府在相關政策中，許多指導計劃倡議的重要文件都存在「女性脆弱須被保護」的論述，也在2009年時，將政策內部語言從「性別平等」轉變為「男女平等」，標誌著加拿大在哈珀保守黨領導下，偏離了促進性別平等的承諾。至2015年，在杜魯道的領導下推動許多性別平等政策，而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屬於性別平等政策的一環，乃於國內政治層面對過去的翻轉，自由黨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相對保守黨更為積極承認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而此外交政策的出現，也顯現對加拿大性別平等傳統的重新承諾，並否認保守派對女性主義理想的攻擊 (D. Lee, 2018; Leblond & Fabian, 2017; Tiessen & Swan, 2018)。政黨輪替後的加拿大在杜魯道帶領下，實施了許多性別平權政策與女性主義的關懷，包含2015年上任時，任命女性擔任加拿大聯邦內閣中一半的職位，表明性別平等是加拿大政府的核心價值觀，另外在其言論中，也公開自稱為女性主義者，呼籲國家社會與國際社群促進人權、女性權能和性別平等 (Tiessen & Carrier, 2015)。

而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內容，則著重在六個行動領域，包含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人類尊嚴、惠及所有人的成長、環境和氣候行動、涵容性治理、和平與安全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a)。同時政策指出女性可以成為重要的變革推動者，促進強勁的經濟成長、鼓勵和平發展與合作、改善家庭與社群的生活，並實踐減少貧困和不平等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a)。而該國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特色則在於強化與私部門的合作與互動，Thomson (2020b) 指出加拿大政策透過此合作機制，使私部門目前的服務提供者角色轉變為實踐發展成果合作夥伴的投資者，但政府對於私部門如何有助於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並未明確的解釋與說明。

而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面臨的批評為以下三點：首先，相關用語的定義不明與聯結不足，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透過將性別平等和賦予婦女、女孩權能作為核心行動領域，標誌著明確採用「性別平等」一詞的回歸，儘管這種相對於哈珀政府的轉變是積極必要的，因「性別平等」在哈珀政府的官方國際發展話語中被抹去，使得相關政策與女性權益議題被弱化，但杜魯道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沒有對女性主義、性別平等或賦權進行明確定義，而這種理論不足和缺乏特殊性


引起女性主義學者和實踐者的關注 (Mason, 2019)，另外，該政策對女性主義的闡述強調交織性歧視和排斥的概念，論述翻轉社會規範、權力關係、機會均等的必要性，但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並未充分利用交織性框架，與交織性理論幾乎沒有聯繫，使該概念被批評為一種流行用語 (Mason, 2019)。第二點，該政策強調經濟賦權而非邊緣群體的解放，Parisi (2020) 指出此政策的人權途徑並非基於需求的方法來為特定群體提供資源和服務，而是強調最貧窮群體的人權。D. Lee (2018) 認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應在安全性、權力和執行的概念上具有深刻的變革，但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在體現相關變革的潛力是相當薄弱的。第三，在與私部門的合作與運作上，被認為未提供相關的機制與責信制度 (Brown & Swiss, 2018)。

#### 四、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比較

Thomson (2020a, 2020b) 比較瑞典和加拿大的外交政策文件，並著重「feminist」一詞對兩國外交政策而言的意義及意涵為何。首先，她認為在問題層面中，瑞典外交和發展政策的中心問題是系統的性別不平等，認為全球社會問題源自性別間力量的不平衡；而加拿大對中心問題的描述較廣泛，其中討論的問題連結到經濟貧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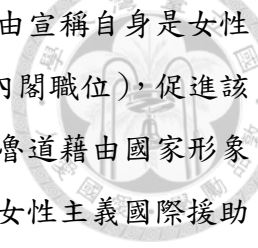
在目標層面，Thomson (2020b) 指出瑞典的政策目的為性別平等，置於核心位置；加拿大則是消除貧困、建立一個更和平、更包容與繁榮的世界，而性別平等及賦權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有效途徑，Thomson (2020b) 認為此未從根本上理解到性別不平等是國際社會的核心問題，貧困本身就是無性別觀念的。再從兩國的政策文件比較，瑞典將系統性性別不平等視為一個問題，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一個解決方案；加拿大則將貧困視為問題，將性別平等視為解決方法。因此，與加拿大相比，性別不平等在瑞典的全球不平等論述中有著更重要的地位；加拿大政策則將女性賦權視作消除貧困的有效方法。Parisi (2020) 也在其分析中，指出加拿大的外交政策將性別平等與新自由主義聯繫起來，強調女性融入全球政治經濟對於消除貧困的總體目標有關鍵的作用。

在政策論述上，Thomson (2020a, 2020b) 指出瑞典以可行的方法討論如何解決問題、為目標設置可操作的評估方法、將責任歸屬特定機構等，雖然有時在目標以及如何衡量其目標實現等方面也含糊不清，但加拿大文件對於如何實現其承諾更為模糊，Thomson (2020b) 認為這些行動領域缺乏相關方法、區域與定義，因



行動領域的論述本身非常廣泛，倘若解決它們的方式不清楚、沒有將特定地理區域界定為要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向，則無法清楚論述與理解政策具體內容，甚至也無法指出這些目標的責任在政府的哪個部門，抑或可能會制定哪些具體政策、與加拿大政府的國際和法律承諾有何關聯。此外，瑞典的政策也強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瑞典國內女性主義政府與政策制定的延續，也是對相關條約、機構、體制和國際自由秩序的承諾，如 WPS、歐盟規範和國際法等；而加拿大的政策文件基本上沒有提及相關法律 and 國際承諾，反之更關注於將私部門力量納入國際政策和發展工作，如政策中述及「...將增加和多樣化與私營部門合作的機制範圍...將私部門當前的服務提供者角色轉變為投資實現發展成果的合作夥伴...」（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a）。政策意義上，Thomson（2020b）歸納對於瑞典來說，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一種手段，來表明該國對構成國際自由秩序的規範和制度的承諾；對加拿大而言，該政策似乎更傾向是一種將私人利益納入國家發展政策的手段，相對於瑞典，其更大程度地依賴於一種新自由主義的詮釋，並將私部門進一步納入政策發展中。

部分研究則論述瑞典與加拿大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因素，主要從國家領導人與性別平等發展的制度與歷史脈絡進行探討。領導人方面，K. Aggestam 與 True（2020）強調了政策領導的重要性，說明沒有關鍵的女性主義領導，就不會有支持性別平等規範的外交政策變化，如瑞典的瓦爾斯特倫、加拿大的杜魯道與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等，該領導人試圖藉由倡導支持性別平等或女性主義的外交政策，在政治和國際領域中脫穎而出，並產生廣泛的追隨者，提升其於國內或國際的影響力；但學者也指出，如果該外交政策與領導人的性格聯繫太過緊密，可能無法在政府或部長更替後持續下去，或無法在外交政策體制的官僚結構中制度化。兩人於 2021 年的研究進一步指出，杜魯道與瓦爾斯特倫趁著全球政治的性別主流化歷程發展，掌握機會透過規範性的外交政策來建立國家形象（K. Aggestam, & True, 2021）。瑞典案例中，瓦爾斯特倫利用性別化的領導與象徵意義來推動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強調女性參與和平建設與經濟乃明智又有效的行動，而瑞典在擔任 2017 至 18 年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期間，政策也成為瑞典與他國互動的部分內容（K. Aggestam & True, 2021）。Nylund 等人（2022）也說明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高度依賴於女性領導—瓦爾斯特倫，藉由其經驗與關注面向來形塑政策重點，但也因政策與領導連結太深，使得該政策具有不穩定的風險，隨時都可能因為領導



離開內閣或政壇而停止推進。在加拿大的案例中，杜魯道不僅藉由宣稱自身是女性主義者、於 2015 年任命平權內閣（同等數量的男性與女性擔任內閣職位），促進該國涵容性的治理；也隨著美國在全球政治影響中的實力減弱，杜魯道藉由國家形象的建立來強化該國軟實力（Soft Power）的影響，具體作為包含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提出、將性別平等作為加拿大擔任 2018 年七國集團主席（Group of Seven, G7）的優先事項等。Tiessen 與 Smith（2022）關注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哈珀時期與杜魯道時期的不同，學者指出杜魯道對於「女性主義」一詞的使用，強化了加拿大在國際間的性別倡議，然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主要以自由主義女性主義的價值為主軸，著重關注針對女性的發展援助或是經濟機會的提供，並非挑戰導致不平等的結構性問題，且杜魯道所提出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是加拿大國內外長期承諾的延伸，雖然 2015 年在內閣政黨輪替後促成了政策上用詞的明顯轉變，同時亦強化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等方面論述，但實際變化的證據仍有待觀察。

而學者們對於兩國在性別平等制度與發展脈絡的關注中，也認為過往國家內部的平權發展提供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施行良好基礎。Nylund 等人（2022）說明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依賴於該國長期發展的性別政策支柱，過往的政策規範推廣也部分適用於目前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倡議。Rosamond（2020）認為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根植於該國國家女性主義與性別世界主義的實踐，從既有的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取向來延伸與擴展關懷議題，將規範與倡議的領域外化到過家疆界之外。Achilleos-Sarll 等學者（2023）研究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歷史，指出女性主義在不同國家的背景下有不同的意義，對瑞典而言是長達數十年國家女性主義議程的一部份（Achilleos-Sarll et al, 2023）。K. Aggestam 與 True（2021）指出瓦爾斯特倫得益於瑞典國內對性別平等與國家女性主義的廣泛與長期支持，使得其能夠在國際政治中與他國在性別議題上進行倡議。K. Aggestam 與 True（2020）更說明在不同國家的性別發展歷程中，得以透過既有的性別平等發展所建立的國家形象，促進支持性別平等的外交政策，如瑞典、挪威、加拿大，相關的政策在國內已被廣泛制度化，而外交政策則反映其在對外行動中實際執行有利於性別的規範的官僚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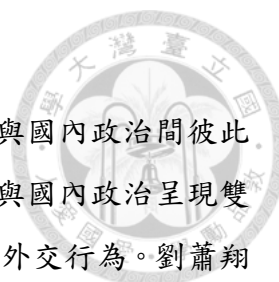
除了在領導人與國家性別平等發展的探討外，Achilleos-Sarll 等學者說明公民社會在其中並未扮演關鍵角色，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根植於國家的實踐，並由國

家政府率先創立，儘管民間社會倡議者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解上更具創新與突破，但公民社會使用該詞始於 2014 年瑞典提出該外交政策後，也才開始針對國家外交政策提出女性主義的要求 (Achilleos-Sarll et al, 2023)。與過往不同的是，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沒有以與 WPS 議程相同的方式出現，即由公民社會發起，進而透過國家政府制度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乃由國家宣布施行，形塑出不一樣的形成模式 (Achilleos-Sarll et al, 2023)。這也顯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有國家女性主義特質，由政府主導推動並成功執行。

整體來說，無論瑞典或加拿大，彼此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都受到國際發展、國內政治與文化、政策制定者等因素所影響，不過在政策目標與側重面向上，瑞典較為重視性別平等與國際承諾；後者則重視消除貧困與經濟賦權。影響因素方面，無論瑞典或加拿大，彼此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不同程度地受到國際發展、執政黨、國家道德文化、國家性別平等發展、公民社會、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等因素所影響，然是何種因素導致兩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不同的樣貌，則需進一步的探討與分析。

## 五、影響外交政策的因素

從國際體系層次來說，在瑞典與加拿大的外交文化中，Cooper (1993) 等學者指出兩國皆屬於中型國家 (Middle Power)，因此在國際場域的表現會透露出其對於多邊主義的偏好與傾向，也在國際糾紛或衝突中積極發展妥協與促進和解的能力。同時，Cooper (1993) 等學者認為中型國家指涉比強國或弱國更有智慧、更有道德、較不自私的國家，他們願意且有能力的負擔國際責任，並創造與維持國際秩序。Jordaan (2003) 主張中型國家傾向於推動世界體系的和諧與穩定，其特點是根據其所追求的政策，包括多邊主義、在紛爭中的妥協立場、對於談判處理及建立聯盟的偏好，以確保國際體系穩定發展。林宗憲 (2003) 以加拿大為案例說明，中型國家因資源與影響力不如強國，若要穩定發展與生存，需依賴和平運作的世界體系，以避免因缺乏足夠能力來面對衝突或不穩定的國際關係，所以加拿大承認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國家及國際體系的和平之間也是密切相關的，政策特徵上體現出多邊主義與國際主義之特質，面對國際問題時會積極透過尋求或發展多邊、集體模式的路徑來思考行動措施，外交政策的內涵有時也呈現出明顯的人性尊嚴考量，以促



進更高程度的和平與穩定發展。

而在劉蕭翔(2007)的文獻中指出，外交政策或國際政治常與國內政治間彼此連結、相互影響，其梳理 Gourevitch (1978) 的著作，說明國際與國內政治呈現雙向影響的關係，對外行動會形塑國內政治、而國內政治也會影響外交行為。劉蕭翔(2007)亦指出外交政策在全球化與民主化影響越來越大的發展歷程中，已不像過去冷戰時期高階政治的操作方式進行，賦予國際體系層次較高的重要性、忽略國內政治，國內政治對於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確實有影響，不過對於國內政治的因素分析，不同學者則有不同的看法。如 Kissinger (1966) 的論述中，指出影響外交決策的國內政治結構因素包括歷史傳統、社會價值、政經制度，另外也認為國家政權的型態影響外交決策過程，分為官僚務實型、意識形態型、魅力革命型，官僚務實型指涉外交政策制定受制於官僚政治的影響，正常程序下的官僚機構通常可以解決多數政策問題，但也因此缺乏彈性甚至在非正常程序中容易遇到問題與形成阻礙，主要代表為美國或西歐國家，政策取徑上較為務實或機械化；意識形態型則指涉外交政策常看到意識形態或宗教教義的影子；魅力革命型則表示外交政策常取決於特定人物的判斷，如開國元老或第一代領導人的決策等，此相關判斷時常源自個人經驗，而非官僚機構、意識形態等。

蔡明彥(2013)也指出官僚政治機構也會影響外交政策的產生與國際政治，在國家的行政結構當中，官僚成立的目的通常是因為國家外交行政運作的過程標準化，藉以提高政府處理各種問題的效率。官僚政治系統需面對合作規範的建立，也是使民眾信服的正當性來源，指出越高度發展與制度化的社會，決策過程中較容易受到國內官僚組織與價值的影響，包含本位主義、凸顯自身部門重要性、重視專業與法律、拉長決策時間等。官僚可將政府的行政運作程序標準化以提高效率，但若遇到不符合常規的狀況則容易出現問題，並需要跨部門的溝通、衝擊決策時間與結果。在此觀點下，政府的決策並非由單一的統一團體所產出，而是由一群分享權力、但同時各自關注本身利益的官僚組織所決定，因此從制度層面進行研究時，特別需要關注各官僚組織或政府體制的組成與議價過程(黃奎博，2011)。換言之，外交決策機制本身或是國家的政黨結構、外交政策制度設計對政策的制定與運作有什麼影響，是在制度研究時需要探討與觀察的面向，如執政黨職權、涉外組織、援外組織等相關作用、在什麼時期如何影響他們並貫徹政策。陳瑄毓(2014)則指出政

黨的結構影響政黨制度，進而影響政黨在立法與行政部門的合作與對抗；而領導人則會在不同程度上依據個人經驗、偏好、對事實的理解等影響外交政策的形成。

Milner (1997) 在國際政治的討論中，也強調國內政治的影響力道，並以冷戰結束的案例說明觀察蘇聯國家內部對冷戰的偏好與對制度改變的渴望，來解釋國際關係的變化，其中他認為國內政治的行為者偏好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是最重要的，這些行為者又可依功能分成三類，分別為執行者（總統或總理）、立法者、利益團體，許多政策的偏好源自於這些行為者的利益，執行者可以透過政策吸引目光、贏得選舉，其為了選舉也需要利益團體的支持，於政見中納入團體訴求；立法者則較有多樣性，政策偏好因黨派差異而有所不同。Moravcsik (1991) 則在研究歐盟統合時，以國內政治因素來解釋國家偏好的形成，並在領導人變項上納入國內官僚、政黨、利益團體，指出他們在短期內磨合意見，以讓政策反應他們的偏好。

具體來說，國內政治的研究通常指國家的領導人或外交部門、立法部門等，法治國家會藉由憲法或法律，將國家對外事務的決策權授予國家領導人，但國家領導人對外交事務所投入的心思、力道與程度則會因人而異（蔡明彥，2013）。Hermann (2001) 認為，國家領導人在多數情況下會將對外事務交由外交部門或相關單位處理，僅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親自參與外交事務的決策，如國家領導人本身對外交事務有高度興趣、國家遭逢外交危機而衝擊國家利益或引發人民關注、國家領導人必須親自參與和外國元首之間的高峰會、國家領導人本身對某項外交政策議題有特殊利益等情況。

領導人的外交決策風格依 Hermann (2001) 的研究分為兩類，分別是目標導向領導人與反應型領導人，前者指涉領導人具有強烈理想、意識形態或信仰等，會透過相關行動企圖追求某種價值或目標的實踐，因此其想法與外交政策行為，經常會受到個人信仰與情感等主觀經驗所影響，也較不會全然接受官僚部門的意見、盟邦看法、民意、輿論等外來的資訊；反應型領導人則傾向先理解外在的現實狀況，接著做出必要的反應，其特徵為有彈性、較易受國內政治影響、不喜歡制定過於極端或引發爭議的政策。

而社會層次指涉更為廣泛的社會影響，包含民意、公民社會、民間運動，乃至文化、歷史、民族經驗等。在 Robinson (2008) 的文獻中，指出傳播理論的多元主義 (Pluralism) 認為，國家內部的媒體與民意可以對政治與政府發揮極大的影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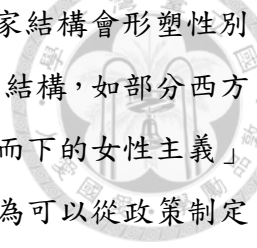
精英模式 (The Elite Model) 則認為國家的權力主要掌握在精英手中，只有精英才擁有足夠的資源來操作政治與社會，並在決策中扮演關鍵角色，雖然多元主義的觀點對於民主國家外交決策的適用性較高，但其受到許多批評，包含人民普遍不關心外交議題，多數情況下難以發揮極大影響力，只有在人民對外交政策關注程度提升時，才會實質影響外交政策。因此這樣的論點使得菁英模式的觀點出現進一步的修正，主張菁英決策仍是政府決策與國家政治的主導力量，但是民意可小幅度的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外交政策是否能夠取得國內民意認同，時常與是否得相對多數的政黨聯合相關。Moravcsik (1991) 以歐洲統合案例指出，因主導國國內恰巧無其他重要議題，使歐洲整合變成精英之間最關注議題，同時也透過廣大辯論爭取政黨聯合。陳瑄毓 (2014) 則在研究中從選舉與相關民調來理解民意如何影響外交政策。而文化的概念涵蓋了社會大眾彼此進行溝通、互動或和外環境溝通的一種集體方式與規範，在一個國家的內部，文化普遍存在社會的各個面向，雖然其不盡然能隨時對外交決策發揮決定性的影響，不過文化的存在，通常能對社會行為產生制約或是規範的作用，尤其對決策過程產生必要的影響 (蔡明彥，2013)。

## 六、理論基礎與對話：國家女性主義

本文旨在探討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對一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為了提供本文清晰的研究架構與研究假設，將以國家女性主義 (State Feminism) 作為本文的理論框架，以此觀察個案研究與比較結果是否驗證理論論述，進而促進本文與理論的對話與提供學術基礎。

國家女性主義指涉女性倡議組織或是相關訴求透過體制化的行動進入公部門體系，以政府的力量自上而下施行改革並實踐性別平等 (顧燕翎，2020)。十九世紀時，自由主義脈絡下的婦女運動轉向在體制內尋求改革的途徑，包含在國內爭取女性參政、參與公共決策和資源分配，或利用超越國家的國際組織進行倡議實踐，形塑國家女性主義的雛形 (顧燕玲，2020)。由於女性主義是行動派的理論，除了透過學術或哲學論證理論觀點，也試圖驗證性別不平等的存在並提出具體方法解決問題，此也成為女性主義各流派之間共同的信念，而國家女性主義便是一種以政府或國家的力量、由上而下推動性別平等的女性主義途徑。Hernes (1987) 認為當



代的性別與國家的關係是在動態過程中相互建構而成，意即國家結構會形塑性別權力的階層或安排，女權運動亦在行動中影響或改變國家的權力結構，如部分西方工業國家發展與建立性別平權機構的過程或結果，體現出「由上而下的女性主義」或「國家女性主義」（引自 Stetson & Mazur, 1995）。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從政策制定者的價值觀來解釋國家女性主義的概念，Siim（1991）認為國家女性主義指涉兩種情形，第一種為女性主義者在擁有實權的制度位置上擔任行政或官僚人員，第二種則為女性政治人物為了制度化女權運動訴求的關注內容或利益，持續推動相關政策（引自 Stetson & Mazur, 1995）。Kantola 與 Squires（2012）論述國家女性主義的概念，其被廣泛用於說明婦女政策機構與婦運倡議者之間的聯盟與關係，並在互動中促使國家回應民間社會的訴求。楊婉瑩（2004）指出國家的性別平權機構體現了國家女性主義的核心價值，該機構以實踐女性主義利益為目標，乃為女性主義利益服務的代理人（agent），在政策與行動中持續關注性別議題，而這樣的發展過程或結果也使國家的面貌不同於過去自由主義或是福利主義對國家的批判，認為國家是為自身利益而存在的整體。雖然國家女性主義成為新一波婦運訴求的重點，也呈現普及化的實踐趨勢，但在過程中會持續與各國社會、文化、政治進行相互影響，導致各國在制度表現形式與運作經驗上有所差異，因此在現實情境中國家女性主義是一項更為複雜多元的概念（楊婉瑩，2004；顧燕翎，2020）。

不過國家女性主義也在發展過程中受到部分女性主義流派的批判，對於女性主義運動與國家的關係抱持著較為負面的態度，如 1970 年代的基進女性主義（Radical Feminism），即認為父權的國和家乃平行與互相支援的結構系統，父權的國家體制會持續地壓迫與宰制女性，因此當女性或女權運動希望藉由體制化來進行改革並進入國體體系後，將會被國家體系收編且瓦解運動能量，使得基進女性主義與國家權力系統被視為意識形態光譜對立的兩個極端（Ferguson, 1984）。而生態女性主義（Ecological Feminism）主張小規模的自足性地區經濟，當人類不僅缺乏對於有限自然資源或是人與萬物相互依存的認知，反而在資本主義父權體制架構下追求國家認同與利益，將導致更多陽剛殺伐之戰，因此反對以軍備和暴力為後盾的龐大政經權力結構，並對於龐大的國家組織存有疑慮，主張婦女運動與國家或政黨之間保持一定距離，對政府內的婦女政策機構抱持懷疑的態度（Miles & Shiva, 1993）。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旨在促進性別平等與藉由外交手段來實踐女性主義的目標，政策制定與實施者乃國家政府，也體現出國家女性主義的表現形式，乃自上而下的改革推動模式；除此之外，依據 Siim (1991) (引自 Stetson & Mazur, 1995) 的定義，當洛夫文 (Kjell Stefan Löfven)、瓦爾斯特倫、杜魯道、方慧蘭等人自我認同為女性主義者時，也體現出另一種國家女性主義的詮釋角度，藉由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將促進性別平等或女性主義的訴求制度化。另外，Thomson (2020a, 2020b) 的研究發現了瑞典與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呈現形式上有所不同，彰顯出在女性主義制度化過程中會與國內政治相互影響，也符合國家女性主義的論述，在此理論架構下進行分析與討論，可以研究使得兩國政策差異的因素影響為何。

因此本文欲藉由國家女性主義進行理論對話，企圖在分析、歸納、說明瑞典與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在影響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時，提供適當的理論基礎與架構，並以此說明政治因素對該國政策影響的方式，也將以研究結果來驗證理論的說明，同時觀察在研究過程中，是否會體現出基進女性主義或生態女性主義的批判，即民間女權運動的訴求或倡議在體制化過程中被抹滅。

## 參、研究設計

### 一、研究架構與操作

根據以上文獻，可以發現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因素眾多，彼此間又會產生雙向的影響，本文為了比較國內因素如何促成瑞典與加拿大發展出不同樣貌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將國內政治分成三的層次來進行理解與剖析，分別為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公民社會層次，呈現於圖 1-1，透過探討此三層次因素在型塑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經驗，來比較國家在政策形成中的異同與特質，並在比較分析之後，梳理臺灣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時在國內政治發展上面臨的挑戰。

如圖 1-1 所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為本論文的依變項，本文並將國內政治因素集中在個行動者層次—包含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和執政黨，制度層次—以援外機構為主，以及公民社會層次—以民間組織聯盟為主。

依變項  
外交政策

自變項  
國內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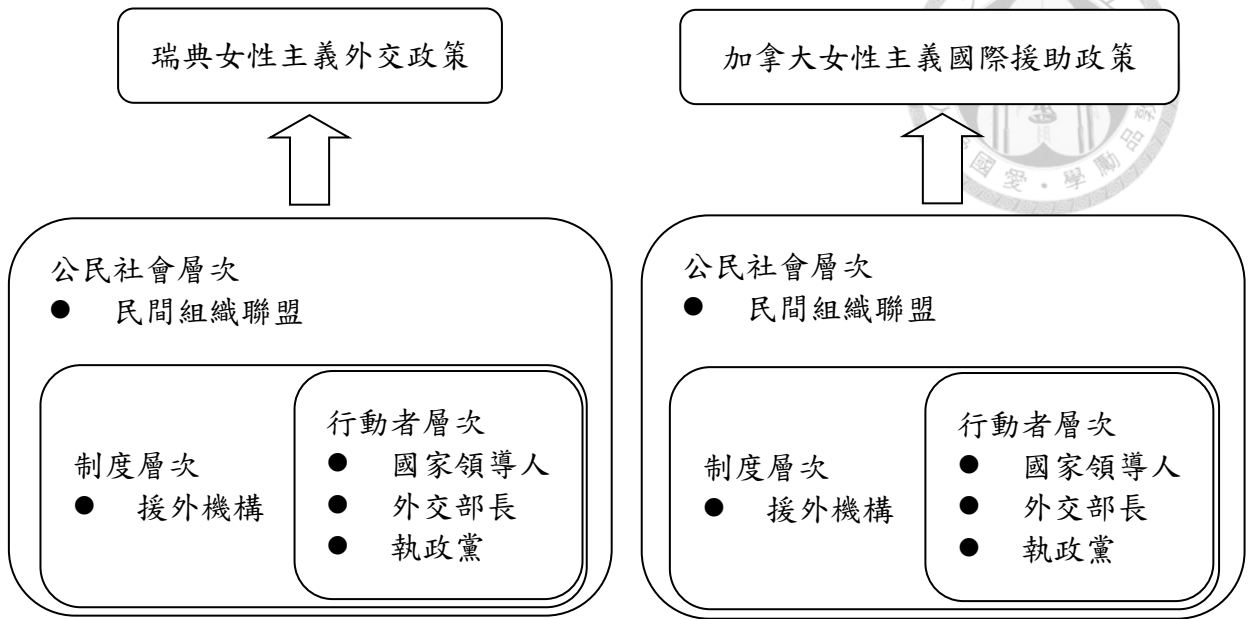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圖

來源：作者自繪

在第一項的行動者層次中，本文將觀察瑞典與加拿大兩國的決策者於執政後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論述與作為，包含兩國的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與執政黨。國家領導人與外交部長方面將研究個人施政走向、經歷或價值觀，透過學者的文獻、自傳與公開聲明、演講作為研究資料；執政黨方面則著重探討政黨價值與政見，觀察其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的影響。而研究的範圍，瑞典將分析從 2014 年開始執政的社會民主工人黨 (Sveriges socialdemokratiska arbetareparti) — 綠黨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聯合政府、時任總理洛夫文、時任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由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於洛夫文第一屆任期提出 (2014 至 2019 年)，因此將時間軸線限縮於此區間，觀察此時間範圍內的施政走向、演講、聲明等資料。加拿大則是鎖定 2015 年開始執政的自由黨、時任總理杜魯道、時任外交部長方慧蘭，藉由相關文獻、公開演講、政府文件、制定者經歷、政黨價值、政党政見等，來提供本文研究資料，因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於杜魯道第一屆任期提出 (2015 至 2019 年)，將時間軸線限縮於此區間，來觀察此區段的施政走向。

在第二項的制度層次因素中，將觀察瑞典與加拿大兩國的海外援助機構怎麼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前者會觀察瑞典的國際發展合作署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IDA)，相關學者指出外交部將援助總額的三分之二交由 SIDA，由其具體負責援助項目的選擇及執行（黃梅波、朱丹丹，2011），透過觀察 SIDA 的作為與執行政策方式，將能提供本文相關的材料來理解其如何影響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加拿大的部分，由於其原負責國際援助的機構—加拿大國際發展合作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於 2013 年被併入到外交部門中，並無一獨立的官方海外援助機構可以做為研究對象，因此將以加拿大全球事務部（Global Affairs Canada, GAC）進行研究，集中觀察其如何執行政策，包含政府預算比例、性別平等項目與相關計畫，研究的時間範圍自該國總理任期開始至 2022 年，以涵蓋更廣泛的資料論述：瑞典為 2014 至 2022 年、加拿大為 2015 至 2022 年，不過為了觀察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援外組織之間的影响力道，亦會分析與前任總理任期內援外組織、政策與行動上的差異，因此分析範圍將往前拉長兩年：瑞典為 2012 至 2022 年、加拿大為 2013 至 2022 年。

第三項的公民社會層次中，將集中分析民間組織的反應與相關意見，來分析民主國家中的公民社會與民意如何型塑相關政策的產生，以及理解其對政策的態度。由於目前多數資料呈現出兩國的民間組織皆是以聯盟的形式在進行探討，如瑞典的 CONCORD Sverige 由 81 個組織組成，關注瑞典在外交與發展政策上的合作與永續性；而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小組（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由加拿大樂施會（Oxfam Canada）、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分會（Amnesty International Canada）等數個組織組成。因此本文將以聯盟的形式進行研究，關注瑞典的 CONCORD Sverige 與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小組如何在國內對兩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以及如何回應政府行動，由於民間的反應會持續的推進與改變，政府亦可能針對民間倡議而調整後續政策，因此將研究的時間範圍拉長至 2022 年，以涵蓋更為廣泛的民意探討。

綜上所述，本文具體的研究架構和操作如表 1-1 所示：

表 1-1、研究架構與操作



影響因素	研究標的	研究內容	研究對象	時間範圍
行動者層次	國家領導人	個人施政走向與經歷	瑞典：洛夫文 加拿大：杜魯道	瑞典：2014 至 2019 加拿大：2015 至 2019
	外交部長	個人施政走向與經歷	瑞典：瓦爾斯特倫 加拿大：方慧蘭	
	執政黨	政黨價值與政見	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綠黨聯合政府 加拿大：自由黨政府	
制度層次	援外組織	組織運作模式與執行政策過程	瑞典：SIDA 加拿大：GAC	瑞典：2012 至 2022 加拿大：2013 至 2022
公民社會層次	民間組織聯盟	倡議內容與政策回饋	瑞典：CONCORD Sverige 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小組	瑞典：2014 至 2022 加拿大：2015 至 2022

(來源：作者自繪)

## 二、個案選擇

由於各國政策在實踐上可能具有女性主義觀點或是旨在推動性別平等，為了區隔外交政策之間的定義與特質，本文以最早提出且以「女性主義」(Feminist)命名外交政策的瑞典與加拿大作為研究個案，使用「女性主義」命名不僅象徵著國家採納以規範與道德原則為指導的政策框架，改變過往傳統的國家中心觀點，更在國家層次上承認父權體制的迫害與女性邊緣地位的困境，並宣告以具體作為實踐變革性及交織性的對外行動，促進性別平等、女性賦權甚至是女性解放(K. Aggestam & Rosamond, 2016；L. Thompson, 2020)。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其餘旨在推動性別平等政策不同之處在於，其使用了較為爭議且容易引起負面反應的命名方式，在某些國家或地區，女性主義的概念具有相當爭議，且在歐洲或全球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傳統價值觀興起的背景下，並不利於女性主義思想或外交政策的發展(Sundström & Elgström, 2019)，除此之外，不同國家的宗教保守派、民粹主義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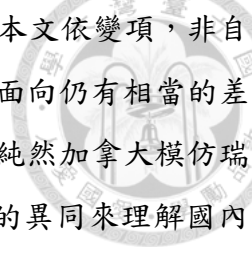
導人或非政府組織也藉由跨國合作的方式形塑對女性主義的負面標籤或攻擊，透過全球的法律規範或政策工具來破壞並取消女性長期擁有的權利（Sanders & Jenkins, 2022）。然而，儘管「女性主義」承受疑慮、不友善甚至是負面的標籤<sup>2</sup>，瑞典與加拿大兩國仍堅定地以此命名外交政策，由於此政策可能衝擊執政上的穩定，因此本文認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勢必有特殊因素在主導，所以選定以瑞典與加拿大為研究個案進行質性分析，藉此深化研究影響國家形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內因素。

另一方面，雖然至 2022 年底，除了瑞典與加拿大外，法國（2019 年）、墨西哥（2020 年）、西班牙（2021 年）、盧森堡（2021 年）、德國（2021 年）和智利（2022 年）等國都相繼表示推出自己國家版本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UN Women, 2022），不過相較於其他推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家，瑞典與加拿大的發展歷程最長，具備足夠的研究資料可以進行分析討論。且女性主義對各國的概念與影響皆不同，以法國為例，Thomson（2020a）即指出其相較於加拿大與瑞典較少使用「Feminist」語言，L. Thompson 與 Clement（2019）也認為該國的外交政策未被明確地定義為女性主義。法國政府是以「France'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gender equality」作為該國性別平等國際戰略，並在其中設定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懷重點，雖然亦表明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決心，但主要是在法國性別平等戰略框架下運作（France Diplomacy, 2021, 2022），此部分與瑞典、加拿大不同，該兩國皆以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為指導框架，進行對外行動的規劃與相關作為，法國則使用了「性別平等國際戰略」的概念，雖涵蓋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但也因此被認為較少使用「Feminist」或外交行動未被明確定義為女性主義（L. Thompson & Clement, 2019；Thomson, 2020a）。

而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被認為受到瑞典政策的啟發，使得內文措辭

---

<sup>2</sup> 反對女性主義（Anti-feminism）的思想或論述在近年透過網路傳播在各國或全球得到強化。中國的案例中，學者指出相關社群將女性主義者視為離經叛道或背叛國家的女性等，不僅以此妖魔化女性主義者，同時將公眾注意力從系統性的性別不平等轉移到女性主義者與反女性主義者之間的對抗上，進一步限制了對女性生活受到交織性壓迫的關注（Huang, 2021）。而南韓的案例則指出，20 多歲韓國男性普遍有攻擊性的厭女傾向，將自身視為女性主義的受害者，58.6%的受訪者強烈反對女性主義（Park, 2021），且 2022 年南韓總統大選競選期間，總統尹錫悅（Yoon Suk Yeol）聲稱女性未受到系統性性別歧視並承諾廢除女性家庭部（Ministry of Gender Equality and Family），顯示了該國對於女性主義的敵意與負面反應。



與優先事項呈現高度相似 (Fillion, 2018)，然而外交政策內涵為本文依變項，非自變項，且 Thomson (2020a, 2020b) 指出兩國在政策目標與側重面向仍有相當的差異，表示有其他因素在影響著兩國的外交政策制定與產出，並非純然加拿大模仿瑞典政策可解釋。也因此本文透過梳理兩國政策發展脈絡和因素的異同來理解國內政治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力，將能補充對於兩國政治如何影響外交政策的研究，亦可藉由比較觀察兩國國內政治影響的異同。

綜上所述，為了聚焦研究、充足研究資料、比較國內政治的影響，將以瑞典與加拿大作為本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個案，為國際關係的性別領域研究提供更多的分析。

###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以比較外交政策的方式執行研究。張清敏 (2001) 指出，Rosenau 以前的外交政策研究，缺乏國際關係理論和比較政治學的研究成果，在外交決策研究探討上也較為稀少，多數依賴於美國或典型大國的外交政策研究。至 1970 年代，隨著國際上新自由主義的崛起，部分國際關係學者將研究焦點置放於國內層次上，關注與重視國際和國內問題之間的連結與互動；也有部分外交政策學者將研究標的由傳統大國轉向其他國家，並開始進行彼此的外交政策分析與比較。Rosenau (1971) 在其著作中倡導對外交政策更科學研究，主張將國內和國際的問題與條件連結起來，也呼籲藉由提出許多具體的條件來衡量外交政策的性質，如透過對自然屬性和國家行為之間的關係研究，來思考與發展相關理論框架。而為了發掘與探討不同層次因素在不同國家和地區對外交決策的不同影響，Rosenau (1971) 認為進行外交政策研究時，個案的應用研究或許能為即時性的問題尋得答案，但長期而言，比較研究方法能發現不同國家為適應環境變化時，所採取外交政策的行為模式，因此若探討政策的發展或檢視國家針對內外環境變遷形塑的對外行為，宜採用比較研究方法為宜。

而具體作法則是個案研究法，透過廣泛資料的蒐集，分別針對兩國國內政治因素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進行分析，Yin (1994/2001) 認為社會科學研究中廣泛使用個案研究，包括傳統科學與實務導向的領域，前者如社會學、政治學；後者如公共政策、公共行政、社會工作等。Yin (1994/2001) 指出個案研究的特點有

三，第一，其專注在分析與了解某些單一或特定事件的研究；第二，個案研究結合不同的資料蒐集方法，證據可以是質性、量化、兩者兼具的；第三，個案研究可以同時達到不同目標，如描述性、探索性、解釋性的分析。由於本文屬於外交政策，並針對特定事件的研究，因此將採用個案研究方法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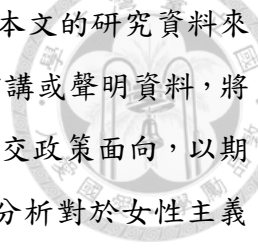
#### 四、研究假設

透過本文的研究架構，將藉由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公民社會層次來進行分析，於行動者層次中研究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執政黨；於制度層次中研究國家援外組織；於公民社會層次中研究民間組織聯盟，期許以此了解國內政治因素如何影響瑞典與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重點與側重面向。

經由過往文獻提供的論述與觀點，本文假設影響兩國外交政策形成與側重面向的主要國內因素乃行動者層次中的領導人，因此在第一與第二個研究問題中，瑞典的案例假設政策領導人乃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加拿大則為杜魯道，將透過比較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公民社會層次之間的影响來分析兩人如何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扮演關鍵角色。而研究問題三，將分析瑞典與加拿大兩國在國內政治因素方面的不同以及臺灣在推行政策上可能面臨的挑戰，本文假設使得兩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側重面向與關懷領域不同的關鍵因素乃於行動者層次中兩國政策領導人的價值觀、經驗或關注重點，試圖透過研究資料的整理與歸納，呈現瓦爾斯特倫與杜魯道如何影響兩國外交政策的形成，同時將分析臺灣的國內政治因素與進行國際比較，論述推行政策上的挑戰。

#### 五、研究資料

本文研究資料分為三大方面進行蒐集，第一為學術研究，涵蓋學者研究、著書、期刊或碩博士論文。第二為官方資料，將透過瑞典、加拿大與臺灣的政府、外交部、政黨、援外組織等官方網站搜尋任何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的相關文獻，同時也蒐集與政策有關的預算規劃、施政報告、對外行動計畫、手冊或相關研究進行分析，以期能夠產出更為全面的研究結果，而在行動者層次的面向，為了觀察國家領導人與外交部長對女性主義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態度、立場、價值觀或相關論述，將以「feminism」、「feminist」、「feminist foreign policy」為關鍵字搜尋並擷取公布於



官方網站上的相關演講與公開聲明，同時刪除重複的文本，成為本文的研究資料來源，然倘若該國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於官方網站缺乏相關的演講或聲明資料，將以「gender equality」為關鍵字進行搜尋，並著重在對外行動或外交政策面向，以期能理解該行動者對外交層面中性別平等的態度或政策行動，亦分析對於女性主義較未關注的原因，裨益本文研究深度。第三部分為非官方資料的蒐集，包含民間組織網站、其餘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相關的聲明、新聞、評論、政策制定者個人經歷或自傳，以期能完整論述本文內容，並強化研究之邏輯與說服力。


## 第二章 瑞典國內政治因素分析



國家的性別平等發展除了帶動國家內部的平權促進，更可以在國際上發揮影響力。蔡明彥（2013）說明國內政治的社會文化影響外交政策的產生，其普遍存在於社會中各個面向，能對社會行為或決策過程產生制約的作用，而瑞典性別平等的高度發展即促進了該國在國際舞台上倡議人權與平等的行動，其中就包含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瑞典實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基礎，乃其作為良好國際主義國家的自我敘述，致力於推動國內外的性別平等，同時利用瑞典作為「性別世界主義」國家的自我認同，強化其推動相關政策的力道，形塑一股雙向建構的力量，強調女性及其他邊緣化群體的保護不應受國界的束縛，而這種自我敘事根植於瑞典作為「道德超級大國」的國家身份，此認同與其悠久的社會民主脈絡、對公民和非公民的雙重福利承諾密切相關（K. Aggestam & Rosamond, 2018, 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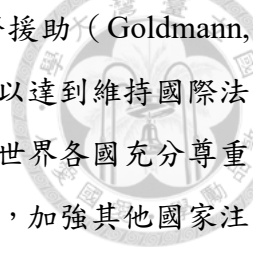
瑞典的性別平等發展長年名列前茅，體現在各項數據中。2021 年關注「生殖健康」、「賦權」及「勞動市場」三個面向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分數為 0.023，世界排名第 4（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n.d.）；關注「經濟參與和機會」、「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及「政治參與」四個面向的性別落差指數（Gender Gap Index, GGI）則為 0.823，排名世界第 5（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另外，關注限制女性權利、獲得賦權機會與資源的法律、社會規範和實踐等面向的社會習俗性別指數（Social Institutions and Gender Index, SIGI），2023 年瑞典的分數為 8.8，世界排名第 3（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n.d.）。政治參與方面，2021 年瑞典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高達 47%，世界排名第 8（The World Bank, n.d.）。經濟參與方面，2021 年瑞典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61.3%，優於當年全球平均的 46.3%（Our World in Data, n.d.）。

除了以上數據，瑞典長年以來在社會民主運動與女權運動相輔相成之下，通過諸多利於性別平等發展的法律規範。針對女性安全的包含 1250 年即通過的反暴力對待女性的法律、1965 年將婚內強暴納入刑法規範、1998 年生效的禁止暴力侵害婦女法、1999 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禁止性交易的國家、2011 年在刑法中納入跟蹤



騷擾的刑責，2005 年也通過一項性犯罪法，加強與確保每個人的人格完整性與自主的權利，2018 年更進一步強調基於同意的重要性，透過相關規範懲罰包含性騷擾、性侵害、性剝削等在內的犯罪行為 (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 ; Sweden Sverige, n.d.)。在女性經濟賦權的法律規範，則有 1979 年通過的性別平等法，保障男女在瑞典社會生活中享有同等待遇，促進在工作、就業、其他工作條件或發展機會方面的平等權利，2009 年的反歧視法進一步要求雇主要促進性別平等、實踐同工同酬，以及採取措施反對騷擾 (Sweden Sverige, n.d. ; 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除此之外，1974 年瑞典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育幼假取代產假的國家；1995 年，實施父親額度 (father's quota ; daddy quota) 的親職假，為父親保留 30 天不可轉讓的假期，以減少母親在育兒角色上的壓力，至 2016 年親職假增加到 480 天，也為每位父母保留 90 天不可轉讓的額度 (Sweden Sverige, n.d. ; 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於平等教育方面，1842 年將女性與男性引入義務小學，並於 2010 年的教育法中強調性別平等的實踐，管理瑞典所有教育機構，規定性別平等應貫穿與指導教育體系的所有層級，在 2017 年的反歧視法修訂後，引入更積極的措施，並適用於學前教育、義務教育與其他活動 (European Agency, 2023 ; 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在多元性別面向，瑞典於 2009 年同性婚姻合法化 (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在國家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與強化整合方面，1976 年瑞典就已設有性別平等部長、1982 年設立性別平等處，協調政府機關性別平等政策之執行 (黃淑玲, 2014)；於 1980 年成為首批簽署與承諾《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的國家之一；於 1994 年開始實施以性別主流化為實踐性別平等的戰略，將性別平等工作納入政府各層級的常規措施 (Sweden Sverige, n.d.)。

瑞典進步與領先全球的性別平等發展源於該國社會民主運動與女權運動相輔相成下的發展成果，更在此文化背景下將經驗應用在全球政治中，相信不同國家、民族、文化的人們需要團結起來，傾向進行超國家與跨政府的合作，才能讓世界變得更和平美好 (Brandal et al., 2013/2021)。也因此在外交行動中體現了重視人權與平等的國際主義，在國際事務上積極追求全球的和平、穩定與人權發展 (Goldmann, 1991 ; 吳振達, 2018)，並以國際法為標準、以聯合國為行動場域、推動裁減軍備



等限制武力措施維原則，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海外發展等經濟援助（Goldmann, 1991）。同時強調在外交上遵守國際規範，對抗國際間的不正義以達到維持國際法存在與國際和平穩定，透過雙邊、參與歐盟等多邊方式，促進在世界各國充分尊重人權，並且對國內外針對人民的壓迫與虐待作出反應、防止歧視，加強其他國家注重人權的能力（Goldmann et al., 1986）。此外，瑞典亦具有批判霸權的傳統，如越戰期間批判美國、21 世紀初批判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非法占領及屯墾區的非法暴力與衝突等，讓瑞典成為民主國家中最富正義價值理念者（吳振達，2018）。瑞典國際主義表現出來對於正義與平等的追求，乃受到國家歷史經驗與社會固有模式之影響，表現在對外政策與作為（Bergman, 2007）。

對瑞典政府來說，尊重人權本身不僅僅是外交政策目標，也是全球發展和安全的手段。瑞典外交政策的軟實力，透過規範性力量來推動人權，以創新、環境保護等議題塑造瑞典文明形象，促進該國在關鍵領域的國際化、傳播瑞典的文化及價值觀、為瑞典開拓更大的國際市場（吳振達，2018）。

當瑞典具備良好的性別平等發展基礎時，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就較易獲得國家內部的支持，同時透過相關政策的倡議與推動來增加自身在全球政治中的影響力。但當國家性別平等高度發展，卻不必然出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如挪威、芬蘭等 GGI 與 GII 名列前茅的國家，因此上述僅代表著社會文化能夠提供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形成及發展的基礎，但具體的推行與政策設定，仍依靠其他因素所決定。故本文將探究瑞典其他三個層次的國內政治因素，分析關鍵影響因素促成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側重面向。

## 壹、行動者層次

瑞典國體依據憲法規定實施君主立憲制，國王乃國家元首，僅履行代表性或禮儀性職責，其政體屬內閣制，國會透過公民普選產生，國家領導人通常來自國會多數黨或執政聯盟領袖，而瑞典國會選舉採用比例代表制，並於 1970 年實施一院制，於 2014 年的選舉中，社會民主工人黨為最大黨<sup>3</sup>，最後與綠黨組建少數

---

<sup>3</sup> 2014 年瑞典國會選舉結果，總共 349 席的席次中，社會民主工人黨分配到 113 席、溫和黨(Moderata samlingspartiet)84 席、瑞典民主黨(Sverigedemokraterna)49 席、綠黨 24 席、中間黨(Centerpartiet) 22 席、左翼黨(Vänsterpartiet)21 席、自由黨(Liberalerna)19 席、基督教民主黨(Kristdemokraterna)

政府，並由社會民主工人黨領袖洛夫文出任總理、任命同黨籍的瓦爾斯特倫為外交部長。因此於行動者層次將分別探究瑞典的總理—洛夫文、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以及政黨—社會民主工人黨與綠黨，分別就其個人生平、演講、聲明與政黨官方文件、政策表態等進行分析，以了解對於性別、人權、外交等領域中的關注與重視。

### 一、國家領導人

洛夫文上任後宣布建立女性主義政府，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政府政策的一環，在政府宣言中說明了其女性主義政策和設想中的改革，包含在涉及性別平等問題時，應賦予國家更明確的方向與任務，優先考慮削減性暴力，並在性別問題上編制預算 (Velke, 2018)。

而女性主義政府與過往瑞典「平權內閣」傳統的不同，除了是對性別主流化的再次強調與更廣泛領域的平等關懷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a)，更不避諱使用較具爭議的「女性主義」來命名，強調新政府對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的堅定立場。瑞典自 1994 年開始即發展出「平權內閣」的模式，即內閣首長男女人數各占一半，源於當時社會民主工人黨要求政府將性別平等納入政策領域中，並呼籲性別平等部長對性別平等問題負責，促進了黨內規範修正，使政黨議員的名單在 1993 年的黨代表大會上提供男女相同的配額，最終社會民主工人黨女性議員當選數量從 41% 上升至 48%，被認為是黨內女性與外部女權運動共同倡議下的結果 (Sainsbury, 2004)。而後兼任性別平等部長的副總理薩琳 (Mona Sahlin) 主持並推動了政府的性別主流化 (Raum, 2005；黃淑玲, 2015)，時任總理卡爾松 (Gösta Ingvar Carlsson) 更宣布中央內閣追求性別平等，任命部門首長男女人數各半，從此之後瑞典內閣維持男女部長人數大致相當的組成 (Bergqvist et al., 2007)。瑞典得以於行政與立法機構中實現性別平衡的原因，包括女性的社會與政治公民身分在社會民主工人黨執政的支持下得到擴張與保障、女性融入勞動力市場、政黨透過相關措施與規範將性別平等制度化等 (Sainsbury, 2004)。洛夫文的女性主義政府擴張了「平權內閣」的關懷，除了確保女性和男性擁有同樣的權力來決定與建設自己

---

17 席。

的生活樣貌以及社會環境，也強調性別平等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實現的目標，更有益於政府推動和平、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外交政策（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9a）。Hydén（2019）與 Verezhak（2022）即指出女性主義政府旨在改善國家的性別平等議程，表明性別平等與整個社會有關。政府也承諾在所有決策中促進性別平等，打擊壓迫性／性別的社會結構，包含勞動力市場、衛生和社會、教育、外交和發展以及司法政策，非僅要求內閣部長中維持性別平衡與強化女性代表性的結果，而是要求在所有施政中含有性別觀點，遵循性別平等的政策目標（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a）。

洛夫文長年投入工會事務並擔任要職，也因具備相關經驗，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的相關事務。其於 1957 年 7 月 21 日出生於瑞典斯德哥爾摩（Stockholm），爾後被安置於孤兒院，由林業工人家庭收養，曾於優密歐大學修習社會工作學科（School of Social Work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Umeå Welder training），接著在 1979 至 1995 年間，於軍用車輛製造商裡擔任焊工（Wallenfeldt, 2022a）。工會事務的投入始於 1981 年，先後擔任了瑞典金屬工人工會全國委員會成員、執行委員會主席，從事合約談判和國際事務領域協調，也在 2000 年後擔任北歐金屬工人聯盟執行委員會成員與歐洲金屬工人聯合會執行委員會的副主席，2005 年瑞典工業工會和瑞典金屬工人工會合併後成立為 Industrifacket Metall（IF Metall），洛夫文當選為其第一屆主席（Wallenfeldt, 2022a）。其政治上的參與則是受到社會民主工人黨前總理帕爾梅（Olof Palme）的啟發，於 1973 年開始在政黨中擔任社會民主青年黨領導，接著於 2005 年擔任常務委員會副委員、2007 至 2009 年擔任福利政策審查小組的主席、2012 年當選為黨領袖，並領導社會民主工人黨在 2014 年的瑞典大選時贏得國會多數黨席次，最後與綠黨組建內閣、與在野黨聯盟達成協議，表態將加強彼此合作的三個領域，分別為養老金制度、能源未來發展、安全與國防政策（Wallenfeldt, 2022a）。

在洛夫文提出女性主義政府前，即重視黨內的性別平等問題。2014 年成為總理前，由於當時瑞典伊斯蘭組織（Islamic Association in Sweden）領導人穆斯塔法（Omar Mustafa）當選為社會民主工人黨黨委員會成員，因曾參與反猶主義和恐同觀點的會議而面臨爭議，雖然穆斯塔法表示其並不認同此仇恨觀點，但時任黨主席洛夫文表態伊斯蘭組織的價值與社會民主工人黨重視的性別平等概念不同，若欲繼續在黨內擔任要職，就必須支持性別平等，同時停止擔任伊斯蘭組織領導人，或

是退出黨委員會 (Sveriges Radio, 2013)。顯示了洛夫文在女性主義政府成立之前，即認同社會民主工人黨對性別平等權利追求的基本價值，而成為瑞典總理後，也在相關倡議中進行更多的表態、支持，並說明具體施政方向。為分析本文探討領導人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道，本文從瑞典政府辦公室網站與新聞媒體中，擷取 2014 至 2019 年與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對外行動的性別平等相關的演講或聲明進行分析與論述，共計七場，呈現於表 2-1<sup>4</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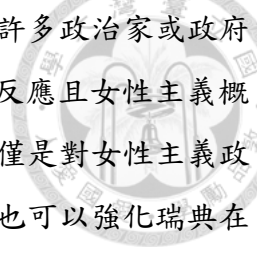
<sup>4</sup> 本節所使用的演講與聲明資料，乃瑞典政府辦公室網站 (<https://www.government.se/>)、HDRO (2017)、Stupp (2017) 所提供之英文版本，並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表 2-1、洛夫文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5年1月	世界經濟論壇 (World Economic Forum)	洛夫文被任命為聯合國 HeForShe 運動的 IMPACT World Champion 領袖	HeForShe 旨在讓男性參與爭取性別平等的進程，而瑞典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表示該國所有男性部長都參與此倡議行動，使瑞典政府成為世界上第一個集體參與 HeForShe 的政府。
2015年6月	政府針對 HeForShe 倡議的公開演講	HeForShe 的行動倡議提及病假制度的調整	HeForShe 在瑞典開始推動，表明性別平等不是女性議題，而是女性和男性的議題，洛夫文帶領政府實施一項廣泛的議程，欲在瑞典實現更大程度的性別平等。
2015年7月	第三屆發展籌資的國際會議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籌資計畫中對性別平等的投資與目標設定	說明針對籌資計畫中促進性別平等的相關作為與具體規範，也強調對女性經濟、生產資源與教育的保障。
2015年9月	聯合國婦女署的全球領導人會議 (Global Leaders Meeting o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A Commitment to Action)	領導人對性別議題的影響以及瑞典正在採取的行動	說明父權體制如何壓迫女性的基本權利，以及此狀況可能導致的經濟衰弱與削減社會競爭，並強調具體行動與改變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在和平參與上的貢獻。
2015年9月	全球公民節 (Global Citizen Festival)	性別平等的脫貧與衛生議題	表示將在國際團結的理念下實現所有人的平等，而全民享有衛生基礎設施是相當關鍵與重要的。
2016年	人類發展報告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全球發布會	人人都應享有人類發展並強調平等的必要性	說明全球社群穩定運作的前提，要將所有人納入體制之中，並避免任何形式的壓迫，使所有人受惠，才能強化經濟穩定與繁榮。
2017年3月	歐盟領導人會議	歐盟國家領導人針對歐盟未來的發展進行會議討論	洛夫文強調在一份關於歐洲未來的宣言中，應該注重勞動力的性別平等並明確論述具體作法。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b, 2015c, 2015d, 2015e, 2015f, 2015g, 2015h; UNDP, 2017; Stupp, 2017)


在以上聲明與演講中，呈現洛夫文在性別論述上的四個特質。第一，洛夫文在公開演講不避諱女性主義的身分認同，反而強調男性作為女性主義者以及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認為性別平等的實踐對所有人都有相當的助益，藉此希望可以創



造更大的團結。據 Sundström 與 Elgström (2019) 的訪談研究，許多政治家或政府官員認為以「feminist」命名政策在部分國家或地區易引起負面反應且女性主義概念具有相當爭議，但洛夫文不懼爭議並持續在各種場合發聲，不僅是對女性主義政府的堅定支持，說服各國或是社會支持相關議程的推動與進行，也可以強化瑞典在性別場域的領導地位，如在世界經濟論壇的演講中，其敦促所有男性加入創造性別平等的工作並分擔責任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b)；在第三屆發展籌資的國際會議上指出自身是一名女性主義者，不僅是一種身分的象徵與表態，更將性別平等與女性主義議題搬到國際場合進行對話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f)。顯示洛夫文持續將性別平等議題推動至國內社會與國際場合，藉由實際行動與聲明進行倡議，持續尋求更大的認同與合作，在 HeForShe 的演講中，則指出若要對根深蒂固的社會規範進行改變，需要強力的領導、堅定的政治承諾、所有人的積極參與，也將性別平等或追求女性權利的議題視為全人類須共同承擔與追求的目標，非僅由女性負責，男性也須意識並重視相關的倡議與投入行動，而瑞典女性主義政府致力於與其他人合作以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c)。

第二，洛夫文對於性別平等的關注源於工會背景，見證女性參與本由男性主導或男性為多數領域的重要性。在世界經濟論壇與第三屆發展籌資的演講中，即表示其背景是男性主導的製造業，曾親眼目睹企業如何透過女性平等參與決策來改善，理解到性別平等的力量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c, 2015f)。另外在人類發展報告全球發布會中，也對聯合國開發計畫署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等團體機構表示平等的必要性，並將其連結到全球勞動力市場的問題，需形塑一種不壓迫任何人、所有人受惠的全球化形式，鼓勵雇主、勞工、政府之間的合作，藉此實踐良好的工作環境、提高生產力、強化經濟穩定與繁榮 (UNDP, 2017)。顯示洛夫文在工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的經驗裡，理解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並連結到 2014 年對女性主義政府設立的政策承諾，使其更願意透過具體措施來實踐平等。

第三，洛夫文在性別平等正面影響方面，持續強調女性勞動參與和經濟優勢之間的連結，圍繞在女性經濟賦權與勞動參與如何對整體社會有利，因此需要改變體制來釋放大量的人口潛能，保護與促進女性的經濟參與，如第三屆發展籌資的國際



會議以及聯合國婦女署（United Nations Entity for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的全球領導人會議中，都指出：「性別平等是人權的基本問題，但也是精明的經濟學，透過為我們的一半人口提供與另一半人口相同的機會，我們可以使人才庫翻倍並釋放龐大的繁榮潛力...」（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f, 2015g）；在 HeForShe 的演講中，也說明必須賦予婦女經濟權利，如果將女性排除在經濟活動之外，可能會造成世界上機會和人才的浪費（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c）；紐約中央公園的全球公民節演講中，也提到了性別平等的脫貧（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h）；歐盟領導人會議則強調了勞動力性別平等（Stupp, 2017），以上皆與經濟議題連結，其餘演講中雖也述及女性在政治中的參與與代表性、解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教育平等、和平建設等，但並未如經濟賦權與勞動參與廣泛出現於不同場合中，也鮮少提及對於女性於從屬地位的解放，此可能因公開場合演講中須強化閱聽人及與會者對於性別平等推動的誘因，抑或洛夫文為尋求國內或國際社會的支持與影響力，需透過具體的正向價值來促進對女性主義政府政策的關注，藉由經濟價值與利益拉攏更多的夥伴一同推動性別平等，但也因此在道德概念、資源分配、父權體制的論述上相較缺乏。

第四，洛夫文較缺乏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與論述，不過其雖未強調政策推動，但在聯合國婦女署的全球領導人會議中，仍指出婦女在和平進程各層面的參與可以促進和平建設的成功與可持續性（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g），反映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立場與重點。其未強調外交政策可能因其身為內閣首長與總理，多於更高層級的政策中說明與論述，如女性主義政府的領導等，或甚至其並未主導外交政策的規劃與設定，因此缺乏在相關場合倡議的行動。

經由以上分析，洛夫文並非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不僅未對政策進行倡議，政策內容也未體現對經濟賦權的側重。其在早年工會運動及社會民主思想的培育中，認同平等的重要性，並在相關經驗中見證女性勞動參與帶來的正面效益，同時在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之下進行倡議或經驗分享，期許在不同層級的政策或場合中尋求支持與合作，但多數的概念與重點論述，仍圍繞在經濟利益與勞動參與的重要性，未如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政策目標或關注內容來得廣泛，顯示了洛夫文對經濟的高度重視並未呈現於外交政策中，並未主導政策的制定與規劃。



## 二、外交部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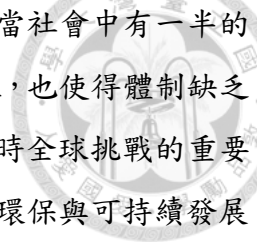
瓦爾斯特倫 1954 年生於瑞典的斯凱萊夫特奧 (Skellefteå)，高中畢業後就無繼續進修，先後擔任銀行職員與會計師，也曾任瑞典地區電視網絡的執行長。政治參與始於 1973 年，高中畢業後開始擔任瑞典社會民主青年聯盟的監察員，爾後於 1979 年當選為瑞典國會議員，任期六年；1988 至 1991 年擔任青年、婦女和消費者事務部長 (Minister for Consumer Affairs, Women and Youth)；1994 至 1996 年擔任文化部長 (Minister for Culture)；1996 至 1998 年擔任社會事務部長 (Minister for Social Affairs)；1999 年成為 Worldview Global Media 的執行副總裁；接著進入歐洲政界，於 1999 至 2004 年擔任歐盟環境專員 (European Commissioner for the Environment)；2004 至 2010 年擔任歐盟委員會第一副主席 (First Vice-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2014 年，社會民主工人黨在瑞典國會選舉中獲取多數席次後，黨領袖洛夫文就任瑞典總理並任命瓦爾斯特倫為瑞典的外交部長與副總理，直至 2019 年 9 月。

瓦爾斯特倫對於性別平等相當重視，尤其關注衝突中女性受暴與和平建設時女性參與的重要性，也使其先後在不同性別倡議單位擔任要職。如 2007 年成為世界女性領袖理事會的部長級倡議主席 (Chair of the Ministerial Initiative of the Council for Women World Leaders)，該理事會由現任和前任女性總統、總理或部長組成，旨在透過提升各國最高級別女性領導的數量、影響力或知名度來鼓勵善政和促進全球民主，使更多的女性擁有機會與資源參與政治，帶來更多元的態度與經驗 (Wallström, 2010)；2010 至 2012 年，瓦爾斯特倫擔任聯合國秘書處的衝突中性暴力問題首任特別代表<sup>5</sup>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任職期間曾處理剛果民主共和國內戰中的性暴力問題，同時將與各國政府一同倡議，以打擊衝突中性暴力犯罪卻未受罰的現象。

瓦爾斯特倫也透過學術期刊文章的發表，展現對於女性、和平與安全議題的重視。在哈佛國際評論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發表的文章關注全球安全戰略

---

<sup>5</sup> 該特別代表為聯合國的與衝突相關性暴力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CRSV) 的發言人與政治倡議者，並擔任了聯合國反對衝突中性暴力行動 (United Nations Action Against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的主席與得到相關小組的支持 (United Nations, n.d.a)。瓦爾斯特倫於 2010 年依據安理會第 1888(2009)號決議設立辦公室以支持相關工作，該決議承認衝突中性暴力對社群造成的有害影響，並承認這種犯罪將破壞衝突結束後針對和平、安全與重建社會的努力 (United Nations, n.d.a)。



的女性代表，認為女性在政治中的公平代表權是一個民主問題，當社會中有一半的公民被排除在公共辯論和決策中，將導致社會缺乏公平的代表性，也使得體制缺乏民主（Wallström, 2010）。除此之外亦強調女性賦權和參與對當時全球挑戰的重要性，其中最緊迫的議題為氣候變遷和安全，指女性可以為氣候、環保與可持續發展提供正向的貢獻，卻在許多問題決策和談判過程中缺乏代表性；女性同時亦為促進和平與穩定的關鍵角色，儘管第 1325 號決議承認女性於建設穩定和平的重要性，但實踐改變是一個長期的政治過程，必須得到更多的關注，特別是在外交、國防、安全和發展政策領域中的決策與代表性（Wallström, 2010）。另外 2012 年發表的期刊文章重視解決轉型正義與衝突中性暴力問題的方法，強調應對衝突中性暴力的領導人和肇事者進行刑事調查和起訴，打擊相關犯罪的有罪不罰現象，並為戰爭性暴力倖存者提供支持的賠償計劃與建立真相委員會（truth commissions），政府須藉由調查、報告、承認性暴力在內的戰爭罪，為正義做出貢獻（Wallström, 2012）。

而瓦爾斯特倫對女性參與、性暴力問題的關注，源於其從政的經驗。在 2010 的文章中即指出在政界 30 多年裡，時常遇到玻璃天花板等困境，而這些性別不平等的概念是建立在家庭、教育、文化和媒體中眾多刻板規範的社會建構，也反映在政治體制中（Wallström, 2010）。而對於性暴力問題的關注，在擔任聯合國衝突中性暴力問題特別代表時，曾宣示將與各國政府一起參與倡議工作，打擊衝突中性暴力犯罪卻未受罰的現象，並在聯合國系統內加強協調機制，以改善預防和應對性暴力，並盡其所能改善女性訴諸司法、安全和決策參與的機會（Wallström, 2010, 2012）。顯現瓦爾斯特倫在擔任瑞典外交部長之前，就相當重視女性於衝突與和平建設過程的困境與重要性，並透過相關的宣示與文章表達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的意義。

除此之外，瓦爾斯特倫在不同場合的聲明與演講，也體現了他對於性別平等、女性賦權、女性代表性、資源分配、反對性暴力、和平與安全等議題的重視，並闡述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內涵與工作目標。本文自瑞典政府官方網站擷取其與女性主義、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對外行動的性別平等有關的十二篇不同場合的公開演講與聲明，論述與分析其價值觀與意識形態如何影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面向與內涵，呈現於表 2-2<sup>6</sup>：

---

<sup>6</sup> 本節所使用的演講與聲明資料，乃瑞典政府辦公室網站（<https://www.government.se/>）所提供之英文版本，並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表 2-2、瓦爾斯特倫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4 年 10 月	瑞典聯合國協會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Sweden) 於聯合國日 舉辦的研討會	說明瑞典競選 2017 — 2018 年期間聯合 國安理會成員的情況 並欲藉此機會擴大瑞 典參與聯合國的議程	將參與議程概括為四點：和平、社會平 等、性別平等、可持續性，並指出四者 之間相互連結，缺一不可；同時指出在 聯合國中，瑞典必須堅持女性主義的立 場，針對全球性別問題採取全面的方法， 並貢獻自身在衝突與和平建設中女性 作用的經驗。
2014 年 11 月	#femdefenders 研討會	Femdefenders 報告的 發布與反思全球在消 除針對女性暴力侵害 方面的進展	會中提及瑞典政府實施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從權利的角度積極解決權力關係 中的結構性與歷史性的不平等，並保護 女性享有人權，將成為整個社會繁榮和 發展的必要條件。
2015 年 3 月	阿拉伯國家聯盟會議 (League of Arab States)	針對阿拉伯國家聯盟 和瑞典未來的發展進 行演講	演講中指出人權是瑞典外交政策的優 先事項，不僅包含結社、集會、宗教和 言論自由，也包含打擊極端主義，並呼 籲與會者維護 20 年前在開羅達成的協 議，包括女性教育和保護婦女免受一切 形式的暴力，如割禮等。
2015 年 7 月	大學聯合畢業典禮 (Sciences Po joint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the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ISA) and the Master in European Affairs Class of 2015)	為畢業學生致詞並提 出個人的建議	瓦爾斯特倫提出的建議之一為「讓你的 價值觀成為你的支持力量」並說明其個 人的價值觀與信仰，即其相信女權即人 權，而性別平等是本世紀最偉大的未竟 事業之一，並相信政治至上，更好的生 活是可以實現的目標，人們有責任讓歐 盟變得更強大、讓全球世界秩序更美 好。
2015 年 10 月	瑞典為聯合國安排了一 場關於女性作為和平 建設者的會外活動：敘 利亞女性和平建設 (Syrian Women Peacebuilders)	說明女性主義外交政 策的內涵以及瑞典在 敘利亞女性、和平與 安全工作中優先考慮 的三個領域	其在開幕詞中介紹瑞典於性別平等的 重視與工作方向，也強調與和平的連 結，工作中優先考慮的三領域為：婦女 的參與會帶來可持續的和平、與衝突有 關的性暴力是必須面對的核心挑戰、關 注女性人權捍衛者的困境。
2015 年 12 月	在隆德 (Lund) 的演 講：人權、民主和法 治—動盪時期的挑戰	說明當代的挑戰以及 瑞典如何透過外交政 策和發展合作來應對 與做出貢獻	其提及瑞典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實 現所有婦女和女孩的人權，也認為此乃 民主、法治、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關鍵 與先決條件。
2016 年 2 月	全球反伊斯蘭國聯盟 小組會議 (Meeting of the Small Group of the Global Coalition)	如何應對伊斯蘭國造 成的危機以及滿足衝 突後的人道主義需求	說明在人道主義工作上，為了確保和 平，必須讓女性和男性參與重建社會的 努力，而瑞典正在為敘利亞婦女參與日 內瓦談判時提供助力，合乎女性主義外

	against Daesh)		交政策的指導框架。
2016 年 3 月	喬治城大學的女性、 和平與安全研究所 (Georgetown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瑞典外交部與研究所 提升合作並擴大關於 女性、和平與安全的 證據基礎，同時說明 未來的挑戰	演講中指出三個任務，分別為改善預防 衝突發生的措施、確保衝突後的和平具 有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各國以及國際和 區域組織必須加大力度支持和平社會， 並指出女性賦權是可以實現了有效和 可持續的和平建設，同時介紹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中的瑞典女性和平調解員網 絡項目工作。
2016 年 5 月	世界人道主義峰會 (World Humanitarian Summit) 會外演講	演講內容說明緊急狀 態中的性暴力問題以 及瑞典採取的方法與 倡議	說明瑞典透過女性主義外交和發展政 策，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加速促進性別 平等及女性賦權，也呼籲建立一個全球 聯盟，預防和應對基於性別的暴力，並 說明此種暴力源自性別權力的不平等 和基於性別的歧視。
2017 年 10 月	聯合國安理會中針對 女性、和平與安全的 第 1325 號決議辯論	說明全球性暴力問題 以及具體應對方法以 及瑞典的承諾	說明壓迫女性是一種全球性的困境，造 成世界各地的女性在決策中的代表性 不足、缺少資源、基本權利受限。並指 出具體應對方法與促進和平建設的穩 定，需藉由數據和分析、專業資源及婦 女組織和網絡來達成。
2017 年 10 月	阿爾漢格爾斯克大學 (university in Archangelsk)	針對「我們如何才能 讓我們的地區更加穩 定和安全？」進行演 講	瓦爾斯特倫針對問題給出五個答案：共 同努力應對共同挑戰、安全政治和建立 信任措施、性別平等、人文交流、巴倫 支合作 (Barents cooperation)。
2018 年 3 月	KTH 皇家理工學院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在 #WikiGapSthlm 的 演講中說明維基百科 (Wikipedia) 的性別 不平等問題	瓦爾斯特倫將維基百科的性別不平等 問題，連結到社會中對女性的忽視與壓 迫，如男性掌握知識與話語權，使得女 性不被看見，導致一半潛力未被開發。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2014b, 2015i, 2015j, 2015k, 2015l, 2016a, 2016b, 2016c, 2017a, 2017b, 2018b)

上述的資料呈現出瓦爾斯特倫在性別與外交政策領域的四個特質。第一，瓦爾斯特倫表示將透過政策實踐自身重視女權的價值觀。2015 年的大學聯合畢業典禮上，即表示要讓價值觀成為自身的支持力量，而其相信女權就是人權，性別平等乃本世紀最偉大的未竟事業之一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j)，在其他場合更進一步說明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包含 2014 年瑞典聯合國協會與 2015 年隆德的演講，指出性別平等是民主、法治、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關鍵，彼此之間相互連結、


缺一不可，讓社會理解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以及意義，並將責任歸屬於社會每一個人身上，需要一同建構更為平權的社會（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2015l）。

第二，瓦爾斯特倫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特別重視性暴力與和平安全議題，並結合過往的工作經驗，強化此面向的關注。本文引述的十二篇演講中，除了2018年針對維基百科問題的探討，其餘皆談及暴力問題與和平建設，強調衝突中性暴力或基於性別的暴力如何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也論述女性於和平建設及參與過程中的重要性，如2014年瑞典聯合國協會、2015年「敘利亞女性和平建設」的演講中強調安理會第1325和1820號決議文<sup>7</sup>的意義，女性在和平建設過程中的作用對於實現和平與可持續性至關重要，瑞典的目標即在戰爭與承平時強化女性人權、改善獲取資源的機會、增加女性的代表性等（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2015k）；而2015年阿拉伯國家會議、2016年的世界人道主義峰會中，也重視女性安全並反對一切形式的暴力，明言要求與會者避免女性割禮或性騷擾，同時重視緊急狀態下女性遭受性暴力的風險處理（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i, 2016c）。瓦爾斯特倫對於性暴力與女性和平安全的重視，與他過往的工作經驗高度相關，其曾擔任聯合國衝突中性暴力問題的首任特別代表，具備相當的知識與概念，也能夠透過相關面向的經驗敘述議題重要性，更將此納入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面向中，使政策內容得以強化實踐安理會1325號、1820號等決議文的具體措施，而2014年10月在瑞典聯合國協會的演講中，就明確表示要貢獻自身在「女性於戰爭及建設和平中的作用」的工作經驗，提升瑞典參與聯合國的影響力與推動和平、社會平等、性別平等、可持續性等四個議程（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第三，瓦爾斯特倫積極宣傳與介紹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透過瑞典經驗呼籲各國與全球參與性別平等事務，並輔以政策與具體工作說明，發揮瑞典在國際事務的作用力。2015年在隆德的演講，說明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目標，即實現女性人權，亦為民主、法治、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先決條件（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l）；2016年的人道主義高峰會與喬治城大學研究所合作的演講中，也指出瑞典

---

<sup>7</sup> 聯合國安理會第1820號決議文重申第1325號決議文的關注內容，展現消除針對婦女和女孩的一切形式暴力的決心，包含有罪不罰等現象，以此確保各國根據國際人道主義法和國際人權法所承擔的義務，在武裝衝突期間和武裝衝突後保護包含女性或女童在內的平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08）。



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加速推動性別平等與女性權利，並呼籲各國建立一個全球聯盟，以預防和應對基於性別的暴力，如瑞典女性和平調解員網絡的建立，不僅強化國家影響力，更跨越國界與來自全球的國際女性調解團隊建立合作網絡，藉由經驗交流、技術學習與資訊共享，促進可持續的和平發展(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6b, 2016c)。顯示瓦爾斯特倫作為瑞典外交部長，相較於洛夫文更重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論述也更加全面，由此推測瓦爾斯特倫於外交政策的著力更深，將個人價值觀重視的性別平等、女性和平與安全等議題納入政策中，而非僅著重於經濟賦權或勞動參與。

第四，瓦爾斯特倫認同女性受到壓迫或歧視來自於結構性的社會規範，注重從法律、代表性、教育、權利、資源分配等制度性方面進行改革，以強化女性賦權與改善處境，使得其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重視比洛夫文著重經濟來得更為廣泛。2014年瑞典聯合國協會的演講中，即指出要積極解決權力關係中的結構性和歷史性不平等，使得瑞典採取全面的方法，涵蓋更多面向(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而#femdefenders 研討會上，更說明其個人的雄心是從權利角度解決權力關係中的結構性不平等，而保護女性享有人權是社會繁榮與發展的必要條件(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b)；2018年在KTH皇家理工學院的演講中，亦指出社會在權利、資源、代表性與歷史地位等議題上排除了女性，導致其受到壓迫與忽視的困境(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b)，顯示了瓦爾斯特倫皆以更系統性的觀點實踐性別平等，關注廣泛領域的女性賦權。

經由本節資料分析，瓦爾斯特倫對於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有關鍵的影響。政策的出現連結到外交部長的參政經驗與價值觀中，使政策內容不僅涵蓋經濟面向，亦連結到代表性、資源分配與基本權利等議題，更重視性別平等的實踐與目標，對應到瓦爾斯特倫論述的結構性與歷史性壓迫，並欲從根源解決女性困境；而瓦爾斯特倫曾擔任聯合國衝突中性暴力問題的首任特別代表，使其特別關注性暴力與和平建設的面向，在政策內文中以及分享政策經驗時，時常都會提及女性對於和平建設時的參與及代表性，以彰顯相關議題的重要性。顯示出瓦爾斯特倫過往經驗與價值觀培養出其所關注的面向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重視的性別平等與國際承諾高度連結，而這些經驗於外交政策的議程設定與內容論述上有高度的影響力，同時也使得其成為政策的關鍵領導人，關注更廣泛領域的平權實踐。

此分析結果也應證 Björkdahl (2008) 的文獻，外交部長不僅擁有政治權力及權威，也擁有資訊、政策制定或程序安排等資源，來發展或採用新的外交政策理念或改變外交政策方向。而一位外交政策領導人堅定於特定的理念、意識形態或議題，並投入心力來推動並塑造外交政策的方向，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對外交政策的產生有相當的作用力 (Björkdahl, 2013)。Bäck 及 Björkdahl (2017) 在分析瑞典歷屆外交部長的演講研究中，指出外交部長的性別對外交政策議程有相當的影響力，尤其當女性外交部長是「政治重量級人物」，並與左派的總理在內閣中工作時，提出的外交政策會更女性主義。瓦爾斯特倫因個人自身的經驗、價值觀與關懷領域，使瑞典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目標設定為性別平等的實踐，並在政策內文中關注了更廣泛的領域，同時納入其相當重視的女性和平與安全等議題，影響了政策的形成與側重面向。

### 三、政黨

在政黨方面的分析，外交政策也可能受到政黨政策主導。本文因洛夫文與瓦爾斯特倫黨籍皆為社會民主工人黨，將主要探討社會民主工人黨的政黨價值與政見，不過 2014 年的聯合內閣也納入綠黨，由於無法確認兩黨對於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道為何，也會將綠黨的政黨價值與政見納入考量，以下將就兩黨的政黨價值（如意識形態）、黨綱、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性別平等政策的論述進行分析<sup>8</sup>。

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政黨基本價值即重視平等價值與權利，並依循社會民主主義來形塑政見，建立一個以民主理想和所有人平等價值與權利為基礎的社會，更說明平等是自由的前提，在平等發展之下，人們才能享有自由的生活 (Socialdemokraterna, 2022a, 2022b)。而促進平等最重要的方法便是創造就業機會與解決失業現象，同時對抗種族主義、性別歧視、恐同現象，如此便可維持社會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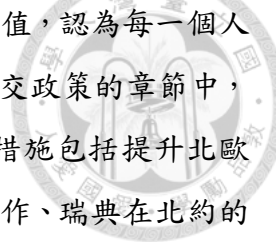
<sup>8</sup> 本節透過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與瑞典綠黨的官方網站提供之資料加以分析，因部分研究資料僅提供瑞典文，如 Socialdemokraterna (2013, 2022a, 2022b, 2022c, 2022d, 2022e, 2022f, 2022g, 2022h, 2022i)、Miljöpartiet de gröna (2013, n.d.a, n.d.b, n.d.c, n.d.d, n.d.e, n.d.f, n.d.g)，為方便本文研究、讀者理解與閱讀藉，由翻譯軟體譯成中文；其餘由兩黨提供英文版本之資料，則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另外因社會民主工人黨官方網站與綠黨官方網站部分資料已更新至 2022 年或未顯示文件更新日期，故無法如研究設計限縮至 2019 年的研究範圍，但因此部分多為政黨政策，仍可反映出政黨對於性別平等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價值或影響力道，所以本文仍將 2022 年的資料納入討論與分析。

利體系以及建設共享的社群體制，並擁有團結一致的瑞典（Socialdemokraterna, 2022a）。

除此之外，社會民主工人黨也相信在政策積極推動之下，可以矯正體制性的問題。在 Brandal 等人（2013/2021）的研究中，指出社會民主運動的根本任務之一為透過和平社會的促進來保護與提升社會成員的自由，依循此基本原則，社會民主主義的支持者最迫切的任務就是對抗壓迫，透過「政治至上」的原則，相信集體政治行動能夠解決社會共同問題，並尋找機會來推動改革，實踐更自由、更平等、更和平的社會。此也對應到該黨 2013 年的新黨綱也：「我們可以一起創造更美好的未來，社會民主主義歷史上最重要的教訓即是：社會可以改變。」（Socialdemokraterna, 2013, 2022c）。

而瑞典綠黨則超脫國界、物種、時間，其將意識形態描述為三種方式表達的團結，分別為：「與動物、自然和生態系統團結」、「與子孫後代團結」、「與全世界人民團結」（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a），在最新的 2013 年黨綱裡，此三種團結對應到幾項基本理念，包含參與式民主、生態智慧、社會正義、兒童權利、循環經濟、全球正義、非暴力、平等、女性主義、動物權利等（Miljöpartiet de Gröna, 2013），認為綠黨的政策在考量時，應優先注重環境與務實，並重視平等的實踐及永續發展，更說明綠黨是一個女性主義政黨，將有目的地為每個人的平等權利、充分的機會參與社會而努力（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b）。此體現出兩黨在價值觀與意識形態上皆重視平等，也相信並強調透過具體的政府與政治力量，來改變社會中不平等的問題，並以此改變與對抗壓迫，促進社會成員的自由。

而兩黨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中，社會民主工人黨比綠黨更支持瑞典在推動上的力道，同時於該黨網站中提出相關政見。社會民主工人黨在官方網站說明：「瑞典必須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加強女孩和婦女的權利、代表性及資源。平等本身就是一個目標，也是實現和平、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Socialdemokraterna, 2022d）除了將外交政策連結到性別平等的實踐外，也指出社會民主工人黨的願景，包含成為聯合國的領導者、在全球推進婦女權利、促進聯合國性別平等觀點、讓女性在和平建立與維持的工作中發揮作用、瑞典需打擊所有性暴力（Socialdemokraterna, 2022d）。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實踐，反映了該黨對性別平等以及對女性充分享有人權的承諾，指向平等的概念，而平等、和平與可持續



發展相互連結，能夠促進更穩定與安全的社會，連結到政黨的價值，認為每一個人  
都平等也享有自由的權利，並透過實際政策加以實踐。另外在外交政策的章節中，  
社會民主工人黨強調其安全政策乃維持和平及防止戰爭，具體措施包括提升北歐  
地區的合作、更積極的波羅的海政策、強化與歐洲及聯合國的合作、瑞典在北約的  
成員資格，更提及女性在參與衝突預防和危機管理的重要性，認為這是穩定和平的  
條件，必須根據聯合國第 1325 與 1820 號決議文來形塑相關對外行動與政策，促  
進女性權利與觀點在和平與安全工作中得到更好的實踐 (Socialdemokraterna,  
2022e)。由此可發現社會民主工人黨在外交政策各部分的宣示，不僅重視性別平等，  
也突出性暴力、女性安全與和平等面向，也顯示瓦爾斯特倫的政策方向與政黨關注  
相互輝映，社會民主工人黨透過政黨力量支持了外交部長的政策實踐。

綠黨的部分更關注外交政策在氣候正義的實踐。該黨說明脆弱國家的女性更  
容易受到氣候變化的衝擊，並認為瑞典必須為世界正義、和平與可持續發展發聲，  
而綠黨將透過基於人權的綠色外交政策來實踐目標，除了需要讓更多國家承擔氣  
候責任，也需要阻止向獨裁國家出口武器，爭取人權和民主權利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c)。援助方面亦提及平等是可持續發展與脫貧的關鍵，支持瑞典投資於  
氣候和援外行動，改善脆弱國家女性的生活，賦予女孩與男性相同享有健康、教育、  
工作和民主參與社會的機會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d)。兩黨雖皆重視女性主義  
外交政策並對性別平等表示支持，不過在論述上也有所差異，社會民主工人黨圍繞  
在女性權利、代表性及資源等相關論述，較少談及環境保護與氣候不正義的現象；  
而綠黨更為重視環境保護的概念，連結到該黨的政策原則中，體現了「環境優先」  
的價值，但在和平建設的論述上較少著墨，顯現出綠黨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  
力道不如社會民主工人黨，未能將側重環保或綠色等價值實踐於政策中。

除此之外，兩黨在不同政策中都納入了性別平等的考量，而社會民主工人黨更  
透過女性主義的政黨認同，在各政策中重視性別平等，加以倡議與遊說選民支持。  
該黨「女性主義與平等」的政策中，即論述：「社會民主工人黨是一個女性主義政  
黨，女性和男性在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必須擁有相同的機會和權利，男人和女人不僅  
是平等的，也必須被平等對待。」(Socialdemokraterna, 2022f) 並指出已實行的政  
策，包含減少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對女性工作環境的投資、提高育幼津貼與住  
房津貼等，相信透過實際的矯正措施，可以促進更平等的社會，達到更安全的瑞典。

Brandal 等人 (2013/2021) 的研究中也回溯 1970 年代，北歐的社會民主政黨重視積極自由的概念，透過政策處理性別不平等的問題，重視人們的自主選擇。其他政策則分別關心性暴力防治、強化警察司法部門、推動積極同意的法律、設置針對出於榮譽維護的特殊犯罪<sup>9</sup>的懲罰，或關注墮胎權利、LGBTQ+ 權利等 (Socialdemokraterna, 2022g, 2022h, 2022i)。綠黨的部分則在不同政策強調反對歧視的重要性，具體作法包含加強對加害者的制裁、支持歧視受害者、強化反歧視工作、應對仇恨犯罪等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e, n.d.f)。而在「女性主義必須走得更遠」的政策章節中，也重視終止男性對女性的暴力、榮譽犯罪、促進社會對家庭和育兒的公平責任、實施關注氣候、援助與和平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賦予女性應有的權利、薪資或養老金等社會福利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g)。

雖然綠黨重視的環境面向未體現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但因綠黨對於性別平等的高度支持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相似，使得政策可以順利推動。洛夫文與瓦爾斯特倫早年即加入政黨並擔任要職，在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薰陶下，培養了重視「平等」的意識形態，使得後來兩人在女性主義政府與外交政策的推動上，具備相當的動力與支持，而洛夫文上台後任命瓦爾斯特倫為外交部長，也讓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寫入社會民主工人黨與綠黨的政策中，呼應了兩黨的意識型態與關注面向，不過政策主軸上較未提及環境保護，3R 對應的六個面向關注的乃是免於暴力、和平建立、政治參與、經濟賦權等，可發現綠黨的影響力不如社會民主工人黨。

## 貳、制度層次

依據黃奎博 (2011) 與蔡明彥 (2013) 的論述，外交部門的行政運作或是政治機構也會影響外交政策的內容與運作，由既有的模式形塑外交政策的關注面向，而

---

<sup>9</sup> 本處原文為 *särskilt brott för hedersförtryck*，意旨針對榮譽維護的特殊犯罪，根據瑞典國會於 2022 年通過該項刑事犯罪的定義，指涉加害者出於維護名譽的動機對某人反覆實施某些犯罪行為，且這些行為已侵犯該人的完整性，同時嚴重損害該人的自尊 (Sverige Riksdagen, 2022)。而在 Elakkary 等人 (2014) 針對涉及名譽的暴力或犯罪 (Honor Crime/ Honor killing/ Honor Based Violence) 的研究中，認為所有形式的名譽暴力特徵是，不僅由男性伴侶或丈夫實施，加害人也可能是其他家庭成員，如雙親、手足或表親等，並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參與暴力犯罪，而目的是為了維護家庭名譽，相信該行為是「名譽淨化」，並於此種情況下，正當化對女性的折磨和殺害。而榮譽涉及女性在文化規範或傳統中被指定的性角色或家庭角色，使得通姦、婚前性行為、疑似婚外懷孕、被性侵害、與「不合適」的人相愛等，都被視為損害集體家庭榮譽 (Elakkary et al.,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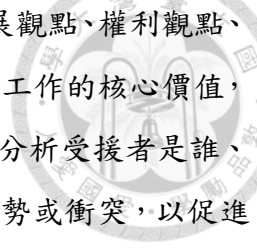
本節將分析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以下簡稱 SIDA）的組織運作模式、執行政策過程以及政策內容，為本文提供另一個觀點來研究如何影響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SIDA 為瑞典中央政府的發展合作機構，隸屬於外交部，對外代表瑞典國會與政府，致力於減少世界各地的貧窮與壓迫，投資或支持世界上所有人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促進各國的安全、民主與和平（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IDA], n.d., 2023;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n.d.）<sup>10</sup>。其運作過程乃依照政府法規、政策規範、戰略與預算等進行（SIDA, 2023），並與社會不同領域的部門進行合作，在經驗中學習與評估行動成果，以在特定情況下能夠提供足量與適合的援助，合作對象包含公民社會組織（如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多邊組織（聯合國、世界銀行或歐盟等）、公共部門（瑞典政府機構，如瑞典統計局、環境保護局、稅務局等）、私營部門（如企業公司等）、研究機構（SIDA, n.d.）。對外援助資金籌措方面，以 SIDA 在 2020 年的預算為例，瑞典國會裁定對外援助的預算，總額為 460 億瑞典克朗（約 1309 億新台幣），相當於國民總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的百分之一，其中 SIDA 管理著 440 億（約 1253 新台幣），另外為了在全球實現可持續發展並填補資源空缺，SIDA 還強化與夥伴國家、企業、投資者的合作，以充沛相關金錢、技術、知識等資源，包含透過健全他國稅收制度、建立基金、設置基於績效的融資計畫、與私部門合作實施發展項目、與他國研究單位合作以促進技能發展與創新等（SIDA, 2020a）。另外在與多邊組織的活動中，SIDA 的援助工作有一半提供給多邊組織，且有三分之一的預算透過聯合國機構提供，並為貢獻於貧困社群的發展，兩方形塑的合作特點與原因，乃聯合國機構有獨特的機會為全球政策制定做出貢獻，同時支持各國實現其國際承諾及國家發展目標（SIDA, 2021a）。在員工管理的部分，以 SIDA 在 2020 年的資料為例，成果報告指出其下有 643 位員工，其中 481 為女性（69%）、162 為男性（31%），而機構為了提升內部針對技能發展與經驗多樣性，抵制任何形式的歧視，並招募各種背景與身分的員工，使 2020 年員工性別分布相較以往更加平均（SIDA, 2020）。

SIDA 援助的總體目標為改善處於貧困或壓迫中的人們的生活，為了實現此目

---


<sup>10</sup> 本節主要透過 SIDA 與瑞典政府辦公室的官方網站提供之資料加以分析，因部分資料僅提供瑞典文，如 SIDA（2012, 2013, 2020b, 2020c, 2020d, 2021a, 2021b, 2021c, 2021d, 2022a, 2022e, 2023）等官方文件資料，將透過翻譯軟體譯成中文，方便本文分析與理解，其餘資料則由網站提供之英文版本，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標，瑞典的援助必須從五種不同觀點出發，分別為窮困社群的發展觀點、權利觀點、衝突觀點、平等觀點、環境與氣候觀點。此五項觀點形塑瑞典援助工作的核心價值，任何合作需基於受援者的情況、需要、條件和優先事項來規劃，分析受援者是誰、對生活樣貌的定義、受到什麼傷害等，同時注重已存在的緊張局勢或衝突，以促進和平及可持續發展（SIDA, 2021b）。而 SIDA（2021c）進行援助的目的，乃是創造民主、平等、經濟發展和可持續和平的世界，並讓人們可以擁有自己改變生活的能力，透過合作、財政支持與相關知識，為窮困與壓迫中的人們提供更好的生活條件。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所有國家是連結在一起並相互影響的，因此當瑞典與全世界的夥伴共同解決全球問題時，瑞典也會變得更好，指出：「一個更加民主、平等、公正、永續與和平的世界對每個人都有好處。」

該組織執行政策的援助類型，分別為發展合作與人道主義援助（SIDA, 2021d）。發展合作指涉對其他國家發展的長期支持，主要是針對貧困問題進行長期的協助，以及讓各國變得更加民主，可能透過雙邊或是多邊的合作來進行，並以多種形式提供資源給組織、國家或地區。人道主義援助則是緊急狀態下的支持，如在武裝衝突、天災或其他危險局勢時提供協助，捍衛人們的尊嚴，主要目的乃拯救生命、減輕人們的痛苦，相關作為包含供給食物、營養補充、住所、水資源、衛生設施，或是支持基本醫療保健、教育服務等，另外人道主義援助亦包括保護工作，協助將人們從戰區撤離、提供臨時庇護所等。而 SIDA（2021e）也強調人道主義援助需維持永遠平等的觀點，意旨需要考量所有人的不同需求及條件，如女性在戰爭時容易遭受性暴力；而男性則容易面臨大規模處決而喪命。

在援外行動中，SIDA 特別重視性別平等的實踐，也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一步強化承諾與重視。SIDA 認為性別平等本身即目的，是對可持續發展與消除貧困的重要條件，對 SIDA 來說，性別觀點會滲透到其大部分的工作項目中，並致力於強化女性和 LGBTQI 社群的人權，減少基於性別的暴力、促進婦女的經濟權能（SIDA, 2022）。Kouvo（2019）說明，SIDA 專注於女性的人權，近十年的發展更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項目中。2019 年瑞典外交部公布的政策計劃中（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9a），表示外交部將繼續推動人道主義中的性別觀點，並透過與 SIDA 的《2021—2025 年人道主義援助戰略》加強性別主流化的實踐，包含性別分析、應對戰略或過程追蹤與監控等，藉由將女性納入協商和決策過程，來確保



她們的主體性與能動性。而在 SIDA 所有提供的資金中，80%將性別平等作為主要或次要目標，且無論領域為何，所有項目皆符合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致力於性別平等，具體實踐的內容包含使性別平等受到關注、降低孕婦死亡率、實踐更多國家的法律改革等 (SIDA, 2022)。除此之外，在 2021 年的工作概要中，SIDA 表示瑞典長期以來致力於在發展合作和人道主義救援中實現性別平等與增進女性權能，而政府的政策框架如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 SIDA 《性別平等行動計畫》都強化了這部分的承諾 (SIDA, 2021f)。

SIDA (2020c) 除於官方網站中說明推動性別平等的原因與重要性，也說明具體的工作方法，如各項工作中實施性別主流化，納入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影響評估等，並時時監測政策對於不同性別的衝擊為何，同時相關的工作也須注重交織性狀況，意即在生理性別之外，還須納入性傾向、性別氣質、性別認同等元素，以避免產出的論述或行動無法彰顯政策的成效與問題 (SIDA, 2020c)。

SIDA 對性別平等的重視，體現在許多具體工作成效中，且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實施後，SIDA 對性別平等的重視有所提升。以 2019 年為例，該年援助結果中的性別平等部分，SIDA 成功透過與其他國家、企業、非營利組織、民間組織等公私部門合作，促進了二十五個國家改革法律體制，包括玻利維亞通過法律要求所有政黨政策須有利於性別平等、烏干達加強女性在婚姻與離婚後的權利、獅子山共和國內的童婚被禁止等；在經濟賦權上的成效則包含支持孟加拉的女性經營中小型企業，促進更多女性理解他們在勞動市場中的權利 (SIDA, 2020d)。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部分，對避孕建議、愛滋病毒的檢測及照護支持，已擴及波札那、賴比瑞亞、莫三比克、尚比亞中數萬名年輕人；暴力問題的處理，SIDA 也提供支持予瓜地馬拉司法機關，強化司法機關在調查與性別有關的暴力行為的能力，並培養從權利角度支持犯罪受害者；在阿富汗內，SIDA 也促使更多的阿富汗女孩受教育 (SIDA, 2020d)。除了性別平等的貢獻，其餘如經濟、民主發展、言論自由、教育平等、人道主義工作中也有所成效。2019 年發布的同儕國家審查<sup>11</sup>結果也說明了 SIDA 的援助貢獻，該年瑞典的官方發展援助、和平與衝突預防、環境可持續性和性別平等方

---

<sup>11</sup> 此同儕審查乃 OECD 的發展援助委員會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 的發展合作同行審查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eer Review)，為 DAC 成員的政策和計劃約每五年接受一次的嚴格審查，藉由同行評審來評估各國的政策、績效和實施情況。




面的發展處於全球領導地位，同時亦被指出是一個慷慨的援助者，提供相當預算給予官方發展援助計畫 (OECD, 2019)。另外瑞典在提供以性別為重點的援助方面也處於 DAC 領先地位，2017 年時，其 87% 的雙邊可分配援助將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作為主要或重要目標，SIDA 亦支持其員工透過一項新的全球戰略 (性別平等網絡) 在瑞典的項目中實施性別平等 (OECD, 2019)。而相較於以往，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提出後，SIDA 更重視性別平等的意義與重要性，上一屆 OECD (2014) 針對瑞典與 SIDA 的評論，指出瑞典 2003 年的全球發展政策 (Policy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為其發展合作體系奠定堅實的基礎，並將重點放在減貧和 2007 年確定的三個優先主題上：民主和人權、環境和氣候變遷、性別平等和女性在發展中的作用，說明選定出此三項主題乃因政府認為此部分是減少貧困的關鍵要素 (OECD, 2014)，顯示 2007 年的援助行動將性別平等視為實踐減貧的手段，但 2014 年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則將性別平等視為目標，乃需要努力實踐的基本人權，連帶影響著 SIDA 的行動計畫與目標設定。

SIDA 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提出後，促進部門的文化轉變，使得執行政策相較以往更注重性別平等，將性別觀點納入所有項目中，同時也融入到外交部門，與所有工作人員積極協商，制定一套全面的實施方針，促進瑞典強化使用其所有外交政策工具來解決性別平等問題 (OECD, 2019, 2021)。在瑞典利用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的身份，其積極推動女性參與和平與預防衝突，並建立瑞典女性調解網絡，該網絡在阿富汗、蒲隆地、索馬利亞、蘇丹、敘利亞、葉門、辛巴威等國積極開展工作，以應對婦女在國際調解與和平進程中代表性不足的問題，促進各國和平建設的發展與女性經驗的採納。除此之外，Verezhak (2022) 指出，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指導下，SIDA 更加關注性別平等工作，在 2016 至 2018 年間的主要目標之一便是提升以性別平等為主的業務比例，同時更新並強化性別主流化的方法。SIDA (2017) (引自 Nylund, 2017) 更表示隨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出，瑞典強化了在發展合作中對性別平等的長期承諾。

除了上述的學者分析，SIDA 這幾年的變化與進步，亦可藉由 WayBack Machine<sup>12</sup> 的比對，呈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實施前後 SIDA 於官方網站中對性別平

---

<sup>12</sup> Wayback Machine (<https://web.archive.org/>) 乃由美國非營利組織 Internet Archive 建立的數位檔案庫，允許用戶查看網站過去的資料與模樣，因 SIDA 會持續更新，若要看洛夫文內閣上任前的資



等的論述與政策。在 2013 年的官方網站中，SIDA 對性別平等的論述指向平等重視、和平與預防衝突、減貧的目的，說明了提升平等在所有援助中都很重要，並指出女性因在各領域缺乏資源與機會，更容易受到貧困和不公正的影響(SIDA, 2013)。而減少戰爭和衝突的風險，以及為衝突地區的和平與和解努力，也是瑞典提供援助的重要領域，SIDA (2013) 支持以和平方式預防衝突，說明任何人都不應該生活在脆弱和不安全之中，在人道主義危機的情況下，應積極提供適量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醫療保健、教育等，並防止暴力、性虐待，促進衝突後的重建與和解，更指出應依據安理會第 1325 號決議，提供衝突中的女性特殊保護，並保證女性在預防、管理和解決衝突的工作中具有充分和平等的影響力。而這些工作的重視，都關係到援助的總體目標，即減少貧困，說明人的安全對有效減貧至關重要(SIDA, 2013)。顯現出不同時期的政府對於性別平等本身重視的程度及有所不同，2013 年雖也關注性別平等與平等觀點的實踐，卻將其指向減貧的總體目標；而 2020 年，SIDA 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指導框架下，指出性別平等本身即為一項人權，是需要被實踐的目標，同時也將性別平等的觀點置放在所有工作領域中，需要更全面與系統性地面對性別議題。

在瑞典的案例中，制度層次中援外組織既有的工作內容與經驗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制定面向，但政策目標與問題意識的論述仍由政策的關鍵領導人所主導。本節在相關資料與官方文件中，發現 SIDA 長期具備重視性別平等的價值，也進一步發展相關措施以促進平等實踐，不過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動之下，促進援外組織的變化，關注更廣泛領域的平等實踐，提升性別平等的重要性，成為政策本身目標，顯示出制度既有的發展可以提供給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背景，但具體的關懷領域與政策目標，仍依靠著行動者層次的政策領導人。

## 參、公民社會層次

公民社會層次也會影響一國外交政策的產生，包含民意、公民社會、民間運動等 (Moravcsik, 1991; Robinson, 2008; 蔡明彥, 2013; 陳瑄毓, 2014)。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非由公民社會發起，而是由國家宣布施行 (Achilleos-Sarll et al., 2023)，

---

料，本文將藉由 Wayback Machine 理解 SIDA 過去的政策內容，以論述實際變化。

那在國家推出政策之後，公民社會如何影響政策的走向與重視，則為本節的焦點，於瑞典案例中，將關注 CONCORD Sverige 的意見論述與政府回應<sup>13</sup>。

CONCORD Europe 為一個致力於可持續發展與國際合作的歐洲非政府組織聯盟，創建目的乃各歐盟國確保歐洲政策促進永續經濟、社會和人類發展，並在人權、性別平等、正義和民主的基礎上解決貧困根源，而性別平等屬於 CONCORD Europe 設定的優先事項之一 (CONCORD Europe, n.d.)。CONCORD Sverige 為 CONCORD Europe 聯盟成員之一，由民間社會中 81 個組織集合而成，目的乃一同致力於建立一個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工作內容則由組織成員相互協調，形塑組織對外的政治要求與優先事項 (CONCORD Sverige, n.d.a)。於此關懷與價值之下，其針對瑞典性別平等發展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提出相關的論述，因其成員數量多、意見涵蓋豐富，並針對性別平等政策提供具體論述，相較於單一組織的想法表態，CONCORD Sverige 代表的民意更為廣泛，所以本文將以 CONCORD Sverige 為標的，分析公民社會層次如何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評價與影響該政策的關注目標。

CONCORD Sverige 的組織核心價值與目標為平等。在平等論述的部分，其致力於在瑞典與歐洲制定外交政策，以消除社會對婦女、女童、非二元性別社群的結構性壓迫，而其組織觀點表示將透過女性主義的角度，繪製出權力分配與社會結構性壓迫之間的聯繫，以此對政策制定者提供相關建議與分析，並藉由後續審查或倡議工作來影響瑞典與歐盟的政策，維護每個人的平等價值和權利 (CONCORD Sverige, n.d.b)。其相信平等是消除貧困和實現可持續和平與發展的先決條件，指出女性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若限制他們參與家庭或政治決策的權利，抑或排斥他們參與經濟或勞動市場，不僅會壓迫其基本人權，更會影響整個社會的發展 (CONCORD Sverige, n.d.b)。

在瑞典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CONCORD Sverige 便持續進行意見反饋，以期能改善政府施政與計畫 (CONCORD Sverige, n.d.c)。如 2022 年大選之前，該組織的二十五名成員便支持及呼籲各方持續支持與推動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另外，CONCORD Sverige 也於 2016、2017 年製作相關報告，評估外交政策的各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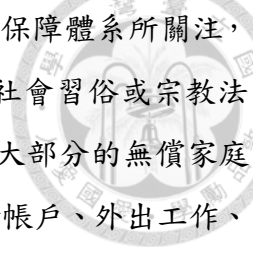
---

<sup>13</sup> 本節主要透過 CONCORD Sverige 官方網站提供之資料與報告加以分析，因部分資料僅提供瑞典文，如 CONCORD Sverige (2014, 2016, 2017, 2018, n.d.a, n.d.b, n.d.c)，故藉由翻譯軟體譯成中文，方便本文分析與理解，其餘資料則由網站提供之英文版本，由吾人翻譯成中文加以論述。

面向，並就如何進一步強化女性主義提出建議，2018 年也製作《公民社會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宣言》(Civilsamhällets declaration for en feministisk utrikespolitik)，呼籲瑞典所有政黨支持此外交政策。而 CONCORD Sverige (n.d.c) 也說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重要性在於瑞典政府必須努力打破世界上盛行的性別權力秩序，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捍衛每個人的平等權利，尤其在全球反女性主義思潮下，此外交政策成為必要的反制力量，瑞典須將女性權利置於所有國際關係議程的首位，並於歐盟和聯合國內部促進各國履行承諾，改變當今的權力結構。

CONCORD Sverige 無論是在 2016 或 2017 的報告，皆使用交織性的平等觀點來進行分析與論述，認為平等不僅是一項總體原則，更是一個應該實踐的目標 (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其分別於 2016 與 2017 出版《瑞典的外交政策有多女性主義》(Hur Feministisk är Sveriges utrikespolitik)，述及組織肯認外交政策對重要表態與行動努力做出的貢獻，而這些行為也對全球女性的權利產生重大影響；同時兩報告也說明了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未關注或是需改善的領域，包含發展合作中的農業援助與非正規經濟關注、國際武器與軍售政策、貿易政策、移民與難民政策、環境與氣候政策等面向，而這些領域的忽視或是相關措施可能導致某些瑞典政策在特殊情況下不僅沒有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做出貢獻，甚至可能會與政策設定的目標產生衝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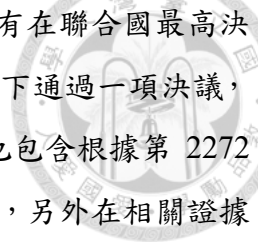
在發展合作部分，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肯定瑞典長期的努力，但是於農業援助與非正規經濟仍須加強相關計畫。CONCORD Sverige (2017) 肯認瑞典在 2016、2017 年提出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行動計畫以及 SIDA 的性別主流化行動計畫中，優先領域涵蓋了女性經濟賦權，加強女性參與及影響勞動力市場的權利與機會，但農業援助方面因為歧視性的立法、社會結構或規範，導致女性對農業相關的決策缺乏影響力與參與機會，不僅衝擊個別女性自給自足與獨立的機會，也無法有效改善經濟和社會狀況，特別是在確保孩童、家庭和整個社會的食物供應面。CONCORD Sverige (2016) 建議提升女性參與有關農業發展的決策機會，並引述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AO) 的估計，說明低收入國家的女性農民若能與男性同等的農業資源，將增加 20% 至 30% 女性於農業上的收成。2017 年的報告除了提及農業相關權利，更擴張到非正規經濟中的女性勞動參與，因政策行動計畫未提及非正規經濟的女性，導致女性從事的



相關工作受到忽視，同時因非正規經濟活動未受勞動立法或社會保障體系所關注，該活動中的女性缺乏主張權利的機會，甚至在部分國家受限於社會習俗或宗教法等正式或非正式的法律制度，使女性缺乏經濟賦權的機會，承擔大部分的無償家庭照護責任，難以接受教育或從事工作，如法律禁止女性開設銀行帳戶、外出工作、持有土地或繼承財產等，另外在申請信用貸款或不同類型的國家計劃支持中也較為困難（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若瑞典要實現性別平等，就需要在這些領域進行投資，增加對可持續農業的支持，並確保行動惠及女性，而在社會保障體系中，也須在合理成本與良好品質的前提下，擴大對照護工作者為重點的支持，確保社會保障出於平等觀點，賦予女性公平參與經濟的機會（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而性與生殖健康權利也是 CONCORD Sverige（2017）相當注重的面向。2016 至 2017 年政府相當明確地支持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發展，強調水、環境衛生、個人衛生對於安全護理、月經平權、減貧、降低兒童死亡率的重要性，也特別關注孕婦、母親與嬰兒的保健。但在人道主義援助的工作中仍有相當的改進潛力，由於在許多衝突中，性暴力常被用作戰爭的一部份，意味著嚴重侵犯女性的性權與生殖權利，從而導致性與生殖保健的需求增加，因此有需要將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納入性暴力相關的人道主義救援工作中，提高發展合作與人道主義援助工作之間的一致性。另外 2017 年的報告也探討 LGBTQI 的權利議題，指出若要在一個國家推動平等，就需要有權利捍衛者的民主空間，但現今社會卻面臨 LGBTQI 與女性權利捍衛者的民主空間縮小的困境，政府必須在對話與各種場合中不斷提出這個現象，並在最脆弱的环境加強對人權捍衛者的支持（如人權發展較差的國家），包含使用外交或政治施壓手段提出人權議題，或是透過外交部與當地民間社會合作尋找機會參與區域與國際論壇，應對民主空間縮小的困境（CONCORD Sverige, 2017）；2016 的報告也建議瑞典大使館設置涵蓋人權捍衛者的社群網絡，以推動相關倡議（CONCORD Sverige, 2016）。

和平與安全政策的部分，CONCORD Sverige（2016, 2017）肯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努力，此部分為相較以往最大不同的政策領域，也突出了瑞典對此部分的重視及野心，具體項目如女性調解員網絡的建立，強化女性參與和平建設的過程，透過培訓與支持衝突地區的女權運動者，讓女性在參與相關的行動中做出重要貢獻。



還有瑞典於 2017、2018 年擔任聯合國的安理會席位，使瑞典擁有在聯合國最高決策機構內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機會，如理事會在瑞典倡議之下通過一項決議，指出性暴力與基於性別的暴力可以構成國際制裁的基礎，其他也包含根據第 2272 號決議文<sup>14</sup>，致力於削減參與性暴力的外籍人士有罪不罰的現象，另外在相關證據證明發生性暴力時，也要積極尋求遣返外籍警察和軍隊回國的可能性，同時瑞典也努力建立一個具有管轄權的國際法庭，以起訴被指控施行性暴力等嚴重罪行的聯合國人員 (CONCORD Sverige, 2017)，不過 CONCORD Sverige 也認為，如果安理會缺乏政治意願，相關倡議也不會促成更好的決策，因此瑞典還需要持續推動，並建立聯盟要求聯合國各單位承擔責任。

然而，在和平與安全政策中，國際武器貿易則受到組織相當的譴責，指出瑞典政府應透過打擊不受規範的武器貿易來加強預防武裝衝突與暴力的工作，也要求瑞典必須簽署和批准《聯合國禁止核武器條約》(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以作為和平、人權與平等的推動者 (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2018)。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說明在武器較不受管制的國家中，較容易對女性的安全、經濟與社會參與產生重大的威脅，當瑞典與這些國家進行國際武器貿易時，就容易造成當地女性的受害，組織認為此顯然與女性主義和平與安全政策的目標衝突，瑞典女性主義政府必須遠離與任何可能導致侵害人權與對女性實施暴力的國家合作，如果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瑞典的全球發展政策是值得信賴的，就不能透過出口軍事設備來支持那些系統性反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所傳達價值與目標的國家，且須承認並重視武器貿易的正當性問題。然而瑞典政府卻於 2016、2017 年時，向沙烏地阿拉伯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出售軍事設備，被組織認為是違背政府追求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願景 (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CONCORD Sverige (2016) 也指出貿易政策亦是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較未關注的領域。政策相關政策文件和指導原則如商業與人權行動計劃、瑞典出口戰略等，均缺乏平等觀點，也因此具有相當大的改善空間，由於任何歐盟國家無法談判自身國家的貿易協定，需由歐盟作為一個聯盟來推動，因此，瑞典必須努力在歐盟貿易政策中加強性別平等觀點、確保歐盟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締結的國際貿易協定有進

---


<sup>14</sup>該決議第九項指出：「敦促所有會員國採取具體行動來防止聯合國維和行動成員進行性剝削和性虐待，消除此類行為不受懲罰現象。」(聯合國安全理事會，2016)。

行性別平等分析，以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移民與難民政策的部分，組織也提出相關的意見與反饋，指出瑞典措施缺乏性別影響評估。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指出近幾年女性難民獲得人權的機會減少，2016 年初時，政府針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來自其他申根國家的乘客進行強制性身分檢查（身分證或入境瑞典許可），雖是為了防止大量難民對公共秩序與國家安全構成威脅，但該措施對女性的打擊大於男性，因歧視性結構與規範的影響，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缺乏此類證件，且在部分國家，女性未經男性許可則無法獲得身分證件，對於未婚、喪偶、同性生活或配偶分居者，則無法獲得瑞典要求的身分證件（CONCORD Sverige, 2016）。另外瑞典也透過立法限縮家庭團聚的機會，導致女性與孩童更容易滯留在受衝突影響的地區或難民营，甚至走向危險的遷徙路徑，導致其更可能遭受性暴力與人口販運（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建議，瑞典政府需要提供包括女性、女童、LGBTQI 等在內所有人安全逃生的歐洲合法路線，同時加強瑞典移民局與歐盟對與性別相關議題的理解和尊重，增進 LGBTQI 與女性獲得庇護的機會，另外瑞典的女性主義政府應該遠離與任何可能導致人權迫害或女性受暴的單位合作。

而環境與氣候政策，也是 CONCORD Sverige (2016) 認為重要但政府政策未足之處。雖政府表態將確保女性在低碳發展與氣候適應推動的領域中具備相關的技能與知識培訓，並考量女性在氣候變遷中受到的影響，但是瑞典未能在歐盟環境與氣候援助計畫中確保令人滿意的性別平等觀點。CONCORD Sverige (2016) 認為，平等雖然是瑞典在《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 中推動的議題之一，但當談判變得艱難時，平等就逐漸受到忽視，爾後歐盟的環境和氣候援助計劃中，也缺乏性別平等觀點，因此建議瑞典須確保《巴黎協定》和《2030 年議程》(Transforming our Worl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中，在不同層級的行動計劃框架內關注性別平等以及女性的權利和賦權，另外全球層面、區域、國家和地方層級的氣候談判中推動平等代表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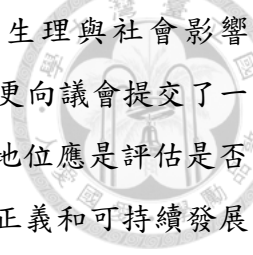
CONCORD Sverige (2020) 針對氣候政策也提出一份獨立報告說明，要求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須在更大程度上解決氣候與性別的問題。包含瑞典在修訂歐盟對《巴黎協定》的共同承諾時，優先考量強化性別觀點、採取具體措施讓女性參與、將性別觀點納入歐盟所有的氣候行動（CONCORD Sverige, 2020）。雖然瑞典



政府相較於在 2019 年推出的行動計畫，2020 年的政策已更關注與氣候相關工作中的女性權利，如保護女性環境運動倡議者、促進生態多樣性、增進女性在適應氣候變化的能力與影響力或是關於再生能源及自然資源的永續使用，顯示過去幾年取得了一些進展，但 CONCORD Sverige 認為仍然不夠，政府仍需繼續發揮作用，確保在國際氣候辯論、全球氣候、外交政策中關注性別平等，而為了給予女性穩定與可持續的發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方法必須更加激進、全面、變革性，包含對影響氣候與地球自然資源使用的經濟政策或是權力結構進行批判性分析 (CONCORD Sverige, 2020)。

針對 CONCORD Sverige 的意見，瑞典政府透過相關政策進行部分回應，包含於 2018 年提出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 以及 2020 年提出的《2019 至 2022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瑞典外交行動計劃》(The Swedish Foreign Service action plan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2019–2022, including direction and measures for 2020)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0)。在發展合作的部分，政府指出 SIDA 在 2016 至 2018 年的性別主流化計畫中，欲提升包含農業在內的生產領域的性別平等，並將持續關注與監測過程，具體工作包含 SIDA 支持一項名為《HARVEST》的生計與糧食安全計畫，致力於提高長期糧食不安全與脆弱社群的生產潛力，該計畫發現性別不平等乃社區農業發展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由於女性農民在獲得土地、經濟、信貸、農具等資源上受到限制，導致近 50% 的生產潛力無法被開發出來，而《HARVEST》透過以夫妻為基礎的培訓方法，來提升女性在農業上的發展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

國際武器貿易的問題，瑞典政府則以裁軍與武器不擴散的政策來進行回應，其重點從實施領域內的性別主流化出發，認為應該提升女性於此部分的代表性與參與度，並致力於宣導武器獲取與擴散如何不同程度地影響女性與男性。另外瑞典在國際武器審查、核武裁軍、核不擴散的部分也推動性別平等，如瑞典在研究部分做出貢獻，指出小型武器的集中可能會導致社會衝突與暴力事件，並針對武裝暴力後果進行性別分析與統計，促進小型武器國際談判中的性別主流化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除此之外，瑞典也在聯合國武器貿易條約 (the Arms Trade Treaty, ATT) 等國際武器檢查、打擊非法武器貿易和裁軍進程中提倡性別平等觀點，強調締約國應考慮到出口物品是否被用於或助長基於性別的暴力或針對



女性暴力，說明引爆和核武試驗對女性將造成不成比例的生理與社會影響（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政府於 2017 年 10 月更向議會提交了一份關於加強軍事裝備出口管制的提案，表示武器進口國的民主地位應是評估是否可以成為軍售對象的核心條件，也須評估軍售是否會對該國的正義和可持續發展造成負面影響（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另外 2018 年時，瑞典亦支持聯合國裁軍研究所（United Nations Institute for Disarmament Research, UNIDIR）等機構努力將性別平等觀點納入多邊裁軍平台（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在 2020 年提出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行動計畫中，政府進一步將裁軍與不擴散的重點置放於確保國際會議上改進統計數據、強化性別分析和實現更性別均衡的代表性，如在核不擴散條約（Treaty on the Non-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NPT）締約國審議大會上實施性別主流化（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0）。相較 2014 至 16 年向女權發展低落的國家出售武器，2018 年的外交政策手冊中，針對國際武器貿易如何進行、裁軍、武器不擴散等問題，進行更為詳細地論述與關注。

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中，亦針對貿易政策回應，指出瑞典的貿易政策本身即具再分配的作用與性別平等觀點，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將進一步提升實踐與促進進步、公平貿易政策的雄心，增進女性的經濟權能（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具體內容包含在針對全球目標和發展籌資的協議中支持性別觀點，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主要經濟論壇提供建議，如提升女性的重要性與勞動參與。在歐盟內部，瑞典持續將性別平等納入貿易政策，並提供相關方法鼓勵其餘國家跟進，其與聯合國貿易機構（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UNCTAD）合作提出了一套工具方法，包含評估貿易政策行動對女性和性別平等的影響，來貢獻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技巧（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除此之外，瑞典亦支持隸屬於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並旨在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小企業進入全球貿易市場創造合適條件的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ITC），一同致力於貿易中的性別平等及女性企業發展，共同發起 #SheTrades<sup>15</sup> 倡議，在 2020 年之前將 100 萬名女性企業家與市場聯繫起來，消除女

---

<sup>15</sup> #SheTrades 倡議致力於協助女性克服在參與市場時面臨的障礙，讓女性獲得貿易機會，透過跨國、跨區並連結不同利害關係人的方式發展工作，以支持更具包容性的商業環境系統（International

性享有經濟資源的障礙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直至 2023 年 3 月，#SheTrades 倡議已成功串連了 300 萬名女性企業家與市場，提升彼此於經濟活動的影響力與競爭力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n.d.)。

瑞典政府也於 2018 年的外交手冊中針對難民議題的建議進行回應，表示外交部將在多邊、區域、雙邊或在歐盟內部、透過歐盟產生的對外行為中，為所有女性能夠充分享有人權而努力，包含了加強移民和難民女性的人權發展，並於國際發展合作的政策中進行論述，指出在制定全球難民框架的過程中，需有性別平等的觀點，強調難民女孩和男孩需要獲得優質教育的重要性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的資料，瑞典是該組織重要的戰略夥伴與捐助者，持續提供了非指定用途資金，於 2020 年時，瑞典提供 1.247 億美元，成為該組織第五大捐助國、人均第六大捐助國、最大的未指定用途資金捐助國 (8820 萬美元未指定用途)，且特別說明瑞典透過資金，強化在難民教育和性別平等的倡議與支持，且重視特殊保護與援助措施以支持受危機或衝突影響的女性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UNHCR, 2021)。其餘具體工作包含為聯合國國際移民組織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IOM) 提供支持，確保其在地中海中部航線上的工作能夠持續進行，滿足難民和移民 (尤其是女性) 的緊迫需求並為其找到解決方案 (如疏散和返回)。雖然政府針對 CONCORD Sverige 指出須強化安全逃生路線以及與其他單位的合作進行回應，然卻未說明如何遠離與任何可能導致人權迫害或女性受暴的單位合作。

針對環境與氣候政策的建議，瑞典政府於 2018 年的外交政策手冊進行回應，將強化與各國之間的發展合作與保護女性環保倡議者。瑞典制定了新的性別平等政策和實施政策的具體行動計劃，以加強在雙邊、歐盟內部的發展合作、其他多邊環境和氣候基金中將環境和氣候觀點與性別平等觀點相結合的工作，如在全球環境基金 (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世界銀行氣候投資基金 (Climate Investment Funds, CIF) 和綠色氣候基金 (Green Climate Fund, GCF) 等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而 2020 年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行動計畫，則更進一步

---

Trade Centre, n.d.)。此倡議至 2023 年 2 月仍持續進行中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n.d.)。

地將重點放在保護包括環保倡議者在內的女性人權捍衛者，外交部也將在《巴黎協定》的實施中推動性別平等，實施性別主流化、強化女性在環境、氣候、海洋和生物多樣性工作中的影響（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0）。

雖然在 2014 年以前，CONCORD Sverige 並未有任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倡議行動，但自瑞典政府提出政策後，CONCORD Sverige 便從女性主義的角度與交織性觀點出發，關注更為廣泛的外交行動面向，並擴及到歐盟、聯合國與其他的相關政策中，針對瑞典政府的對外措施提出更多呼籲與訴求，而瑞典政府亦針對組織建言進行政策調整。經由研究討論，可以發現組織關注的範圍與期許的施政力道更為廣泛，持續強調瑞典在世界、歐盟、聯合國的影響能力，並多次援引相關組織的條約與工作原則，顯示 CONCORD Sverige 重視國際承諾與條約實踐，這也呼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本身對國際法律與制度規範的承諾，但在關注力道上還有許多發展的潛力與空間。在 2014 年 CONCORD Sverige (2014) 寫給瓦爾斯特倫的公開信，表示很樂於見到瑞典在 2015 年的進程中將性別平等作為優先事項，並重申對女性的不平等和歧視是最普遍的不平等形式之一，也因此需確保性別平等貫穿到政策框架內的所有目標，平等也必須是一個單獨的目標，必須注重最有可能改善女性生活的因素上，包括防止暴力、承認與享有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經濟賦權、參與及影響決策過程，使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 CONCORD Sverige 的支持下，持續關注以性別平等為目標的行動實踐。而公民社會層次的關注也促使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改變與強化影響力道，瑞典政府於 2018 年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與 2020 年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行動計畫中，呈現政策自 2014 至 2020 年在內容與關注面向上的變化與改善，如強化農業援助的關懷、國際武器貿易、環境倡議者的保護等，反映民間組織如何透過持續的倡議與回饋，影響瑞典的外交施政方向，使得整體政策關懷內容更加廣泛，並重視多邊組織的合作與國際承諾。

透過本節資料，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因其國家女性主義的獨特性，國內政治因素的公民社會層次並未推動政策的形成，但在施行後仍能影響該國政策的走向與內容，但政策目標的設定與側重面向，仍仰賴行動者層次的主導權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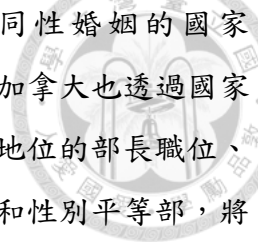
### 第三章 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分析



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提出，受惠於加拿大性別平等發展與外交政策文化的影響，在長年推動平權、多元價值與國際主義色彩的外交政策經驗基礎下，使其能夠順利推出政策並宣揚加拿大的價值觀，增進在國際間的影響力。

加拿大的性別平等發展位於北美洲的領先地位。2021 年 GII 分數為 0.069，世界排名第 17 名、北美洲第 1 名 (UNDP, n.d.)；GGI 則為 0.772，世界排名第 24 名、北美洲第 1 名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2023 年 SIGI 分數為 17.5，世界排名第 39 名 (OECD, n.d.)。政治參與的面向，2021 年加拿大女性國會議員比例為 30.47%，世界排名第 64、北美洲第 2 名，遜於墨西哥 (The World Bank, n.d.)。經濟參與方面，2021 年加拿大女性勞動參與率為 60.8%，優於當年全球平均的 46.3% (Our World in Data, n.d.)。

除了在數據呈現良好的性別平等發展，加拿大政府也透過法律規範促進平權實踐。在 1977 年時通過了《加拿大人權法》(Canada Human Rights Act)，確保所有加拿大人不受性別或性傾向限制，擁有權享有平等與公平待遇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a)。後在性別平等立法上，政府主要依據 1982 年《憲法法案》(Constitution Act) 第 15 條的平等權及第 28 條的性別平等權來推動相關政策，確保人民不會因為性別或其他身分屬性而受到歧視(蔡志恆、方凱弘、黃煥榮, 2007)。經濟賦權方面，1995 年通過就業平等法、2009 年通過公共部門公平補償法、2018 年通過薪酬公平法、2022 年修正的加拿大商業公司法，來促進勞動參與中的平權發展以及高層女性的比例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a, 2022a)；而 1985 年訂定加拿大勞工法，其中更提及雇主須與勞工共同協商制定防治性騷擾的措施，也規範私部門員工的基本福利制度，包含產假、親職假、生理假等。在女性安全的部分，刑法規範了性犯罪防治，在 1983 年的法案中將婚內強暴納入刑事犯罪，而 1987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的判決中，也確定了刑法中性侵害的定義及罰則，至 1999 年在判例中，更納入了積極同意的重要性 (Criminal Code Help, n.d.;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a)。多元性別的領域，1996 年將性傾向納入至憲法平等權的保障，2005 年同



性婚姻在加拿大全境合法化，成為全球第四個正式批准同性婚姻的國家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a)。除了上述法律制度的修正外，加拿大也透過國家力量來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與強化整合，1971 年設立了負責女性地位的部長職位、於 1976 年成立婦女部，後於 2018 年透過聯邦法案整合成婦女和性別平等部，將職責範圍擴大到促進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和性別氣質面向的平等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a)；加拿大 1981 年批准了 CEDAW、1995 年通過《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承諾將性別統計、性別分析納入政策制定，以實踐性別主流化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a)。

在國內性別平等發展的努力與制度下，加拿大亦在國際事務中展現影響力，成為國際發展中處理性別問題的先驅，反映了外交政策的國際主義傾向 (Smith, 2003)。如 1970 年代開始，加拿大國際發展合作署於 1976 年通過的《女性參與發展準則》、1984 年成立了 WID 理事會等，體現了以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為重點的政策規範 (Swiss & Barry, 2017)。或在難民政策中承諾接納美國禁止敘利亞難民，顯現出加拿大對正面形象的重塑與擴張 (Parisi, 2020)。Donaghy (2003) 也說明，加拿大長期以來注重人權問題，1990 年代「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 一度成為加拿大設定議題之重點，將以往過度重視主權國家的安全，轉為重視個人的安全，包含可持續的經濟成長、人權與基本自由、良善治理、永續發展與社會平等。林宗憲 (2003) 表示加拿大基於傳統上對人權之重視，充分運用人權相關議題，透過會議、談判與條約之簽訂，以建立相關議題的國際規則。這些政策與措施使得加拿大成為全球政治中的道德領導之一、建立良好國際聲譽，形塑的形象也持續受到國際社會所重視與關注 (Tiessen & Carrier, 2015；林宗憲，2003)。

而加拿大外交政策的國際主義傾向，源自該國對穩定環境的需求或是美國影響。因對外貿易在加拿大的經濟結構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積極維持健全體制才能促進加拿大的對外貿易安全，並從中獲取利益 (Keating, 2001)；而在過去約二十年裡，加拿大國內和外交政策在某些方面與美國保持一定程度的差異，以呈現更自由的形象來提升國家影響力，包含在健保、大麻合法化、建立國際刑事法院等領域 (Brodie, 2008)。

在國內良好的性別平等發展基礎與國際平權事務推動的經驗中，加拿大可以更順利地推動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但同前章所述，國家性別平等高度發展不必

然出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因此本章將深究加拿大三層次的國內政治因素，分析何為關鍵因素促成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形成與側重面向。



## 壹、行動者層次

加拿大憲法的組成包含了《1867年憲法法令》、《1982年憲法法令》等成文法，以及其餘不成文慣例、習慣法等，主要規範政府組成、國家體系、公民權利等。加拿大國體為君主立憲制，政體屬內閣制，總理由加拿大總督（英國君主在加拿大的代表）任命<sup>16</sup>，依據慣例乃加拿大國會下議院多數黨領袖擔任，於現行制度中，下議院338位的議員代表各劃分的選區，以單一選區一票制選舉產生。2015年第42屆加拿大選舉結果顯示<sup>17</sup>，加拿大自由黨取得過半數席次，該黨領袖杜魯道成為加拿大總理。

### 一、國家領導人

杜魯道在擔任總理前，即曾於社群媒體上揭露自身是一名驕傲的女性主義者，展現了對於性別平等的支持，以及說明未來上任後的注重面向。

杜魯道生於政治世家，並在黨內經驗培養出重視多元的價值觀。曾於自傳中分享其價值觀，認為：「加拿大是一個因多樣性而變得強大的國家。」同時批評保守黨的選舉策略，認為是透過分裂的方式來贏得選舉，難以團結起來解決共同的問題與困境（Trudeau, 2014）。杜魯道1971年12月出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渥太華（Ottawa），父親為加拿大自由黨前總理皮耶·杜魯道（Pierre Trudeau），六歲時雙親離婚並由父親撫養成人，於1994、1998年分別取得英語與教育學士學位。2000年時，杜魯道於父親葬禮上發表悼詞，使其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也開

<sup>16</sup> 加拿大政府的地方治理權，始於1867年由英國通過的《1867年英屬北美法令》（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 Act, 1867），現稱《1867年憲法法令》（Constitution Act, 1867），規範了加拿大為聯邦制度的自治領第以及政府運作方式（林岱緯，2019）。爾後加拿大政府逐步取得一個國家應具備的完整條件，如頒布國徽、外交權、經濟合作等，並於1982年，由加拿大上、下兩院通過涵蓋權利憲章與承認原住民權利的《1982年憲法法令》（Constitution Act, 1982），將修憲權從英國國會收回、獨立於英國，但仍以英國君主為國家元首，加拿大總理實際行使國家元首職權（林岱緯，2019）。

<sup>17</sup> 2015年10月加拿大國會選舉結果，下議院338席的席次中，加拿大自由黨（Liberal Party of Canada）取得184席；加拿大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取得99席；新民主黨（New Democratic Party）取得44席；魁人政團（Bloc Québécois）取得10席；加拿大綠黨（Green Party of Canada）取得1席。



始他的政治生涯，於 2002 至 2006 年擔任其父親於 1977 年成立的全國青年志願者組織 Katimavik 的董事會主席 (Wallenfeldt, 2022b)。更在自由黨前領袖狄安 (Stéphane Dion) 的引薦下，於 2008 年在下議院選舉中的帕皮諾 (Papineau) 選區中勝選，成為國會議員，並在 2011 年連任，擔任過黨內多元文化、青年事務、移民事務等領域的發言人；2013 年當選為自由黨領袖，領導自由黨於 2015 年取得政權並擔任總理，上任後實現選前承諾，建立性別平衡的內閣，將 15 名的生理女性納入至 30 名成員的內閣中 (Wallenfeldt, 2022b)。

杜魯道重視形象的維持與建立，時常透過社群媒體 Instagram 建立正面與積極的特質，以此提升選民對他的信任感，具體作法乃藉由圖像與文字的結合，透過較高的可近性與容易理解的方式，傳達吸引大眾的元素並以此營造形象，包括誠實、真誠、友善、領導能力等特質，而自由黨的包容性、多元文化主義、經濟增長的價值觀，也與他的貼文相互呼應，為彼此都帶來正面的影響與形象 (Lalancette & Raynauld, 2019)。

杜魯道在擔任總理之前，已對性別多元與平等議題有一定程度的關懷與表態，包含在自傳中說明與強調女性在經濟中的重要性，透過在經濟或社會等面向的參與，可以建立團結的社群與強大的經濟，並實踐性別平等，也指出性犯罪源於權力不對等關係，需特別注重女性在社會中的弱勢地位 (Trudeau, 2014)。杜魯道也認為機會均等是政策的基本原則，藉由自由黨的議程來促進加拿大支持弱勢群體、吸引投資與擴大貿易，實踐包容與多樣性的目標 (Trudeau, 2014)。在公開場合中，其也曾說明性別平等的意義，如 2014 年南亞律師協會頒獎晚會中的演講，就指出改善聯邦司法機構的性別與種族多樣性將帶來更好的決策，促進不同背景進入法律界，使相關決策涵蓋到更廣、更深的關懷與議題 (Fish, 2014)。而成為總理後，則進一步藉由女性主義者的身分進行倡議、關注更多內容，其中 2015 至 2019 年公布於加拿大總理官方網站，並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或對外行動中性別平等論述相關的演講與聲明，總共有十三篇呈現於表 3-1：

表 3-1、杜魯道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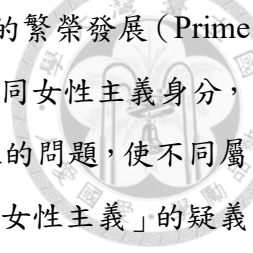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6 年 3 月	推動女性勞動參與權利的非營利組織 Catalyst 大會	宣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並任命一個性別平等的內閣政府	大會表彰杜魯道在促進多元化與性別平等方面的領導工作，而杜魯道於演講中驕傲地稱自己是女性主義者，將改善女性的代表性、待遇與機會，同時建立性別平衡的內閣，展現領導力與形塑在國際社會的模範。
2016 年 9 月	市政廳的談話	表示自己是女性主義者並注重女性的經濟困境	談話中宣稱自身是一名驕傲且堅定的女性主義者，同時支持女性的自主權利，以促進社群的進步和繁榮發展，亦關注貧困的女性，避免在教育、醫療、社會、政治等權利上受阻。
2017 年 7 月	在漢堡 (Hamburg) 的 G20 領導人峰會 (the G20 leaders' summit)	支持發展中國家的女性企業家	說明女性企業家在融資或發展業務等工作中容易面臨阻礙，杜魯道宣布將捐款給女性企業家融資倡議 (the Women Entrepreneurs Finance Initiative, We-Fi)，在世界銀行領導下，協助發展中國家女性擁有並領導企業公司，獲得所需資源、金融或技術援助，以實踐加拿大政府對性別平等和女性經濟賦權的承諾。
2017 年 9 月	在紐約的聯合國大會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UNGA)	強調性別平等和女性賦權將使經濟和社群更加強大	開幕式中，杜魯道說明加拿大的行動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該國將繼續在世界舞台上倡導多樣性、涵容與同理心，並透過政策與女性賦權，使經濟和社群更加強大。
2017 年 10 月	婦女歷史月 (Women's History Month) 的聲明	政府致力於促進性別平等，確保所有人無論性別都有機會發揮他們的潛力	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促進女性賦權，將性別平等作為優先事項，支持女性發揮潛力並強化在商業與政府中的領導地位，亦注重其在家務照護工作中承擔不成比例的責任。
2018 年 1 月	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年度大會	強調教育中的性別平等	說明平等且優質的基礎教育是通往更性別平等、和平、繁榮世界的道路，並提供上億資金。
2018 年 2 月	國際發展周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eek) 的聲明	說明女性發展受到貧窮與疾病所阻礙	針對女性的困境，將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來賦予女性權力，側重於幫助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群，也將使加拿大實現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目標。
2018 年 3 月	國際婦女節 (International	說明了性別平等與經濟賦權之間的關聯	杜魯道透過各項數據說明更大程度的平等可以帶來強勁的經濟成長，並有

	Women's Day) 的演講		助於建立更強大的社群、為不同人創造更多機會。諸如減少極端貧困和長期飢餓等問題、使家庭得到支持、加拿大的經濟規模增加等。
2018 年 4 月	加拿大作為七國集團 (G7) 主席國的聲明	G7 首要任務為性別平等，而加拿大說明女性賦權是經濟成長的關鍵	說明性別平等可以在世界所面臨的挑戰中發揮作用，包含建立更有效率的經濟、為未來的就業做準備、應對氣候變化、促進和平與安全
2018 年 5 月	加拿大女性獲得選舉投票權 100 周年的演講	說明女性的困境與解方，包含勞動參與、領導、薪資差距、性暴力等問題。	加拿大將平等置於聯邦預算的核心，並透過女權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增進女性權能，促進女性勞動參與、支持女性領導、縮小性別工資差距，並打擊基於性別的暴力。
2018 年 5 月	宣布加拿大應對緬甸和孟加拉羅興亞危機的戰略	針對緬甸問題公布應對政策與戰略，並以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為軸心，重點關注女性需求	戰略包含促進該地區的人權、性別平等、尊嚴、和平與安全，同時改善羅興亞人在難民營與居住地的生活條件，同時投入司法與發展資源，實現緬甸的可持續和平與真正的和解。
2018 年 8 月	在世界人道主義日 (World Humanitarian Day) 的聲明	任何人道主義災難都對女性與兒童造成不成比例的影響，加拿大將針對此問題提出解決方案	加拿大推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女性賦權置於國際援助工作的中心，並繼續與國際社會和聯合國合作，在全球展開人道主義工作。
2018 年 10 月	消除貧困國際日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來消除貧困。	加拿大在全球發揮領導作用，為最脆弱的人(特別是女性)創造一個更公平的世界，政策重點為消除貧困與女性賦權。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6a, 2016b, 2017a, 2017b, 2017c, 2018a, 2018b, 2018c, 2018d, 2018e, 2018f, 2018g, 2018h)

在自傳、學者研究以及本文擷取的十三篇演講或聲明中，杜魯道相當重視多元性的價值觀，這也連結到其自由黨領袖的身分或認同。如 2017 年的聯合國大會演講中表明加拿大將繼續在世界舞台上倡導多樣性、包容與同理心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a)；自傳中也認為加拿大因多元而變得強大 (Trudeau,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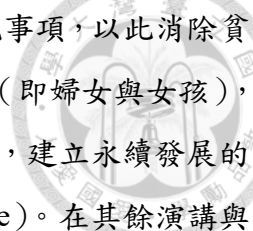
而杜魯道在性別議題事務與對外行動中的平權倡議則有以下四點特質。第一，杜魯道透過女性主義者的驕傲身分認同，彰顯新政府的目標與願景、減少各國疑慮，希望能夠一同合作促進全球性的平權發展。在 Catalyst 與市政廳的演講，除了表態女性主義者的驕傲認同，也說明性別平衡內閣的任命，將繼續展現領導力與樹立典



範，希望各國相繼效仿，期待女性獲得自主權，同時也促進社群的繁榮發展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6a, 2016b)。而杜魯道身為男性且驕傲地認同女性主義身分，乃是將性別平等問題視為全人類或結構性的關注，而非單純女性的問題，使不同屬性的群體都能夠一同關注性別平權的發展，減少部分社群對於「女性主義」的疑義或誤解，進而在各個領域透過不同作法實踐平等。而使用「驕傲地」方式，更呈現了堅定的立場，在媒體相繼報導之後可以提升杜魯道與正面形象的連結，加強其在國內支持或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第二，在女性主義身分認同之下延伸的性別平等關懷，杜魯道圍繞在經濟賦權的關懷與實踐，本文引述的十三篇聲明與演講中，九篇都提到性別平等與經濟之間的關聯，分別關注性別不平等的貧困循環、政府實質作為、女性經濟賦權帶來的改變等。如 2016 年市政廳、2018 年國際發展周聲明與國際婦女節聲明，指出女性受到貧困與疾病所阻礙，限縮女性相關的權利發展，無法透過經濟參與來改善貧困地位，導致惡性循環，因此要保障女性包含受教育、資源、健康等在內的平等權利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6b, 2018a, 2018b)。針對貧窮問題，杜魯道也提出具體解決方法，包含 2017 年領導人峰會中承諾幫助開發中國家的女性企業家獲得相關的資金與技術援助、創造就業機會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b)；以及 2017 年婦女歷史月聲明中確保所有人無論性別都有機會發揮潛能，強化女性在商業與政府中的領導地位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c)。除此之外，杜魯道更於不同場合中倡議女性經濟賦權帶來的正面影響，以促進國際間對於性別平等的關注及實踐，如 2018 年婦女節與 G7 主席國的聲明，說明女性在商界或政界擔任領導時，將帶來更正面的經濟成果、強勁的財務業績、創新與有效的決策，並擴大經濟規模的發展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b, 2018c)，不僅藉由實質數據與研究等可信的資料來說明女性經濟賦權對於社會產生的正面效果，也藉此論述方式來強化自身在領導與施政時帶來的影響力道，並提升他國的關注程度與採納意願，但也使得杜魯道對性別平等的關懷限縮於經濟領域中，使其對於性別平等的認知著重在經濟賦權面向。

第三，杜魯道對於經濟賦權的關懷，也展現在他對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側重面向，顯示了在主導政策中對於經濟的重視。如 2017 年的聯合國大會演講、婦女歷史月聲明、2018 年的國際發展周聲明、投票權 100 周年演講、消除貧困日



的聲明，指出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將性別平等作為優先事項，以此消除貧困並促進女性經濟賦權，同時側重關懷最貧窮與最脆弱的人群（即婦女與女孩），使全球發展可以更趨近聯合國 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的目標，建立永續發展的社會（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a, 2017c, 2018a, 2018d, 2018e）。在其餘演講與聲明中，也僅有兩篇關注了政策的人道援助面向，如 2018 年杜魯道針對緬甸問題公布應對與滿足流離失所與弱勢群體需求的戰略（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f）以及同年 8 月在世界人道主義日聲明，將女性賦權置於國際援助的中心，繼續與國際社會和聯合國密切合作，開展重要的人道主義工作（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g）。杜魯道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來論述性別平等工作的重點，大比例都集中在經濟賦權的論述，呈現出杜魯道對該政策形成的關鍵影響與掌控，也形塑政策中對於經濟重視的特質。

第四，杜魯道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與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來創造與維持個人形象。相關研究表明國家領導人可以採用女性主義原則和價值觀作為其品牌、國家品牌或個人願景的一部分，正當化現有規範並進行政策推動（Tiessen & Smith, 2021）。本節在加拿大國家領導人的討論中，分析杜魯道在既有對自由黨多元價值觀的認同中，持續藉由女性主義身分表態來推動相關政策與形塑正面積極的執政形象，並在性別議題中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側重關注女性經濟賦權與消貧等議題，以吸引他國關注與提升影響力，也呼應 Tiessen 與 Smith（2021）的研究，使杜魯道成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領導人，主導政策的形成與目標設定、關懷領域，體現在其各場合的聲明與演講中，持續論述了性別平等對經濟帶來的正面效益。

## 二、外交部長

方慧蘭生於 1968 年的亞伯達省（Alberta）和平河鎮（Peace River），父親為一名農夫與律師，擁有自由黨黨籍；母親為烏克蘭裔，生於德國的一個美軍難民營中，曾於 1988 年代表新民主黨參選國會議員，並經營著一家女性主義合作社（A. Thompson, 2020）。方慧蘭於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主修俄羅斯歷史與文學（Russi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1993 年取得斯拉夫研究碩士學位（Master of Studies degree in Slavonic Studies）（A. Thompson, 2020）



方慧蘭在參政之前是一名記者與作家，曾為《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擔任特約記者，後來至《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先後擔任副編輯、莫斯科分社社長、東歐記者等職位；於1999至2001年轉任加拿大《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副編輯；2010年則成為路透社(Thomson Reuters)的常務經理和消費新聞編輯(A. Thompson, 2020)。另外，其曾於2000年出版《世紀大拍賣：俄羅斯轉軌的內幕故事》(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透過1994至1998年與俄羅斯商人的訪談，描繪了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轉向資本主義體制的過程與歷史；於2012年出版《巨富：全球超級新貴的崛起及其他人的沒落》(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對財富集中的現象進行精闢分析(A. Thompson, 2020)。

而方慧蘭的政治生涯則與杜魯道有密切相關，杜魯道曾於演講或媒體訪問中引述方慧蘭著作，兩人在討論不同政策議題時結識，在杜魯道出任自由黨黨魁後，於2013年下議院補選時，遊說了方慧蘭參選議員並順利當選(A. Thompson, 2020)。2015年方慧蘭晉身杜魯道的內閣，擔任國際貿易部長(Minister of International Trade)(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21)；2017年，杜魯道為了應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的國際政治新形勢，1月時改組內閣，方慧蘭出任外交部長，任內成功監督加拿大與歐盟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重新談判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也被世界經濟論壇形容為「全球民主、人權和多邊主義的主要倡導者」(A. Thompson, 2020; World Economic Forum, n.d.)。

在擔任外交部長之前，方慧蘭即對性別議題與女性主義有所關注。如在其著作中提到富豪階級中缺乏女性的現象，即使女性受到相同的教育機會與資源，進入職場後仍然面臨許多結構性的阻礙(Freeland, 2012)；2013年也曾於路透社發表文章談論富豪階級中的性別差距問題，指出女性在世界各地中產階級的占比有所增長，但在財富與經濟實力的頂峰群中卻幾乎完全缺席(Freeland, 2013)，展現出他對於性別問題的重視，焦點著重於女性在經濟領域或工作職場上面臨的困境，然針對此現象如何解決或是改善，抑或應對背後的結構性因素，諸如適合的政策因應等，方慧蘭未於該篇文章中給予明確的答案。日後的具體政策與關注面向，以及與性別平等有關的論述，則體現在其餘演講與聲明中，呈現於表3-2：

表 3-2、方慧蘭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7 年 6 月	在下議院針對加拿大外交政策優先事項發表演講	說明女性人權為外交政策的核心，並追求與各國合作促進可持續發展世界的集體目標	指出外交政策須符合所有加拿大人的利益，並與各國分享加拿大的價值觀，包含女性主義與女性人權，認為促進這些權利發展，可以使國家與國際社會更加繁榮。
2017 年 6 月	國際消除衝突中暴力日（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與國防部長（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ce）的聲明	譴責衝突中的性暴力問題	反對在衝突局勢中持續和廣泛使用性暴力，儘管將其作為一種戰爭的策略手段，也無法妥協相關行為，而加拿大將藉由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預防和應對衝突地區的性暴力，並對工作人員與維和人員的虐待行為實施零容忍政策。
2017 年 7 月	世界打擊人口販運日（World Day Against Trafficking in Persons）與公共安全與緊急準備部長（Minister of Public Safety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的聲明	譴責人口販運並說明具體行動，同時指出販運行為中性少數與弱勢群體易受到迫害	說明在加拿大，大多數人口販運受害者為女性、原住民、LGBTQ、移民、無家者、或弱勢青年，政府將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進一步支持打擊人口販運的相關行動。
2018 年 2 月	外交與國際發展常設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演講	擔任 G7 主席國期間，加拿大將與各國一起應對緊迫的全球挑戰	說明相關挑戰包含氣候變化、海洋與綠色能源、建設更安全和平的世界、促進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更要確保將基於性別的分析應用於國家總理任期內的各個方面。
2018 年 3 月	國際婦女節的聲明	承諾在政府中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表態為自豪的女性主義者，並說明在擔任外交部長期間，會將性別平等納入外交、貿易、安全和發展等政策。
2018 年 3 月	第 62 屆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演講	主持了針對女性參與和平的艾爾西倡議（Elsie Initiative）	透過艾爾西倡議促進女性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而加拿大將向相關組織提供 600 萬美元的資助，承諾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融入貿易、安全、發展等面向，並於委員會任職期間，提供資金促進目標的實踐。
2018 年 4 月	針對孟加拉羅興亞危機所舉辦的會議	說明加拿大的立場與政策，透過司法資源來支持羅興亞人並關注女性需求	會議中表示將根據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滿足女性特定的需求、優先為最弱勢群體提供服務，同時與國際合作，為加害人與侵犯人權行為建立問責途徑，在緬甸建立持久和平。
2018 年	國際原住民日	論述政府對於原	致力於在國內外實施《2030 年可持續發

8 月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 與國際貿易多元化部長、國際發展部部長發表共同聲明	住民與女性議題的關注與政策	展議程》，述及原住民的多元性，促進社會的歷史和解、提升生活品質，並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支持女性和女權組織的參與，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原住民領導人，使其能於各層面的人權事務中發揮作用。
2018 年 9 月	歐盟的女性外交部長會議 (Wome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推動全球和平與安全並討論其餘相關政策	表示與歐盟皆認同賦予女性經濟與政治權利對建設更安全、繁榮、包容性的世界至關重要，同時透過國際援助政策提供資金推動發展中國家婦女組織的倡議行動，並希望女性外交部長為推動女性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作出貢獻。
2018 年 8 月	平等權利聯盟 (Equal Rights Coalition) 的會議	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延伸關懷 LGBTQ2 社群	聲明將制定相關戰略來促進性少數人權以實踐政策關懷，並透過和平與穩定行動計畫 (Peace and Stabilization Operations Program)，發起一項募資專案來解決暴力衝突期間 LGBTQ2 與雙性人的權利困境。
2019 年 3 月	國際婦女節的聲明	說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目標與延伸的工作內容	政策建立在一個的目標上，即讓世界各地的女性擁有平等的發言權及權利，並受益於平等的機會、生活在公平的安全與保障中。
2019 年 6 月	國際消除衝突中性暴力日與國防部長發表共同聲明	闡述打擊衝突中性暴力的工作重點，及說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內容	說明解決衝突中性暴力乃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和《女性、和平與安全國家行動計劃》的核心要素，將透過司法針對加害者給予制裁，並保護女性參與全球發展與和平安全工作。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b, 2017c, 2017e, 2018a, 2018b, 2018c, 2018d, 2018e, 2018f, 2018g, 2018h, 2019a, 2019b)

透過本文引述的十二篇演講或聲明以及方慧蘭發表的書籍與文章中，其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外交行動中的性別平等論述有以下三點特質。第一，對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目標有很明確的定義，乃是促進更和平、更繁榮的世界，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為有效的手段。如 2017 年下議院的演講、2018 年女性外交部長會議的演講或 2019 年 3 月國際婦女節的聲明，都指出賦予女性在經濟與政治上的賦權，將有助於建設更安全、繁榮、包容性的世界，此不僅是正義問題，也是經濟問題，能讓加拿大以及全球人民擁有更好的生活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b, 2018a,

2018b, 2019a)，並承諾在 5 年內撥款 1.5 億加元（約 34.3 億新台幣），以滿足發展中國家當地的婦女組織需求，使其能夠持續推動婦女和女孩的權利、實踐性別平等（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a, 2018b）。

第二，對政策內容與發展的理解更加廣泛，相關的對外行動也關注到更多面向。雖然方慧蘭同杜魯道皆認同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最終目標為經濟賦權或減貧，但其藉由關注更多面向的性別議題來實踐目標，並延伸至不同領域的措施與介紹。像是在女性和平與安全的建設面向，2018 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會議中，方慧蘭即表示發起艾爾西倡議來促進和平進程中的女性參與、建立財務機制來提升行動能力（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c）；或是 2017 年 6 月的國際打擊人口販運日，也聲明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幫助預防和應對衝突地區的性暴力，對工作人員與維和人員的虐待行為實施零容忍政策（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c）；2019 年的國際婦女節聲明也宣布建設加拿大首位女性、和平與安全大使職位，強化在性暴力與安全層面的推動（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a）。而在原住民、性少數或是國際衝突等面向中，方慧蘭也在不同場合中表達關注與實踐作為，如 2018 年 4 月羅興亞危機中，方慧蘭即說明將與國際合作夥伴一起，努力在緬甸建立持久和平、滿足婦女和女孩特定的需求、優先為最弱勢群體提供服務（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d, 2018e, 2018f），這些演講或聲明體現了方慧蘭藉由外交部長的職權，延伸了外交政策的關懷內容，不僅不會限縮在經濟議題層面，更透過廣泛面向的關注與倡議來實踐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

第三，在總理主導的外交政策框架下，運用外交部長的職權延伸議題關懷。雖然方慧蘭有意拓展政策的關懷領域，但基本目標與主軸由杜魯道所主導，使得政策目標仍指向經濟賦權，性別平等僅是有效的途徑。不過方慧蘭可於外交部長的職責內，在各場合、各部門或各單位的合作中，持續將政策擴展至不同面向的關懷，雖無法影響外交政策的基本方向，卻也透過實際措施來將施政面向延伸地更廣。另一方面，杜魯道作為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使得該國政府在目標設定與問題意識上別於瑞典，顯示出兩國政策形成差異的國內政治因素。

### 三、政黨

自由黨的《黨章》（Constitution）指出，其堅信每個人的尊嚴是民主社會的基

本原則，也是民主社會中所有政治組織和活動的首要目的，並且說明該黨原則為促進與保護個人自由與人的尊嚴，致力於追求所有人的機會平等，強化獨特與多元的文化及社群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2021)。也因此強調相關政策不因種族、民族或族裔、膚色、宗教、性別、性別認同或性別氣質、性傾向、年齡、精神或身體障礙而受到歧視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2021)。

自由黨致力於在經濟與社會正義之間尋找平衡，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機會，並確保適當監管制度的公平和自由市場，體現了其在政治意識形態的中間路線角色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a; Rayside, 2022)。相關文獻中指出自由黨為加拿大的中間派，將社會政策改革者與自由企業倡導者凝聚起來以獲取執政權，而政策走向也隨著領導人與環境的變化，有不同的改變與趨勢，也因此被認為創黨以來缺乏清晰的意識形態，在過去的歷史中，其相較保守黨更支持社會福利支出，但有時支持社會民主主義的選民，也會被更偏左的新民主黨所吸引 (Rayside, 2022)。

自由黨在其官方網站中透過相關政策來說明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著重經濟發展與促進人權民主面向。如《一個更強大的加拿大》(A Stronger Canada) 表明外交政策應以「為每個人創造經濟成長的承諾」為原則，強化平等、多樣性和包容性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b)；《協助世界上最脆弱的人》(Help for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People) 的政策章節中也說明將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改善弱勢社群的困境，具體措施如在加拿大擔任 G7 主席國期間，籌集 43 億美元用於女童教育，並承諾在十年內為女性健康提供 140 億美元，協助促進女性的教育平等以及發展健康生活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c)。而《促進民主和人權》(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的政策中，則表示將透過領導，為弱勢群體提供安置與服務，包含衝突中的人權捍衛者、記者、女性主義者、LGBTQ2 倡議者、處於危險或衝突中的宗教與少數族裔成員、其他受迫害的人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d)。

除了在外交面向中關注女性經濟賦權與基本人權，在國內性別平等議題中，也著重在經濟層面的探討，同時藉由相關政策指出女性面臨的結構性問題，對應到自由黨重視多元性的價值觀、關注了不同群體的需求，而這些政策同時注重經濟利益與社會正義的層面，亦符合自由黨偏向中間路線的角色。《人人平等的加拿大》(An Equal Canada, For Everyone) 就擘劃出自由黨的基本政策價值，說明性別平等與領



導階層的多樣性對於公平和民主的社會相當重要，可以來應對社會結構性的壓迫困境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e)。而女性經濟賦權的關懷，占自由黨對於性別平等促進論述的大部分，如《為所有人建設更美好的加拿大》(Building a Better Canada, For Everyone)、《更具彈性的經濟》(A More Resilient Economy)、《促進加拿大企業的多元化》(Promoting Diversity in Corporate Canada)、《經濟中的女性》(Women in the Economy)、《免費月經用品》(Free Menstrual Products)、《讓每個人的工作場所更公平》(Making Workplaces Fairer, For Everyone) 等都圍繞在經濟議題，具體措施包含增加適用房屋的供應、保護租戶免遭驅逐、促進充分參與經濟、提供資源協助托育、擴大企業融資計畫的貸款人資格、推動金融部門的交織性觀點、建立月經公平基金以為弱勢群體提供月經用品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f, n.d.g, n.d.h, n.d.i, n.d.j)。

藉由自由黨的官方文件與學者研究資料，可以發現在性別平等的相關政策中，該黨著重經濟帶來的正面影響與功能，並將經濟賦權視為政策的根本目標，而促進女性經濟參與、勞動平等、環境改善、決策層級女性增加等，僅為實踐繁榮社會的手段。然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仍牽涉整個父權體制對女性壓迫與宰制的現象，除了投入資金、改善勞動環境、促進勞動參與、提供生活基本用品外，更可以透過教育、改善司法體制、針對犯罪給予嚴重懲罰或是其他立法措施，來應對不平等的結構性現況，但在自由黨的政策論述中卻較為缺乏。

除了對於經濟的側重，自由黨也重視內政大於外交，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相關的討論較少，多著重在國內性別平等的發展，相較之下，杜魯道廣泛於各場合的發言、聲明與關懷，顯示了對政策更多的著力與影響。由此推論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對於經濟賦權的重視，即是在杜魯道的價值體系之下，對經濟發展的追求所形塑而成，同時透過杜魯道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與對多元價值的尊重，佐以自由黨的基本價值下，將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方法，亦符合自由黨的政策手段，強調在體制之下尋覓一條可以同時促進社會正義與增進經濟的路線。此分析也呼應 Hermann (2001) 的研究，說明國家領導人在特殊狀況下會親自參與外交事務的決策，杜魯道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女性主義身分的驕傲認同以及自身對正面形象建立的需求，使其傾向投入相當的心力與影響力於相關的外交工作中，成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領導人，主導了政策的形成與目標設定。



## 貳、制度層次

本節將觀察加拿大全球事務部（以下簡稱 GAC）的組織運作模式與執行政策過程，為本文提供另一個觀點來研究如何影響外交政策。

GAC 主要涵蓋外交、貿易與國際發展三個部門，分別管理外交關係、促進國際貿易與領導國際發展、人道主義、和平與安全援助工作，在全球環境中定義、形塑與推進加拿大的利益與價值觀（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b）。在 GAC 發展歷程中，其於 2013 年整併了加拿大外交和國際貿易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與國際發展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 CIDA）為外交、貿易和發展部（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Trade and Development），2015 年改名為全球事務部，部門的更動反映加拿大自身在國際社會中日益成熟的影響力（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c）。GAC 工作內容包含制定和執行外交政策；促進國際法、國際貿易和商業的發展；提供國際援助，如人道主義、發展、和平與安全；確保加拿大對法語國家組織機構的有力和持續參與；為加拿大人提供領事服務；監督加拿大政府的海外大使團網絡。而在國際發展的使命中，GAC 吸引和影響國際參與者，促進加拿大的政治、法律、經濟利益，以消除全球貧困與促進更加和平、繁榮和包容的世界為目標，管理加拿大多數國際援助與領導國家應對海外危機及自然災害，支持全球和平與穩定，並適時提供基於需求的人道主義援助（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c）。以上的對外行動體現了加拿大對於人權與和平追求的國際主義，認知到任何國家與國際體系的和平都是密切相關（林宗憲，2003）。預算使用上，GAC 在 2021 至 2022 年預算支出約 67 億美元（約新台幣 2068 億）；員工人數方面，2021 至 2022 年的全職員工人數為 12342 人。

加拿大對於性別平等的重視，體現在 GAC 的行動面向與政策宗旨，將在所有發展、人道主義、和平與安全援助中，促進性別平等和增強女性權能，意味著加拿大在所有工作中會優先考量最有可能縮小性別差距、消除性別平等障礙、幫助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工作（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b, 2022d）。也將透過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實踐性別平等，幫助最貧窮、最脆弱的人權，並支持脆弱的國家（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d, 2022e）。

為了達成 GAC 的平權實踐與繁榮世界的目標，執行方式包含廣泛合作、性別

統計分析與影響評估。為了擴大國際援助的範圍並提高其有效性，只要能夠在國際援助上提供支持與產生影響者，皆為 GAC 的合作對象，包含國家政府、公民社會、私部門、財團法人、社會企業、地方社群組織等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d, 2022e)。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評估方面，將透過有效的數據與性別分析評估，作為修正政策的證據與指標，如在政策中的人類尊嚴行動領域，便會探究獲得性健康和生殖健康服務的人數 (包括現代避孕方法)、接受特定營養干預措施的人數、獲得衛生服務的人數、支持綜合性教育的投資金額和項目數量，以追蹤與監測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六個行動領域的進展，同時透過一套額外的補充指標，來衡量全球性別平等趨勢、加拿大性別平等宣傳的努力、部門內性別平等的進展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c)。

在尋求合作夥伴的方式中，GAC 也投入 1.23 億加幣 (約 27.4 億) 於加拿大中小型組織的倡議計畫，讓這些組織在符合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指導下參與國際援助工作，提升中小型組織的影響與創新能力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f)。在 2017 年提出政策後，GAC 收到大量申請，爾後批准橫跨 18 個國家的 21 項資助項目，以實施可持續發展的工作、減少貧困與脆弱性，如與 The equality effect - e<sup>2</sup> 組織<sup>18</sup>在肯亞培訓警力，佐以地方與國家的公共法律教育活動，來改善肯亞兒童性暴力加害者未受司法制裁的現象；或是與 Jane Goodall Institute of Canada<sup>19</sup>合作，在塞內加爾建設社區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提供相關技術、引進抗旱作物、發展替代性能源等；另外也與 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sup>20</sup>改善烏干達西部和部分地區中學女性的入學與教育機會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f)。

在執行政策的方法中，GAC 也設定性別平等工具包 (Toolkit)<sup>21</sup>，為相關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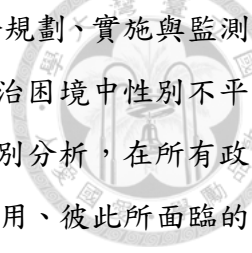
---

<sup>18</sup> The equality effect - e<sup>2</sup> 乃由人權倡議者組成的國際網絡，成員包含基層社區成員、藝術家、音樂家、電影製作人、醫護人員、記者、律師、教師、學生、法官或民意代表等，致力於改善女性的生活，並透過國際人權法來實踐改變 (the equality effect - e<sup>2</sup>, n.d.)。

<sup>19</sup> Jane Goodall Institute of Canada 為成立於 1977 年的 Jane Goodall Institute 的加拿大分會，支持青年和原住民社群應對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退化和環境不公平等問題，並透過以社區為中心的保護計劃來建設一個更美好與可持續的世界 (Jane Goodall Institute of Canada, n.d.)。

<sup>20</sup> 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 是一個致力推動公共教育、勞工權利、社會正義的非營利組織，促進人們之間的相互尊重與理解、建立受到尊重的工作場所、營造信任的環境並保護權利 (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 n.d.)。

<sup>21</sup> 工具包涵蓋 14 個項目，如性別平等政策框架、讓合作夥伴參與性別平等、性別平等專業知識與團隊責任、基於性別的交織性分析、性別平等成果、性別平等風險、實施性別平等成果的預算等，詳細論述規劃與執行政策內容時的面向，也為 GAC 在實施性別平等的方法中，帶來嚴謹、積極和問責制，形塑出一套國際援助的女性主義方法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b)。



計畫的設計與實施提供指導，讓工作成員與組織可以藉此了解於規劃、實施與監測過程中需要關注的內容，著重解決歷史、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困境中性別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b)。GAC 也重視性別分析，在所有政策、計劃和項目中理解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關係、對資源獲取、運用、彼此所面臨的限制等，並在種族、文化、階級、年齡等面向的交織下，探討政策對不同人的影響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d, 2019e)。

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指導下，GAC 進一步提出不同的行動領域來關注平權實踐，涵蓋經濟賦權、健康權利、和平與安全等領域的關注，顯示了政策推動促使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產生改變。如經濟賦權面向提出的《在加拿大和國外資助性別平等和強化女性權能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 to fund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in Canada and abroad)，為 2018 年 5 月 25 日發出的行動呼籲，透過建立夥伴關係來調動資源，為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團體和倡議運動創造可持續與可預測的資金來源，更承諾提供高達 3 億加幣 (約 66.9 億新台幣) 的資金，將慈善、私部門、公民社會等匯集到一個平台中，以促進與強化性別平等工作的發展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0a)。另外也包含《女性發聲與領導計劃》(Women's Voice and Leadership Program)，協助發展中國家促進性別平等，改善地方女性權利組織的管理與永續發展，提升地方和國家女權運動、網絡和聯盟的有效性，以影響政策和社會變革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0b)。健康權利的面向則提出《改善女性與兒童的健康和權利》(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性與生殖健康權利》(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童婚、早婚、強迫婚姻》(Child,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 三個行動領域，著重改善世界各地的衛生系統、確保女性的身體自主權、生殖健康權利的發展與教育，避免不安全墮胎、性病感染、強迫婚姻等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g, 2022h, 2020c)。而針對性暴力、和平建立等方面，則提出《消除對婦女和女孩的暴力行為》(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女性、和平與安全》(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兩政策，前者承諾將在聯合國與其他論壇上制定相關行動防止暴力，如推動將性犯罪和基於性別的犯罪納入國際刑事法院規約草案，在全球範圍內領導世界一同消除童婚、早婚和強迫婚姻等現象，同時支持各地的女權團體並保護女權倡議者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i)；後者則強調女性在解決衝突過程中的重要性，加

拿大也於 2010 年、2017 年推出兩次國家行動計劃 (National Action Plan) 來推動 WPS 議程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j)。

雖然 GAC 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指導下，關注更廣泛領域的性別平等實踐，然而在對比過往 GAC 的援外行動目標時，其仍將經濟賦權與減貧視為目標。透過 WayBack Machine 比對推行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前後 GAC 於官方網站中對性別平等的論述，2014 年加拿大國際發展合作署指出性別平等政策的目標是支持實現男女平等以確保可持續的發展與經濟繁榮，具體行動包含促進女性作為決策者以及與男性平等參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支持女性實現人權、減少在獲取發展資源和利益方面的性別不平等，並以二元法的論述說明性別平等意味著對女性與男性公平，需藉由相關措施減少阻礙男女平等生活的社會結構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2a)。在 CIDA 提出的 2010 至 2013 年性別平等行動計畫中 (CIDA's Gender Equality Action Plan)，強調性別平等可以顯著減少貧困並帶來更可持續的發展，而更大程度的性別平等將以倍數的效能提升發展成果，利於可持續性的發展，然而性別不平等現象阻礙著發展中國家的減貧努力，因此加拿大將致力於在國內和國際上將性別平等作為一項人權，於行動計劃中設立三個優先事項來指導國際發展合作署的工作，分別為加強糧食安全、確保兒童與青年的未來、刺激可持續的經濟成長，且在每個項目中都支持男女平等，如增加小農戶中女性農民的產量；兒童和青年戰略的核心內容則是促進孕婦、新生兒與兒童健康，並為女孩和男孩提供教育和技能，使他們成為社會中有生產力的成員，同時有意義地參與社群；而刺激可持續經濟增長的項目中，其中一項主要內容是透過為窮人提供創業培訓和金融服務，使女性更容易享有經濟成長的利益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2b)。

總體而言，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出現前，加拿大國際發展合作署即已重視性別平等的實踐與相關政策，同時也與杜魯道時期的 GAC 一樣，致力於在國內和國際上將性別平等視為人權，並認同實踐性別平等是促進可持續發展與減貧的有效手段。然而在援助政策出現後，也促進了援外組織一定程度的轉變，相較 2014 年以二元化的方式來理解男女平等，杜魯道時期更傾向使用性別平等方式來論述，涵蓋範圍不僅更為廣泛，也思考到交織性議題等面向，且在性別平等政策以及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框架下，平等促進方面有更廣泛的工作內容與方式，並積極透過與各國家、區域、民間單位等合作，建立有效的網絡並實踐加拿大政府的多元價

值觀，使得兩任政府下的援外組織雖然在性別平等的政策目標上相同，但是內容、方法、涵蓋面向等，杜魯道時期的 GAC 有更廣泛領域的關懷。

在加拿大的案例中，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一定程度的影響該國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關懷內容與側重面向。無論是哈珀內閣的國際發展合作署或是杜魯道內閣的 GAC，都將該國援外政策性別平等的實踐目標設定為追求經濟賦權、實現可繁榮的發展，並未將性別平等視為一項目標，兩任時期的差距主要體現在用詞或是涵蓋面向上，顯示制度既有的模式與樣態，影響最後目標設定，指向經濟論述。

### 參、公民社會層次

加拿大民間組織反應與相關意見的因素分析，將探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小組（以下簡稱小組）的意見報告，並透過其餘組織意見與學者研究來補充相關論述。


截至 2020 年為止，小組認為加拿大外交政策仍無法充分解決日益嚴重的貧困與不安全問題，且許多倡議與社會運動，包括女權、原住民、LGBTI 等，在世界各地都遇到相當的阻礙，因此一個明確且具野心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相當重要（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0）。2018 年時，不同組織的女性主義者開始討論如何推動全面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遂組成小組積極收集相關意見，以針對日後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的改善與推動，成員包含各領域與部門的專家，遍布非營利組織或學術界，如人權倡議組織 Above Ground、加拿大國際特赦組織、加拿大性健康和權利行動組織（Action Canada for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平等基金（The Equality Fund）、加拿大地雷行動組織（Mines Action Canada）、加拿大樂施會、國際婦女爭取和平與自由聯盟（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等，專精於人權、和平安全、性別平等、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經濟正義、國際發展、裁軍等領域（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本文為了理解民間組織如何對一國外交政策產生影響，將以小組作為本文研究標的，因其涵蓋許多民間組織、倡議者或是學者意見，同時也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提供相當豐富的討論，可以為本文提供更廣泛的資料與更全面的分析。

小組成員於 2021 年提出的報告中，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應具備的核心原則，包含維護政策連貫性、採用交織性方法、促進非軍事化與和平解決衝突、提升環境

保護與永續發展、強化問責制度等，並將以此原則針對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進行回饋與論述，不足之處歸納為四點：裁軍與非軍事化、經濟正義、性與生殖健康、更高的整合性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

在裁軍與非軍事化方面，小組認為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未考量衝突機制的陽剛文化，也未重視非軍事行動的優先重要性，因此提出許多質疑與批評。如 Women's International League for Peace and Freedom 認為武器的生產、使用、交易、擴散與持有都不相容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框架，且軍事化會加劇女性主義者試圖消除的權力不對等問題，而在傾向暴力的陽剛氣質的軍事機構中加入女性或創造多元，可能會導致女性面臨更多的衝突與困境，因此應加強在國際場合支持裁軍行動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Mines Action Canada 也指出人道主義裁軍是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基礎，該概念重視受衝擊社群的生活經驗、考量人民的安全而非國家、關注受害者權益，並優先納入決策和計劃，人道主義裁軍將有助於降低政策不一致的風險，如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不應向壓迫人權之政權出售軍事設備、不應依賴核武來保障安全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另外，Canadian Voice of Women for Peace (n.d.) 則以更批判的角度論述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對於軍事與安全領域缺乏結構性的關注。從援助政策延伸的相關行動通常側重於讓女性更多地參與軍事行為，然組織認為僅將更多女性加入軍事化相關的現有安全結構中，並不能真正實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反而可能在本質上傷害女性，缺乏結構性的改變只會讓更多女性進入充滿陽剛文化的父權體制中，提升面臨壓迫的風險，因此必須改變的是父權體制和歧視結構，而不是在其中擔任職務的女性人數 (Canadian Voice of Women for Peace, n.d.)。除此之外，組織也提到徹底消除核武和其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應是任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戰略的首要任務，並論述了核武試驗與使用對女性產生不成比例的負面影響、女性在核武談判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Canadian Voice of Women for Peace, 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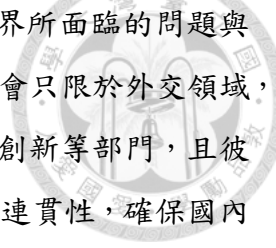
經濟正義的關注中，許多組織指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應將性別平等置放於政策目標，同時更應注意政策是否真的關注最貧窮與脆弱的社群。Inter Pares 即建議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適合所有人的發展」政策領域重新定位為「消除不平等」，且政策未限制企業權力，可能導致資源與經濟發展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也沒有優先考量建立和擴大公共服務，如醫療保健或教育等福利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Carleton University 與 Above Ground 則批判政策中對發展中國家女企業家的援助，認為不應關注代表少數人口且通常不屬於最弱勢群體的女性企業家，而應轉向解決國際經濟政策對不同女性群體潛在的負面影響，如護理人員、自給農民、非典型女性勞工等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Oxfam Canada 也表示政策應優先考慮經濟正義，以解決貧困的根本原因與提升最脆弱與邊緣化的社群，具體建議如使用交織性與非殖民化的方法，促進經濟正義並確保政策充分反映加拿大與全球女性貧窮和被邊緣化的現實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Coalition for Equitable L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則從農業的角度關注經濟賦權問題，認為現行政策雖承諾支持農村婦女從事智能型農業，但未實現其他面向的系統性變革，就無法有效促進女性和其他邊緣群體的正義，包含在性別權力關係、文化、社會規範等制度性領域中的不平等 (Coalition for Equitable L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n.d.)。另有學者指出，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強調了經濟賦權帶來的正面效益，雖然有時確實需要提出優點來說服其他政府和社會來考量性別平等帶來的正面影響，但這種論述可能會減弱公平和多元性的規範價值，且此應為政策本身的目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帶來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並克服貧困並帶來可持續發展與和平，將導致性別平等形同經濟成長的工具，而未認識到性別平等和多元性本身即是值得追求的價值觀，另外，政策也增強對女性與邊緣化社群的期待與責任，但改善女性不平等現象的責任應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而非女性的責任 (Bouka et al., 2021)。

而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的關注，則被認為在加拿大缺乏各部門的整合性，也未關注到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等交織性概念。Action Canada for Sexual Health and Rights 表示雖然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推動了性與生殖健康權利並取得部分成果，但在所有外交政策、政府部門、國內政策中，仍缺乏一致性與連貫性，可能導致相關進展受損，其認為在國內施政時也應符合所有國際人權規範，確保所有加拿大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性與生殖健康權利，也可藉此提升加拿大在人權與多邊主義的信譽與能力。另外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部分，也應強化交織性方法的使用，如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性徵等層面的整合，使性別的概念或定義不再侷限於生理面向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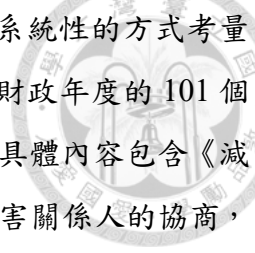
另外小組也認為加拿大政府須透過更高的整合與連貫性來實踐女性主義政策。



小組報告指出僅 GAC 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不足以應對世界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而是需要一個整體政府的行動，因為在實行政策的時候不會只限於外交領域，還會跨至發展、貿易、安全、國防、人權、環境、裁軍、健康、創新等部門，且彼此會互相影響與連結，因此，小組報告的所有建議都強調政策的連貫性，確保國內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一致性，才能更為順利的推動性別平等工作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

除了以上四點，在學術研究中，學者強調針對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氣質與性徵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and expression, and sex characteristics, SOGIESC) 的交織性關注 (Aylward & Brown, 2020)。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於 2017 年 6 月推出時，標誌著性傾向與性別認同首次在加拿大的總體援助政策中被提及，然而在 2017 至 19 的行動計劃中，這些交織性關注僅透過獨立的承諾來指引措施，而非藉由更廣泛的框架來指導 SOGIESC 融入加拿大的計劃，且性傾向與性別認同的提及總是連結到女性被邊緣化的部分潛在原因，未能認識到 LGBTI 社群的特殊性及其面臨與性別問題相關的歧視 (Aylward & Brown, 2020)。自實施性主義外交政策以來，雖然 GAC 曾宣布一些與國際 LGBTI 權利、社會、經濟相關的資金及政策承諾，然而這些援助決策似乎是臨時產生的，常是為了應對特定事件 (如平等權利聯盟會議) 或外部壓力 (如來自聯邦政府其他部門或來自加拿大民間社會的壓力)，而非作為援助政策以解決 SOGIESC 問題的願景 (Aylward & Brown, 2020)。學者建議政府除了採用總體的指導框架外，也需要將 SOGIESC 納入至以非 LGBTI 為重點的援助計劃和項目，如性與生殖健康權利領域，以強化交織性觀點的運用及廣泛領域的關懷，並制定相關政策來說明具體行動，如禁止向反 LGBTI 組織提供資金等 (Aylward & Brown, 2020)。

雖然在公民社會的層次分析上，透過小組報告以及其他民間組織、學術研究的補充論述，豐富了加拿大民間社會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討論與關注，但政府在後續行動中，仍缺乏足夠的修正與改善。主要的變化體現在裁軍與非軍事化方面，GAC 在 2017 至 2022 年的國家行動計畫中，其中一項工作重點即是防擴散、軍備控制與裁軍的政策與規劃，表示將與其餘部門合作，實施針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控制，在《減少武器計畫》(Weapons Threat Reduction Program) 中納入 WPS 議程與性別主流化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k)。而 GAC 在部門計畫進展報告



的原先設定目標中，於 2021/22 財政年度須在至少 20% 的項目以系統性的方式考量性別與安全等因素，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已實現此目標，在該財政年度的 101 個工作項目中，有 53 個（占 52.48%）被認為具有性別平等觀點，具體內容包含《減少武器計畫》與實施夥伴合作，透過使用性別影響評估以及與利害關係人的協商，確保將性別觀點應用於所有相關項目中（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l）；或是將以性別為基礎的分析整合到項目的所有階段，包含執行夥伴在計畫設定階段確定潛在的性別平等影響、在過程中監測成果、計畫結束後持續監測等（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l）。另外該部門進展報告也說明加拿大透過積極的外交和多邊參與，將性別觀點納入與提高在裁軍協商和決策中的分量，並產生實質影響，使得聯合國第一委員會<sup>22</sup>（First Committee）在 2020 年通過的 72 項決議和決策中，有 18 項採用、維持或加強了性別觀點（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l）。國家行動計畫與部門計畫進展報告顯示了 GAC 在推動軍備控制與裁軍的重點工作，並藉由具體的數據呈現工作效果，部分回應了小組成員關注的「在國際場合支持裁軍行動」，然而針對女性進入軍事機構可能面臨的傷害，或是透過批判性觀點來進行結構性關注等，GAC 未於相關政策中給予回應。

經由本節分析，民間組織對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影響上相當有限，未能改變政策目標與側重方向，尤其政策著重在經濟賦權與減少貧困的論述，引起了相當的回應與建議，認為應避免將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視為一種消除貧困的手法，而是透過女性主義的批判性哲學與觀點，形塑政策來解構父權體制對女性的壓迫與宰制，將性別平等置放於政策目標的核心。雖然在 2017 年以前，小組並未有針對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倡議行動，但自該國提出政策後，小組便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關注更為廣泛的目標論述、政策內容、國內外政策整合等問題，欲藉由此討論與關注，期待加拿大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屬於該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然而加拿大政府針對小組成員的意見反應，多數未有明確的回應與修正，僅於裁軍或非軍事化的回應上，透過 GAC 的 2017 至 2022 年的國家行動計畫來說明改善部分措施（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k）。

---

<sup>22</sup> 聯合國第一委員會專門處理裁軍、威脅和平的國際挑戰等國際安全事務，並透過相關政策來因應國際安全制度中的挑戰（United Nations, n.d.b）。


## 第四章 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挑戰與國際比較



藉由國內政治因素的分析與比較，可以理解各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經驗，並有助於分析臺灣推動政策可能面臨的挑戰。本文分析與比較瑞典與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形成與關注面向的影響，其突出的重要性乃此外交政策與主流政策運作的現實主義或自由主義觀點不同，批判了父權體制下的國際關係，關注到更廣泛領域的安全、和平與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第二、三章的分析結果呈現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行動者層次的政策領導人是關鍵影響因素，其可以是一國的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來推進該國相關政策的形成與側重面向，同時國家長期的性別平等發展也扮演重要的角色，能夠為該國重視人權或平等價值的政策提供經驗基礎；而援外組織與民間組織則在不同背景下對不同國家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可以在政策中指導與改變施政走向。

臺灣在性別平等發展上，也處於亞洲區域的領導地位。國際排名中，臺灣近年表現位處前段班，2021年GII為0.036，於171個國家中，排名位居第7、亞洲第1（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3）；而GGI則為0.748，於156個國家排名中位居第38名、亞洲名列第3名，低於該年菲律賓的0.784與寮國的0.750（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2）。2023年SIGI分數為9.2，與義大利並列世界第7（OECD, n.d.）。政治參與方面，臺灣女性國會議員比例表現也相當優秀，2021年的女性國會議員占比42.0%，在世界銀行該年統計的189個國家中，名列第25名、亞洲第1名（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3）。經濟參與方面，2021年臺灣女性勞動力參與率為51.5%（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3），優於當年全球平均的46.3%（Our World in Data, n.d.）。

除了以上數據，臺灣近年在性別平等發展中，亦透過立法與制度規範來矯正父權體制的迫害，促進性別友善的平等環境。1990年代後期至2005年間，許多關乎女性人身安全、勞動參與或受教育等權益的保障因婦女運動的倡議或重大社會事件的影響，促成相關的性別平等法案或規範的修訂及建制（成令方，2015）。針對女性安全的包含1997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8年家庭暴力防治法、1999年增訂刑法中妨害性自主相關條文、2005年性騷擾防治法、2021年跟蹤騷擾防治法；



女性經濟賦權則有 2002 年的兩性平等工作法（2008 年改為性別平等工作法）；關注女性教育權利與環境的則有 2004 年性別平等教育法，並引入「性騷擾防治」的概念，為女性創造更友善與安全的教育環境；於多元性別方面，2019 年同性婚姻合法化，為亞洲第一個合法化的國家，並於 2023 年開放同性配偶收養。而在國家推動性別平等工作與強化整合方面，自 2005 年開始，政府呼應聯合國北京行動綱領的倡議，通過「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期許政府施政必須具備性別觀點（吳秀貞、蔡昀穎，2020）。也於 2007 年簽署加入 CEDAW、2011 年將其國內法化，表示與國際接軌，保障性別人權與促進性別平等規範。在性別平等官僚組織建立的方面，2012 年行政院為回應婦女團體的倡議內容與強化臺灣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於行政院設置性別平等處，乃臺灣第一個性別平等的專責機制，同時也將「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擴大為「行政院性別平等會」，由性別平等處擔任性平會幕僚工作，統合跨部會各項性別平等政策（吳秀貞、蔡昀穎，2020）。

此外，臺灣也在國際行動上參與性別平等事務，行政院性別平等處透過跨部會與公私部門的協力機制，積極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周邊會議、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婦女與經濟夥伴關係、婦女與經濟論壇、與歐盟合作等，以此強化國際關係、深化與國際社群在女性或性別議題的實質合作、拓展國際空間（吳秀貞、蔡昀穎，2020）。如經濟部 2014 年依據女性創業特質設計的「女性創業飛雁計畫」或透過臺灣與歐盟的對話建立起性別平權交流合作，都是在國際社會中貢獻臺灣性別平等經驗的具體案例（吳秀貞、蔡昀穎，2020）。聯合國倡議會與活動參與中，亦透過非政府組織參與周邊論壇、自主承諾遵循 CEDAW 及在地審查等非正式外交方式，突破我國在國際現實中難以官方身分表態的困境，讓臺灣在落實聯合國倡議、人權公約及促進性別平等與國際接軌（吳秀貞、蔡昀穎，2020）。由於受限一中原則與國際困境下，臺灣難以參與跨國組織的官方事務或相關行動，因此與非政府組織合作的半官方形式，便成為臺灣參與國際事務的有效途徑，而 2000 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委員會（2012 年改名為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便積極協助與輔導國內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事務，實踐民間單位在國內監督政府的角色以及在國際社會展現軟實力的量能，並配合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從事國際人道、性別平等、醫療救援、消除貧困、民主促進、人權維護、環境保育等工作，提升臺灣在

國際社會的形象與能見度（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無日期 a）。


以上顯現了臺灣性別平等發展的成效與努力，雖然婦運起步雖然較晚，但是制度化的進步卻位居世界前茅，歸功於女權運動與政府的配合（顧燕翎，2020）。因此本文認為臺灣有相當優良的經驗與基礎來發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但具體關鍵影響因素仍圍繞著行動者層次，因此本章將透過臺灣在行動者層次、制度層次、公民社會層次的分析與探討，理解其餘面向是否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有所助益，或是分析可能面臨的挑戰，包含國家領導人、外交部長、政黨、援外組織、民間組織等五個面向，並將各項因素與前章分析的瑞典與加拿大進行比較。

## 壹、行動者層次

### 一、國家領導人

2016 年當選為臺灣總統的蔡英文在 1956 年出生於臺灣臺北市，幼年生活於雙親經營的汽車修理廠，在此背景下培養出專業、靈活、堅韌、打拚的中小企業精神（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a）。蔡英文 1978 年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1980 年取得美國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1984 年取得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法學博士學位，專長為國際貿易法與競爭法，爾後也參與了臺灣對外的經貿談判，包含臺灣加入關貿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或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過程中擔任談判顧問，另外也曾參與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擔任貿易及投資委員會服務業小組的主席（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a）。1990 年代後期開始，前後擔任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在兩岸關係的建設、互動與發展上投入相當心力（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a）。2004 年蔡英文加入民進黨，成為該黨立法委員、行政院副院長，並於 2008 年當選黨主席，於 2012 年第一次代表該黨參選第 13 任總統，成為臺灣首位的女性總統候選人，然最後落敗；2016 年第二次代表民進黨參選時順利當選，成為臺灣歷史上首位女性國家元首，亦為亞洲首位非出身政治世家的女性總統，於 2020 年順利連任（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a）。

蔡英文於其自傳中曾述及自身的外交工作與重視面向，在臺美之間關注的議題包含國防安全、經濟合作、國際空間、兩岸關係，具體內容如臺灣的國防投資、



兵力需求規劃、國防產業的投入、經濟合作、雙邊貿易發展等，其中於國際空間與兩岸關係兩面向中，特別說明重視臺海和平與穩定發展，並貢獻臺灣力量以拓展臺灣的國際空間(蔡英文，2015)。而其也曾於華府主要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發表演講，論述臺灣將在外交行動中打造亞洲新價值的典範，分為四大主題：參與式民主、公平分配與社會正義、以創新為基礎的經濟、積極和平的外交行為，強調以民主貫穿此四大主題，為經濟創新與分配正義打造良好基礎，並將臺灣作為亞洲的典範，來推動在國際事務的參與、建立國際友誼(蔡英文，2015)。自傳中，蔡英文著重說明將透過積極與美國、國際組織等互動，來發展外交空間並降低對中國的經貿依賴，增加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彈性與更多的可能。

蔡英文在 2016 年上任之後的外交主軸為「踏實外交、互惠互助」，具體原則包含以務實的方式與其他行為者建立正向、穩定的互動關係，藉此強化臺灣與世界的連結、厚植彼此互惠互利的友誼，同時藉由官方互動、企業投資、民間合作等方式，在經濟、教育、文化、農業技術、醫療等領域強化彼此的連結(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

而蔡英文對於女性主義及對外行動中性別平等的關注，體現於表 4-1 從中華民國總統府網站所擷取的十六場演講與聲明中：


表 4-1、蔡英文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6 年 11 月	國際婦女理事會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Women, ICW) 執行委員會會議	說明臺灣經驗與日後的具體施政計畫	表示臺灣已開始試辦之長照計畫與實施之公共托育政策，減輕女性負擔，同時透過政策來賦予女性平等參與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機會。
2017 年 3 月	「106 年度國際婦女節」開幕活動	政府施政主軸為排除就業障礙與支持女性投入職場	該年度慶祝活動主題為「女力耀進、創新經濟」，強調打破性別刻板印象、打造友善勞動環境、強化公托與長照，以此提升女性的經濟自主，指出其為性別平等最關鍵的一步。
2017 年 8 月	2017 CALD 亞洲自由民主聯盟—女權高峰會	重申政府促進性別平等的決心與說明相關政策	性別平等的時代需突破傳統框架，並賦予女性足夠的選擇權與機會，具體政策如公共托育、長照體系、協助女性創業等，也說明協助他國的女性賦權。
2018 年 11 月	世界女記者暨作家協會的專訪	表達女性從政的經驗挑戰與實踐性別平等的方法	在實踐性別平等的方法上，指出不僅相關立法很重要，更關鍵的便是女性自覺，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做男性能做的事。
2019 年 3 月	接見「國際婦產科醫學聯盟人員」	國際婦女節當日支持永續發展目標與促進孕婦安全	宣傳臺灣在降低孕婦死亡率的努力以及相關研究的貢獻，並表態支持性別平等與提供女性與婦產科醫師更多的保障。
2019 年 3 月	太平洋婦女領袖聯盟會議	說明臺灣的性別平等發展與政策，以及區域合作的重點內容	論述臺灣十多年前即開始推動性別平權，並表示越多女性能經濟獨立，社會就更加穩定與繁榮，將透過計畫協助女性經濟獨立自主，藉由跨國行動來促進區域的性別平等。
2019 年 4 月	臺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婦女賦權場次	說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的女性賦權項目	強化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合作，並透過項目計畫實踐女性賦權，具體方法包含鼓勵創業、改善勞動環境、提供相關資源等。
2019 年 11 月	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	臺灣將提供助力協助女性免於暴力威脅	說明臺灣既有的政策如何保護女性免受不同形式的歧視與暴力威脅，並重申臺灣透過交流行動來提供相關援助。
2021 年 3 月	2021 年國際婦女節	鼓勵女性發展勇氣力量突破框架並參與平權倡議行動	說明女性在各種生活中可能面對的挑戰，並希望大眾營造友善環境、激勵女性突破框架，實踐性別平權。
2022 年 3 月	「淨零臺灣 女力行動」起跑記者會	說明女性對環境保育的行動與貢獻	表揚女性在各場域對「淨零排放」的貢獻，以及響應國際社會追求的目標。
2022 年 3 月	女力之夜外交酒會	宣揚臺灣在性別平等的成果與未來施政方向	介紹臺灣在各層面的努力，認為女性是推動變革的力量，同時呼應該年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的主題，關注性別平等與氣候正義。
2022 年 3 月	駐台使節慶祝婦女節午宴	與理念相近國家建立合作機制並實現性別平等	性別平等發展上，臺灣不僅要汲取他國經驗，也與國際社會分享，一同在區域與全球建構合作機制，實現沒有歧視的世界。

2022年 4月	視訊接見「台瑞典國會議員協會暨歐洲國會議員聯合訪團」	持續深化臺灣和瑞典、歐盟的合作交流	表明臺灣與瑞典是理念相近的夥伴，在不同議題領域開展許多合作，並期盼日後能夠持續交流，捍衛自由與民主價值。
2022年 12月	2022女科技人大會—邁向工作與生活共榮的新職場	政府須為友善職場努力以促進女科技人的參與	說明臺灣科技產業對全球的貢獻與重要性，並指出政府有義務促進職場友善，以讓女科技人可以更安心地參與及激發創意。
2023年 2月	女力拉美加論壇	分享臺灣經驗與推動女性經濟賦權	宣揚臺灣平權成就與經驗，將與友邦合作，協助婦女提升就業技能或提供創業資源。
2023年 3月	衛福部「慶祝國際婦女節系列活動記者會」	說明政府持續鼓勵與促進女性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政府將透過具體措施來保障女性的選擇權與創造友善環境，以讓女性自由地實現理想中的自己，包括創業、育兒津貼、公共托育、不孕症治療等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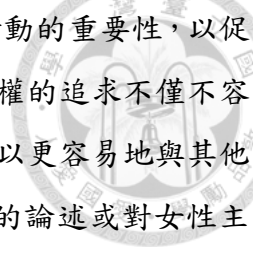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b，2017a，2017b，2018，2019a，2019b，2019c，2019d，2021，2022a，2022b，2022c，2022d，2022e，2023b，2023c)

經由本文從總統府官方網站擷取的十六篇演講與聲明，可以發現蔡英文在公開場合關於性別平等的演講，主要呈現出關注性別平等經濟賦權與強化國際聯結的特質。於經濟層面的關注體現在2016年國際婦女理事會、2017年國際婦女節、2017年CALD (Council of Asian Liberals and Democrats) 亞洲自由民主聯盟—女權高峰會、2019年太平洋婦女領袖聯盟會議、2019年臺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2022女科技人大會、2023年女力拉美加論壇、2023年國際婦女節中，多數說明了勞動參與對女性的重要性，也是促進性別平等關鍵的一步，而要提升女性經濟賦權，便要鼓勵女性自覺與透過實質行動矯正結構層面的壓迫，蔡英文說明臺灣的具體行動與經驗，包括以社區為基礎的長期照顧計畫、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鼓勵企業提供托兒設施等，言明政策目的乃減輕女性照顧壓力與責任、創造友善的工作環境，使得女性得以規畫職涯發展與提升勞動參與的意願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6b，2017a，2017b，2019b，2019c，2022e，2023b，2023c)。而在太平洋婦女領袖聯盟會議中更進一步表示，當一國的女性能夠經濟獨立，社會便能趨近穩定與繁榮，同時表示臺灣透過「女性創業飛雁計畫」，使得國內女性企業家的比例提升至36% (中華民國總統府，2019b)。於2023年慶祝國際婦女節系列活動記者會中，蔡英文也說明政府致力於創造友善環境，激勵女性自由地追求理想中的自己，包含經濟面向中的公共托育、育兒津貼、創業資源等；也涵蓋了性與生殖健康權利面向中的不孕症治療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3c)。



除了在性別平等中經濟賦權的關注，蔡英文也強調臺灣與區域、全球夥伴的連結及合作。如於 2017 年的亞洲自由民主聯盟，蔡英文說明了臺灣與美國在 2016 年 APEC 經濟領袖會議期間，共同宣布合作成立「APEC 婦女與經濟子基金」，協助區域國家推動女性賦權，協助女性創業、追求在職場的發展等（中華民國總統府，2017b）。另外在太平洋婦女領袖會議中，也表示與馬紹爾群島共和國總統一起見證兩國簽署「婦女創業小額貸款循環基金」備忘錄，為該國女性提供創業所需的資金與硬體設備，不僅是為了實踐該國女性的經濟自主，也透過事業發展的過程，來培養女性於經濟參與中的滿足感、成就感及自信心（中華民國總統府，2019b）。在 2019 年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其也說明將與全球夥伴共同促進世界的性別平等，協助女性免受暴力迫害與享有尊嚴平等的生活（中華民國總統府，2019d）。另外在 2022 年駐臺使節慶祝婦女節的午宴中，蔡英文說明具體的國際合作行動，如與澳洲、美國及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國家建立合作機制，包含「APEC 婦女與經濟子基金」、「婦女倍速計畫」，以實現性別平等（中華民國總統府，2022c）。在 2022 年臺瑞典國會議員協會暨歐洲議會議員聯合訪團的活動中，蔡英文指出臺灣和瑞典共享著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並在此共識下於近幾年強化各項領域的交流，如氣候變遷、性別平等、女性經濟賦權、對抗假訊息等，同時提出了「強化歐洲鏈結計畫」，期待在既有的基礎上，加深臺灣和歐盟的關係。而瑞典國會「臺灣－瑞典國會議員協會」的歐柏莉（Boriana Åberg）主席則讚許了臺灣於自由、民主、防疫等經驗的表現，也啟發各國人民對於中國共產政權侵害人權事實的關注，說明國際社會有義務與臺灣站在一起，以捍衛臺灣的自由與民主價值（中華民國總統府，2022d）。同年的國際婦女節與女力外交酒會，蔡英文也在演講中響應國際社會追求氣候正義的目標，並認同女性推動改革的能量，關注相關場域的議題（中華民國總統府，2022a，2022b）。

上述兩項特質呈現出蔡英文在性別平等議題的關注，著重於經濟發展與國際空間的拓展，尤其針對國內發展的演講中，多數都在表明政府如何透過政策創造友善的職場環境、減輕女性照顧工作、提供創業資源等。而在專訪中，蔡英文針對實踐性別平等的方法上，認為相關立法相當重要，可以營造友善的環境，另外更為關鍵的便是女性自覺與突破框架，相信擁有與男性同樣的能力（中華民國總統府，2018）。在國際一中原則衍伸的困境下，蔡英文積極地在各方場合透過經濟論述來



強化國際之間的性別事務合作與參與，並持續強調立法與相關行動的重要性，以促進女性發展機會與資源，參與更為廣泛的經濟勞動。由於經濟賦權的追求不僅不容易面臨爭議，也較吸引他國的合作，因此在拓展國際空間方面可以更容易地與其他國家或友邦建立關係，但也因此蔡英文缺少其餘性別平等面向的論述或對女性主義的立場進行說明，如結構性問題、女性解放、人道干預等，也未闡述性別平等政策的目的，是重視平等實踐抑或消除貧困。不過蔡英文在對外行動與性別平等相關的論述中，呈現出積極拓展國際空間的特質，致力與其他國家在平權議題上的合作與交流樣態，同時述及的區域合作政策，皆帶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子，即藉由實質的外交行動促進全球性別平等發展，可以視為臺灣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基礎。

## 二、外交部長

在外交部長面向的分析中，本文將研究自 2018 年 2 月 23 日起擔任中華民國外交部長的吳釗燮，著重其生平、價值觀與性別平等議題立場等論述，來探討與分析該因素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推動的影響或挑戰。

吳釗燮於 1954 年出生於臺灣彰化縣，1978 年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1982 年取得美國密蘇里大學 (University of Missouri) 政治學碩士、1989 年取得俄亥俄州立大學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政治學博士，爾後於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擔任專任研究員，同時在政治學系所兼任教授，1999 至 2002 年擔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於 2002 年民進黨執政時期開始從事政治工作，先後擔任總統府副秘書長、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駐美代表，2008 年國民黨執政後則擔任民進黨要職，如政策委員會執行長、秘書長等，並於 2016 年蔡英文當選總統後，先後擔任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總統府秘書長，並於 2017 年擔任外交部長至今 (2023 年 6 月)。

吳釗燮擔任外交部長期間，延續著蔡英文外交政策的「踏實外交」主軸，在任內持續推動與其他行為者的合作與互動，具體如「新南向政策」，自 2017 年 6 月起，逐步深化與政策標的國家的雙邊經貿發展、區域安全、氣候變遷、疾病防治及災害救助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讓雙方都能從中獲利 (吳釗燮，2018)。除此之外，其也將「踏實外交」的政策主軸連結到國際合作發展的「臺灣模式」，說明積極透

過與雙邊或多邊組織的場合，實踐臺灣援助的力量，並以此模式與友邦進行永續、透明、負責、互利互惠的合作發展計畫（中華民國外交部，2019），如落實在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的「結合公私部門資源、強化夥伴關係」的實質轉型，藉由盤點與整合國內外友臺社群的資源來擴大機構能量，型塑最佳的援助工作方法，並於國際場合中分享相關經驗與技術，以此突顯臺灣的援助角色（吳釗燮，2019）。至 2021 年時，「踏實外交」的政策主軸除了包含過往述及的援助工作、拓展臺灣的國際空間，更提及捍衛國家尊嚴與守護自由民主的共享價值（中華民國外交部，2019，2021）。

吳釗燮任內所推動的性別平等相關外交工作，主要是 2018 年開始與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共同辦理的「女力外交專案」，透過相關活動來推廣與提升女性在外交工作上的參與或影響，並在國際社群中展示臺灣促進女性賦權與性別平等工作的成果（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2018，2020）。具體行動多為舉辦講座或是研討會，如 2020 年於聯合國「紀念第 4 屆世界婦女大會 25 週年高階會議」前夕舉辦系列研討會，分享臺灣在實踐性別平等工作的經驗與成就，同時外交部也與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規劃在社群平台上分享研討會辦理情形並發起#FeministsDemand 倡議活動，關注了女性主義的不同領域，圍繞在女性領導、青年發聲、社會正義、經濟賦權和健康議題等概念，以此號召具影響力的國際婦女組織在線上進行串連與分享，喚醒公眾對議題的重視，呼籲全球落實性別平等的永續發展目標（中華民國外交部，2020）。另外還有 2022 年，配合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大會舉辦期間，共同辦理的「臺灣性別平等週」，針對女性賦權與氣候議題進行討論與經驗分享（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2022）。其他活動亦包含 2021 年的「加速女性經濟賦權」線上研討會、2022 年的氣候正義領袖論壇、2023 年關注女性創業與研發能力的科技女力臺灣之夜或科技女力 X.Y.Z 座談會等（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無日期 b），然該專案根據官方網站資料，自 2021 年開始，每年僅 3 月會公布或釋放專案工作成果，且活動主要圍繞在舉辦講座、研討會等社會倡議、國際發聲、政績宣揚或經驗分享（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無日期 b），其餘並未有其他明確的工作內容、方案規劃與目標，或是制度化的作為，推測應為每年響應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期間的系列活動，透過與非政府組織等民間單位的合作，促進臺灣在國際性別平等事務的參與並強化國際連結，然也導

致「女力外交專案」並沒有制度化的目標、資源分配、時程規劃、評估項目等，呈現出偏向「女力宣傳」的樣貌。


而吳釗燮對於女性主義與對外行動中性別平等的關注，則體現於表 4-2 從中華民國外交部、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等網站擷取的六場演講與聲明中：

表 4-2、吳釗燮各場合公開聲明與演講資料

日期	場合	演講與聲明主旨	內容簡述
2019 年 11 月	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	與各國針對女性安置政策、立法、平等、經濟賦權等議題進行交流	說明臺灣性別平等方面的努力與具體成果，並期許透過舉辦相關會議與交流經驗促進國際間平權發展。
2021 年 10 月	「邁向平等之路：落實女性公共參與權」線上國際研討會	聚焦女性公共參與，分享臺灣政策經驗與強化國際合作	說明女性賦權與友善環境的重要性，並指出將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提升全球女性的社經地位。
2022 年 3 月	女力之夜與性別平等週	說明活動內容並邀請各國女性領袖分享經驗	介紹性別平等週系列活動以及各國女性領袖在氣候正義方面的努力。
2022 年 5 月	出席「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區域論壇	說明臺灣針對疫情挑戰的行動與援助量能	為了提升在地經濟能力，包含就業與創業等競爭力，將協助該區域的弱勢社群，並強調女性是社會變革的動力，強化經濟參與將為臺灣與中美洲地區帶來新的合作機會。
2022 年 9 月	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駐臺灣大使哈菁絲受外交部長贈勳	表彰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大使的貢獻與合作	除了表揚該大使促進兩國友誼、促進經濟、教育、文化及觀光交流，更指出該大使重視性別平等議題，致力於推動女性平權、強化兩國人民交流。
2023 年 2 月	歡迎羅莎娜特使偕員來台出席「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婦女賦權國際論壇」	說明臺灣與貝里斯的性別平等發展以及倡議內容	除了表彰貝里斯總理夫人兼婦幼特使羅莎娜長期致力於提升貝里斯教育及女性權益、女性經濟賦權、反性別暴力等理念外，也重申兩國自 2021 年 10 月起共同合作執行的「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外交部，2022a，2022b，2022c，2023；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2019；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2021)

根據吳釗燮於任內推動的外交政策主軸、國際合作模式、女力外交專案與演講或聲明的資料，可以發現其並未對性別平等或女性主義的概念有明確的定義或是



關注內容，而多是從外交部長的職權，說明臺灣如何透過與其他行為者建立或維持關係的方式，來拓展臺灣的國際空間，或是宣傳臺灣在性別平等方面的努力與成就，以強調與其他國家的合作與臺灣能貢獻的能力，緊扣著「踏實外交」、「臺灣模式」的主軸。2020年，吳釗燮說明將捍衛國家尊嚴與自由民主等價值時，圍繞在與理念相同的國家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雖然強調自由、民主等價值，但性別平等並非政策注重的面向；另外，「女力外交專案」的內容多圍繞在向國際社會介紹臺灣的女性賦權發展與經驗，並未討論如何促進女性在外交方面的工作，或是外交政策如何促進性別平等的發展。而在演講或是聲明提及性別平等時，多是表揚與友邦之間的發展內容或是宣傳臺灣的政績，如2021年的線上國際研討會或是2022年與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大使的外交活動，都強調著與他國的合作，但具體合作內容、注重面向、核心主軸、關懷領域等都未有具體的工作項目或對外行動。唯一例外是在「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的區域論壇中，吳釗燮透過演講聲明，具體促進女性經濟參與的方式包含能力建構、金融服務配套措施，以此提升該區域的女性、青年、微型或中型企業等弱勢社群的在地就業與創業競爭力（中華民國外交部，2022b）。但該方案關注對象只在特定的拉丁美洲與加勒比海區域、內容只限於創業與勞動參與，並未關注到更廣泛的女性權益問題。

以上資料顯示吳釗燮對於外交中的性別平等工作缺乏關注或是想像，只停留在表揚、宣傳臺灣性別平等發展的層次，工作內容也多圍繞在辦理講座、論壇或研討會，較少於外交工作中闡明如何促進他國的性別平等發展，這部分的現象可能源於臺灣在國際困境的情況下，因外交部長的官方身分難以拓展與友邦之外國家的合作，或是合作內容多侷限在較無爭議的經濟領域，抑或可能因難以在國際社群發展官方行動，只能透過宣傳臺灣性別平等的成效、經驗或貢獻，提升國家能見度與吸引他國交流。另外在與非政府組織發展出的非官方模式參與國際性別平等事務中，也因為其並非官方行動而難以制度化，導致女力外交專案僅能透過每年響應、舉辦零星活動的方式參與國際事務，內容也僅能聚焦在經驗分享與政策交流，無法形塑成具體目標與方向的外交政策，同時也反映在外交部長吳釗燮相關的演講與聲明中，無法看到其對於性別平等廣泛的關注。



### 三、政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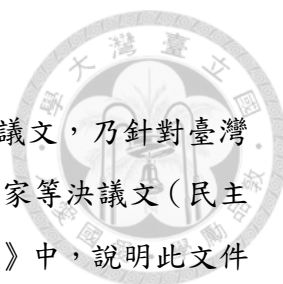
臺灣民主化後，民進黨在性別平等政策和機制的建立上扮演著先驅角色，其1996年首開先例修改黨章，在公職人員提名上納入四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後，於內閣人事上採用相同的性別比例，任用多位女性閣員，促進了性別均勢（黃長玲，2001）。1997年，民進黨也通過黨內職務是用四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黃長玲，2001），拓展了女性參政空間（簡舒培，2021）。而本文在臺灣挑戰的分析關注當今的總統與外交部長（2023年6月），兩人皆為民進黨籍；另外國會多數黨<sup>23</sup>亦為民進黨，因此將以民進黨的核心價值、意識形態與性別平等或外交政策為研究主軸，分析民進黨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推動上的影響與挑戰。

根據民進黨最新修訂的《黨綱》（民主進步黨，2019），該黨有六項基本主張，分別為建立主權獨立自主的臺灣共和國、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成長均衡的經濟財政、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創新進步的教育文化、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注重的面向相當廣泛，從國家主權、外交行動或國民身分的獨立性，乃至社會發展、經濟環境皆有所探討。而其中，《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更進一步主張建立公平安定的社會體系、追求福利國家、實現全民安全制度等，顯示了該黨對於促進平等與社會正義有一定的關注（民主進步黨，2019）；外交行動上，《和平獨立的國防外交》也主張以平等互惠獨立自主的原則來修復與發展國際關係，並與愛好和平、崇尚國際正義、具有自由民主信念、尊重國民主權和生存權的國家，一同建立關係，同時也強調和平解決國際爭端、臺灣前途由臺灣全體住民決定等，說明了民進黨的基本外交政策方針，乃重視與理念相同的國家建立關係以及拓展國際空間（民主進步黨，2019）。

而民進黨對於性別平等的主張與態度，則體現在《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述及女性勞工的保障、《行動綱領》表態將推動兩性平權政策以保障女性參政權、工作權與人身安全，另外也說明要提高女性勞動參與率、並實施親職假及彈性工時制度，避免女性因性別、婚姻、懷孕、生產而受任何歧視。可見民進黨在官方文件中，主要以經濟平等或賦權的角度來思考與認知性別平等問題，重要宣示中並未探討到社會結構層面對女性的迫害，或是其他層面如生殖健康、醫療保健、裁軍、性暴力、

---

<sup>23</sup> 臺灣立法院於2023年6月總共113席的各黨派席次分布如下：民主進步黨62席；中國國民黨37席；台灣民眾黨5席；時代力量3席；無黨籍5席；缺額1席（中華民國立法院，無日期）。



和平與安全等議題（民主進步黨，2019）。

民進黨基本規章除了《黨章》、《行動綱領》外，還有六項決議文，乃針對臺灣的國家定位與未來發展所提出的行動方針，如臺灣前途、正常國家等決議文（民主進步黨，2019）。而在 2019 年提出的《社會同行世代共贏決議文》中，說明此文件目的乃應對於改革路線上如何有效關注處於不同社會位置的民眾，並表示民進黨治理下的臺灣將捍衛主權獨立、強化政府民間協力治理與推動公平永續的社經轉型，在外交部分也表態透過民主人權的成就與密切的國際經貿連結，來持續拓展與深化國際關係（民主進步黨，2019）。

民進黨的官方資料顯示出該黨對於社會正義、平等發展、人權注重、理念追求的外交有一定的重視，但也未能從官方中發現從這些關注中延伸的具體政策，如人權注重的層面，並未探討該以何種角度或是具體措施來促進人權保障。而在性別平等方面，更只侷限在勞動參與或經濟平等的說明，未關注到社會結構性的父權迫害，以及其他層面的探討。

除了民進黨的官方文件，其也透過設立性別平等事務部，持續推動女性或新住民議題的關注與政策（民進黨性別平等事務部，2023a）。該部門於 2023 年由「婦女發展部」更名為「性別平等事務部」，表示將依 CEDAW 的精神<sup>24</sup>，持續推動性別平等相關政策，包括女性參政、人身安全、家庭暴力與性暴力、婚育議題、性別平等教育與情感教育、同性婚姻、性私密影像散佈與數位性暴力等（民進黨性別平等事務部，2023b）。然於官方文章也指出婦女部隸屬民進黨，於中央執政後，部門的倡議行動也會隨著行政團隊的政策節奏而有所變動，顯示出該部門與行政體系高度連結，未必擁有自主運作與獨立倡議的空間。

民進黨在官方文件上並沒有針對性別平等有明確的政策與主張，僅透過《公平開放的福利社會》主張社會的平等發展，而在外交政策方面，民進黨雖關注了民主、人權價值的推動，但並未述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儘管該黨有性別平等事務部的設立，但較少在對外行動關注性別平等的實踐或發展具體政策。

<sup>24</sup> 根據該文，其表示此精神可藉由民國 100 年中央政府公佈的「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三大理念來說明（民進黨性別平等事務部，2023b）：

1. 性別平等是保障社會公平正義的核心價值。
2. 婦女權益的提升是促進性別平等的首要任務。
3. 性別主流化是實現施政以人為本的有效途徑。




## 貳、制度層次

本文將探討的援外組織，將以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國合會)為對象。其為臺灣負責執行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與其他政府委辦之援外計畫的專責單位，根據《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設置條例》，其乃隸屬於外交部下的財團法人組織，資金來源包含政府預算撥入、基金孳息、借入款項、捐款收入等，設立目的為協助友好或開發中國家的發展及提供人道救援，具體方法將透過投資、融資、技術合作、人道援助、國際教育訓練等方式執行援助政策，或是利用基金孳息來辦理雙邊或多邊的技術合作、人道援助或教育訓練等計畫(國合會，2023a)。雖然其以非官方的財團法人組織型態組成，但因隸屬外交部、政府預算撥入為主要資金來源，且組織工作內容乃執行臺灣政府的援外計畫，因此本文將以國合會為研究分析的對象。

國合會的核心價值為「進步、發展、關懷」，以此為原則與夥伴國政府、私部門、公民社會等開發援助夥伴，一同整合經驗、知識、技能或資源來創造平等、繁榮的永續未來(國合會，2022a)。具體推動事務包含協助友好或開發中國家經濟或社會發展、提供人道援助、成立海外服務工作團等(國合會，2022a)。而該組織員額方面，於國內擁有 110 位職員，派駐海外則有 151 位，在各地實地執行各項發展合作任務(國合會，2023a)。

進一步關注國合會對於性別平等的政策，卻發現性別平等或是女性賦權並非該組織的優先領域<sup>25</sup>。依據國合會 111 年度工作報告，該援外機構執行中的計畫共有 79 項，其中農業領域計畫 39 項，占總計畫數約 49.4%；公衛醫療領域 12 項，約占 15.2%；教育領域 5 項，約占 6.3%；資通訊領域計畫 1 項，約占 1.3%；環境領域 5 項，約占 6.3%；中小企業領域 9 項，約占 11.4%；跨領域及其它 8 項，約占 10.1%(國合會，2023b)。在這些項目中，並未有將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視為一優先領域或是優先目標的行動計劃。且在其餘國合會將性別平等視為目標的計畫中，多半著重女性經濟賦權，如經濟問題改善、小額貸款、融資計畫、建立相關金融機制等，包括「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友邦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

<sup>25</sup> 優先領域為農業、公衛醫療、教育、資通訊、環境、中小企業(國合會，無日期)。



畫」<sup>26</sup>、史瓦帝尼婦女微額金融機構能力強化計畫、帛琉婦女、青年暨中小企業轉融資計畫、東南亞暨南亞婦女生計貸款計畫、貝里斯協助生產性部門及婦女企業貸款計畫、後疫情時期協助婦女經濟賦權機制貸款專案等（國合會，2023b）。在《中小企業》的優先領域中，亦重視小額貸款與微型創業，說明需特別保重多數發展中國家鄉村地區的女性與青年經濟能力，以維繫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國合會，2022b）。以上資料顯示了在國合會的援外行動中，雖並未將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視為一項優先行動領域，但仍然透過相關的計畫促進友邦國家女性的經濟賦權，卻也限縮了援外行動中性別平等的廣泛程度，僅著重在經濟領域以及與友邦國家的互動中。造成此制度層次的問題，可能乃因國合會在對外行動中仍以友邦國家為優先發展合作或人道援助的對象，而這些國家多以發展中國家為主，迫切的需求仍為經濟建設，因此在性別平等的行動中，難以延伸資源投入至更廣泛區域的國家合作或是更廣泛的平權議題關懷。

國合會雖然在援外行動中，有以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為目標的相關計畫，但是其對於性別平等的關注完全限縮於經濟層面中，並未關注到其餘面向的議題，可能會使得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於臺灣推行時，相關的行動計畫也會限縮在經濟領域的實踐。而這部分的觀察也對應到鄭欣妮（2012）的研究，其指出國合會的援外策略焦點集中於總體經濟面向的事實，顯現了對於「發展」的有限想像與認知，也未能深刻理解到性別平等價值與人類永續發展之間的關聯。

## 參、公民社會層次

在瑞典的研究中，可以發現 CONCODR Sverige 雖然於政策前並未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倡議，但在政策施行之後透過長期的關注與意見回饋，使得瑞典在 2018 年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與行動計劃提出進一步的修正與改善，回應了組織的關注與建議，顯示了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組織也能對外交政策產生影響。

---

<sup>26</sup> 此計畫以創造女性、青年、原住民或弱勢族群之就業人次與提供女性金融服務、資通訊工具、訓練及輔導課程為目標，透過與東加勒比海信用保證公司、中美洲銀行及巴拉圭微小中型企業信用保證基金等多邊及外國機構簽署婦女信用保證合作協議，提升八個友邦的女性勞動參與及經濟自主能力，同時藉由國際培幼會（Plan International）、美國糧食濟貧組織（Food For the Poor, FFTP）及美洲農業合作組織（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operation on Agriculture, IAC）等 12 個國際組織合作推動女性賦權的國際倡議（國合會，2023b）。

因此本文將就民間組織的反應與倡議行動來分析在公民社會層次中，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的發展或挑戰。

臺灣民間組織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缺乏討論，僅有政府所屬的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婦權會）<sup>27</sup>於 2020 年發行的第三十二期與第三十三期《國際性別通訊》中共三篇文章提及，文章與倡議內容如表 4-3。臺灣的性別政策機制，長期由民間組織與政府部門相互配合或溝通來形塑相關行動，雖然婦權會乃政府所屬的財團法人，但其作為民間與政府對話、婦女資源與資訊交流的平台，且董事會並非全由官方人員所組成，亦納入婦權團體代表或專家學者，相當地推動公民社會對於性別議題的關注與性別平等發展促進。因此，從嚴格的定義來觀察臺灣公民社會層次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上的關注，雖未有民間團體對政策提出明確倡議，但若考量婦權會與民間合作、交流、對話的特質，公民社會的行動或關懷仍能藉由該組織進行倡議，甚至可能影響政府決策，彰顯出國內政治因素中公民社會層次的影響力道，所以本文仍將婦權會發行的期刊納入本文的分析，探討於臺灣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挑戰。

---

<sup>27</sup> 1997 年行政院成立「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成員涵蓋部會首長、專家學者、民間婦女團體代表，並於同年決議以 10 億元額度成立「行政院國家婦女人身安全基金」，後為了促進在預算審核與基金運用上的彈性，以捐資成立基金會的方式，建構一個婦女資源與資訊交流的中心（婦權會，無日期）。組織架構上，基金會董事長由衛福部部長兼任，執行長由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署長兼任，並設專職副執行長一名，董事會 15 至 19 人中，8 人為官方人員，其餘為社會專業人士與婦女團體代表（婦權會，無日期）。婦權會創立目的乃促進女性權益實踐與發展，透過辦理法令研議、議題研究、政策宣導、人員訓練、國際參與等推動性別平等事項，112 年度的預算書中名列推動婦女權益政策倡議、促進不利處境婦女經濟自立、提升社會大眾性別意識、深化性別平等事務國際交流為四大方向（婦權會，2022）。從以上方向衍伸的計畫經費需求為 3944 萬元，其中政府補助與政府委辦經費總計為 3114 萬元，占比約 78.9%，為主要資金來源，其餘經費來源為民間補助與基金會自籌（婦權會，2022）。

表 4-3、臺灣公民社會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期刊論述

文章名稱	作者	作者背景	倡議內容
全球性別平等運動新時刻及我國參與策略	張琬琪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員	以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來有效與永續地參與國際組織活動，並在未有亞洲國家公開採納此政策前，率先提出此政策成為區域性別平等領導者。同時指出須先梳理臺灣推動性別平等之國內政策與國際合作計畫的現況與挑戰，已提出對策來發展出具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想像一個更平等的世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同志觀點	陳乃嘉	彩虹平權大平台研究員	指出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中對於同志權益的篇幅甚少，但該國認知外交須以內政為基礎，透過瑞典的經驗啟示臺灣雖具備發展人權外交與女性主義外交的潛力，但前提是在國內政策完善性別平等的實踐，並在人權價值與追求利益或地緣政治折衝之間取得平衡。
女性主義是潮牌嗎？淺談瑞典與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顏詩怡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研究發展組組長	簡介瑞典和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內涵、挑戰、影響力，並指出女性主義價值須同時考量國際政治、他國主權、國內不同部門的利害關係，啟示臺灣思考如何從各外交面向落實性別主流化、建立屬於自身的性別平等國際品牌。

(作者繪製。資料來源：張琬琪，2020；陳乃嘉，2020；顏詩怡，2020)

而這幾篇文章的緣由是在 2020 年時，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委員開會做成決議<sup>28</sup>，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私下拜訪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徐斯儉，次長同意相關的發展方向，最後委由婦權會進行研擬相關研究與專題撰寫，探討與思索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可能性，然而這之後未見具體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出或進展，有可能是因 2020 年 7 月時徐次長轉任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政策研擬後繼乏力。而婦權會作為半自主的民間單位也未見進一步持續發展此議題。

由表 4-3 中可以發現婦權會研究員發表的文章從各國的經驗中啟示了臺灣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的可能路線與重點。由於臺灣特殊的國際政治地位，為了參與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年會暨非政府組織周邊論壇，仰賴政府與非營利組織的合作，以此透過與會的非營利組織代表，倡議國家性別平等成就、形塑國家正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持續監督政府，敦促採取更積極的作法促進性別平等（張琬琪，2020）。因此臺灣應率先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成為亞洲區域性別平等領導者，藉由制度的設計強化跨部門與跨世代夥伴關係，提供足夠的資源與資訊給與非政府

<sup>28</sup> 資料來源為曾任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委員的臺大外文系教授葉德蘭口述。

組織，才能有效地在國際場合上展現性平事務的影響力，發展出具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張琬琪，2020）。而顏詩怡（2020）則從兩國經驗的論述，啟示臺灣從外交面向落實性別主流化、建立屬於自己的性別平等國際品牌。

此外，彩虹平權大平台則為倡議同志友善的非營利組織，透過政治參與、社會教育、國際合作等行動與工作項目，企圖消除因性與性別產生的各種不平等。其前身「婚姻平權大平台」即在2017成立，透過組織化的方式進行政治遊說與社會倡議，以推動婚姻平權。而臺灣於2019年同性婚姻合法化後，彩虹平權大平台持續就跨國同性婚姻、同志家庭共同收養、人工生殖三大工作方向進行社會教育與政治倡議（彩虹平權大平台，無日期）。

因此陳乃嘉（2020）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同志觀點的論述，指出臺灣雖具備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潛力，但也須在國內工作完善性別平等的實踐。其說明在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中，可能因推動同志權益的挑戰過大而缺少對相關議題的關注，不過瑞典政府清楚認知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所以會先透過實踐國內性別平等、增加信譽，才進一步在國際上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因此臺灣在性別平等與同志友善的工作中，也需投入更多的關注與努力（陳乃嘉，2020）。

以上的比較顯示出各單位關注的面向不一致，不僅公民社會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缺乏共識與廣泛討論，許多仍著重於國內社會的平權發展，對於外交政策具體內容、側重面向、目標設定等皆未言明。陳乃嘉（2020）從同志政策的觀點出發，認同臺灣有發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或人權外交政策的潛力，但更須注重國內的性別平等實踐；而顏詩怡（2020）則認為需多方考量各利害相關人的角色與關係，並發展出屬於臺灣自己的性別平等外交風格；張琬琪（2020）更進一步地援引 L. Thompson（2020）的政策架構，說明臺灣未來設計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可以運用的模式，並注重在臺灣特殊國際政治地位之下，如何藉由外交政策來強化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共享資源與資訊，以期兼具提升國家正面形象與監督政府性別平等發展等功能。除了張琬琪（2020）的文章曾探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作為臺灣參與國際的策略外，其餘兩人缺乏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具體建議與關注，僅表態臺灣社會有發展的機會，但該如何發展、政策目標、注重面向、側重重點、具體屬於臺灣的風格或品牌，則相當模糊，而張琬琪（2020）雖然關注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作為臺灣參與國際社會的策略，並提供架構與臺灣特殊處境可以發展的面向，但對於

實際議題的關注，如資源分配、子議題的梳理、政策目標等也缺乏相關論述。這現象反映了臺灣在瑞典與加拿大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臺灣無論官方或是民間社會仍對此議題十分陌生，不僅於政府層面受到忽視，臺灣民間社會也缺乏相關知識，無法形塑具有臺灣特色或國家品牌的政策雛形或缺乏對於政策的想像。

在臺灣的案例中，探究民間組織的限制主要與外交政策本身的屬性與缺乏政府支持有關。由於外交政策與國家主權高度相關，與多數非政府組織關注的內政問題不同，其涉及到官方互動、對外行動、外交方向等，民間組織難以透過倡議行動進行改變，尤其在國家尚未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前，也缺乏一具體政策內容或行動進行檢視或回饋，瑞典與加拿大亦是在國家提出政策後，民間組織才能夠針對政策給予回饋與意見，進而影響政府後續的對外行動計畫；而臺灣的案例中，起初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受到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支持，因此有了初步的討論與專題介紹，也同時於 2020 年產出相關的文章與倡議，但在次長調任之後，也未見討論與研擬後的後續行動，顯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初始階段缺乏政府支持之後，公民社會的關注也難以引起廣泛回應。

## 肆、國際比較

為了瞭解各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形成與挑戰上的經驗差異，本文採用外交政策比較研究方法，以各項因素對比分析，來說明行動者層次的關鍵影響，同時指出各國在發展上的異同。Rosenau (1971) 的文獻說明了比較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外交政策研究中，個案的應用研究或許能為即時性的問題尋得答案，但長期而言，比較研究方法能發現不同國家為適應環境變化時，所採取外交政策的行為模式，因此若探討政策的發展或檢視國家針對內外環境變遷形塑的對外行為，宜採用比較研究方法為宜。

### 一、行動者層次

#### (一) 國家領導人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國家領導人的個人生平歷程與價值觀、對性別平等議題的重視面向以及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道來進行比較，歸納成表 4-4：

表 4-4、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國家領導人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國家領導人	洛夫文	杜魯道	蔡英文
個人生平歷程與價值觀	於工會與社會民主工人黨的經驗中，意識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與其經濟效益。	於自由黨的經驗中，發展重視多元性的價值觀。	外交主軸為「踏實外交、互惠互助」。
對性別平等議題的重視面向	男性作為女性主義者以及推動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平權的實踐對所有人都有助益，倡議中著重對勞動參與、經濟利益、發揮人口潛能。	以女性主義者的驕傲身分認同推動多邊主義的參與，性別平等倡議著重經濟賦權的實踐，在此身分認同的作用下，強化個人正面形象的維持。	著重於經濟發展及國際空間的拓展，關注女性自覺與打破框架，但未闡述性別平等政策的目的。
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道	未提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圍繞個人的平權倡議、瑞典的平權發展、女性主義政府的領導，以此促進大眾或他國對性別平等的重視。	政策目標為消除貧困、經濟賦權、繁榮社會，而性別平等、女性賦權為加拿大所有國際援助的重點與工作方法。	未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但注重國際空間拓展、積極與他國在性別平等上的合作，體現平權外交政策的特質。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表 4-4 呈現出三國的國家領導人皆重視性別平等中的經濟賦權與效果，並指出政策應促進勞動環境改善、分擔照顧責任、創業補助等面向，可能原因乃藉由經濟論述更易使閱聽人或潛在合作對象理解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也以創造更龐大、更廣泛人群受惠的方式進行倡議，避免政策過度傾斜女性權益或女性解放而導致面臨社會爭議與反對。除此之外，瑞典與加拿大的國家領導人皆以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來進行議題推動，期許更多人能加入平權行列，以此削減社會對於支持女權的反對力道，其中杜魯道更以「驕傲」一詞來形容，強化堅定的立場並型塑積極開明的形象，提高了在國內與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在這比較中也發現瑞典與加拿大的國家領導人對於政策的作用力不同。洛夫文對於經濟賦權的高度重視並未完全反映於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重點，如瑞典於 2014 年提出的政策文件與 2018 年提出的政策手冊，目標指向性別平等與國際承諾 (Thomson, 2020b)；反之杜魯道於演講與聲明中展現對於經濟賦權與削減貧困的重視，則符合 Thomson (2020b) 研究中認為該國政策與經濟利益的高度連結。此顯示杜魯道在加拿大政策的影響力道比洛夫文之於瑞典來得更為強大與明顯，也體現杜魯道在各聲明與演講中持續宣傳該國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時，重申該政策的重點與內容乃經濟賦權與減貧。

而臺灣在比較結果中可以發現，蔡英文對於女性主義與性別平等的關注著重在經濟賦權，同時也曾述及打破框架與女性自覺的重要性，但未闡明性別平等政策的目標與實踐主軸。但其在演講中體現的拓展國際空間特質，具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所注重的價值，乃在國際環境中促進女性權益發展、矯正父權體制的迫害等，在此經驗基礎上，若蔡英文對於平權價值有更進一步的定義、政策整合與領導，將有助於型塑與推動具有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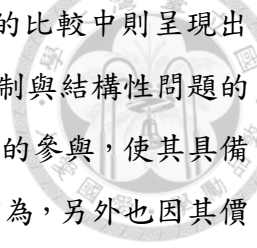
## (二) 外交部長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外交部長的個人生平歷程與價值觀、對性別平等議題的重視面向以及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道來進行比較，歸納成表 4-5：

表 4-5、瑞典、加拿大與臺灣外交部長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外交部長	瓦爾斯特倫	方慧蘭	吳釗燮
個人生平歷程與價值觀	曾於女權倡議單位任職，理解社會結構對女性的迫害，著重代表性、資源分配、基本權利，相信女權就是人權，而性別平等是本世紀最重要的未竟事業之一。	曾監督自由貿易的談判，被形容為「全球民主、人權和多邊主義的主要倡導者」。	推動踏實外交、互惠互助、臺灣模式的國際合作發展，捍衛國家尊嚴與守護自由民主的共享價值，任內透過女力外交專案進行社會倡議或國際發聲。
對性別平等議題的重視面向	將性別平等的重要性連結到可持續發展，特別重視性暴力與和平安全議題。認為女性受到的宰制源於結構性的社會體制，需從制度方面進行改革。	強調透過實際行動來促進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從既有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延伸關懷面向，未侷限於特定領域。	雖強調臺灣在國際社會性別平等的參與及經驗，但未對性別平等或女性主義的有明確的定義或是關注內容。
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力道	政策目標為實現性別平等與女性人權，亦是民主、法治、可持續和平與安全的先決條件，強調在國際條約的規範下展開工作，呼籲全球一同參與性別平等事務，發揮瑞典在國際事務的作用力。	政策目標為創造更安全、繁榮與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具體手段乃透過性別平等來實踐，不僅是正義問題，也是經濟問題，將政策延伸至不同的具體措施與介紹。	未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對於外交中的性別平等工作亦缺乏關注或是想像，只停留在表揚、宣傳臺灣性別平等發展的層次，著重於辦理講座、論壇或研討會。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相較於國家領導人皆關注經濟賦權的相似性，在外交部長的比較中則呈現出相當不同的結果。瓦爾斯特倫在各層面中，皆展現出對於父權體制與結構性問題的理解，關注更廣泛的領域與實踐，此源於其生平發展與女權組織的參與，使其具備足夠的知識與經驗，於外交政策的形成中更實踐具體與全面的作為，另外也因其價值觀相當重視女權，也提升性別平等的重要性，將其視為一項本身應實踐的政策目標；方慧蘭則缺乏具體對平權的系統性理解，雖然在各演講與聲明中持續透過具體行動說明該國政策內容與方向，但未言明其個人價值觀或對性別議題的定義，如問題根源或結構壓迫，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雖然延伸了對於政策的理解，展現對更廣泛領域的議題關懷，但也同時重申性別平等為實踐削減貧困與經濟賦權的手段，呈現出其無法主導外交政策由杜魯道設定好的目標與側重面向；臺灣的案例中，吳釗燮可能受限於國際困境與外交部長的官方身分下，過往行動僅能以辦理講座與研討會為主，以此宣揚臺灣平權發展成果與經驗交流，而女力外交專案也未能透過制度化的方式，形成具體與長遠的政策機制、目標方向、穩定的規劃或運作等。

比較分析中呈現出瓦爾斯特倫對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領導作用，反映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重點，除了重視性別平等與國際承諾外，更在2018年的政策手冊內文中強化了性暴力、安全、和平等面向的關懷。在加拿大的討論中，儘管方慧蘭於外交部長的職權下關注更廣泛領域的平等議題，但仍無法跳脫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對經濟賦權傾斜的目標設定，顯見瓦爾斯特倫相較方慧蘭對於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有更高的影響力。而吳釗燮在比較分析中，突顯臺灣外交部長缺乏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重要性的關注，儘管於各場合或聲明中分享我國在國際社會性別平等的參與及經驗，但缺乏對於平權或女性主義的定義，或外交行動停留在宣揚成果及分享經驗的講座會談，無法有效型塑與促進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進而以此在國際社會實踐臺灣的平權能量與對外行動，然而此部分也可能受到一中原則與國際困境的影響，導致外交部長難以透過官方身分與他國建立制度化的性別平等互動模式，儘管有意藉由女力外交專案與非政府組織積極參與國際性別平等事務，但在缺乏官方與正式途徑的互動下，專案內容僅能以零星活動式的方式進行，無法形塑具體的政策內容與制度。



### (三) 政黨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政黨價值、性別平等政見、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來進行比較。而前兩章的討論可歸納成表 4-6：


表 4-6、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政黨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政黨	社會民主工人黨	綠黨	自由黨	民主進步黨
政黨價值	相信所有人的平等價值和權利，欲建立一個以民主理想及平等權利為基礎的社會。	強調與動物、自然、生態系統、子孫後代與全世界人民的團結，重視環境、平等、永續發展。	維護與促進加拿大社會中每個人的基本自由權及社會各層面的多樣性。	注重主權獨立自主、民主自由的法政秩序，並強調經濟財政、公平開放、創新進步、和平獨立等面向。
性別平等政見	女性主義政黨，女性和男性在生活的所有領域都必須擁有相同的機會和權利。	女性主義政黨，主張公民免受社會結構的限制而阻礙其想要的生活。	多數政策透過經濟賦權的方式來關注性別平等，強調多樣性的實踐。	黨章侷限勞動參與或經濟平等，另設立性別平等事務部，推動平權議題的關注。
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瑞典必須執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強化女性的權利、代表性及資源。且平等本身就是一個目標，也是實現和平、安全和可持續發展的條件。	以外交政策強化平等、對女性權利的尊重、讓更多的女性參與決策，亦關注政策中的氣候正義，讓更多國家承擔永續發展的責任。	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可以透過經濟來改善當地女性困境，強調以「為每個人創造經濟成長的承諾」為原則來促進人權發展。	在外交行動中關注民主、人權價值的推動，未提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表 4-6 呈現出各國政黨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皆缺乏關鍵影響力道，雖然在瑞典社會民主工人黨的案例中，許多層面的關注皆反映了該國政策側重面向，但此部分應由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進行主導，規畫了政策目標與內容重視，也體現出綠黨對環境的重要性並未反映在 2014 年提出的政策內文中 (CONCORD Sverige, 2016, 2017, 2020)。而加拿大自由黨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論述更少，多數關注了內政中性別平等的經濟婦權，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有關的行動，僅呈現於兩政策章節中對經濟賦權與人道援助的重視；臺灣民進黨則未提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於黨章、前途決議文等規範文件中，亦未針對性別平等進行系統性論述或是詳細的政見，僅表示注重女性職場安全與發展。

在各國政黨比較下，可以發現皆由政黨價值觀來關注各國外交政策的推動，但



對政策的重視都不及該國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體現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領導人之間的重要連結。瑞典兩黨相較加拿大自由黨或臺灣民進黨更具備與強調平等的價值觀，且瑞典兩黨認為自由價值需藉由強化平等來加以實踐，才能建立一個沒有歧視的社會，免於受到社會結構的宰制，而綠黨更在此基礎上，拓展關懷至環境自然的永續發展；此呈現出自由黨在意識形態的光譜上趨近中間路線，重視基本自由權利及社會多樣性，施政兼顧經濟與社會正義；臺灣民進黨則在主權爭議中，強調獨立自主的定位，而意識形態光譜上的論述也趨近中間路線，關懷了自由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由此價值觀出發，也連帶影響各國政黨在性別平等相關的政見與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瑞典兩黨皆指出從女性主義的觀點來分析每個政策，認同性別不平等為結構性問題，應透過矯正、補償、資源重分配等措施來加以改善；加拿大自由黨則說明女性在不同身分之下於加拿大社會面臨的處境，並於政策中說明透過經濟賦權的方式來加以改善；臺灣民進黨則著重在女性勞動環境改善的論述。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論述面向中，瑞典兩黨相當支持該國外交政策發展，綠黨更延伸議題，關注了女性在氣候不正義的弱勢地位；加拿大自由黨在官方網站呈現的基本價值觀，與同黨籍的杜魯道完全一致，即相當重視加拿大的多元性，並透過經濟力量的關懷，來論述性別平等的重要性，但官方文件體現的重視程度與討論面向不如杜魯道或方慧蘭，分析自由黨對於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影響力道較小，多數政策設計、內容計畫、目標設定等，由杜魯道主導居多；臺灣民進黨則呈現出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缺乏想像與關注，儘管注重外交行動對於人權與民主的促進，但性別議題無法成為主要目標來推動發展，亦缺乏具體的行動或政策。

在此比較中呈現出瑞典與加拿大兩國政黨都在官方網站中書寫相關政策，但臺灣政黨卻較未注重此面向。推測此差異可能源於兩國憲政制度上的不同，由於瑞典與加拿大皆屬內閣制國家，總理源於國會多數黨或組成的聯盟，因此國家領導人在政策上與政黨有高度的契合，形成「黨政合一」的樣態，在政黨官方網站上呈現出來的政策內容也會與國家領導人相近；而臺灣採用的是半總統制中的「總統一議會」制，運作上較偏向總統制，且國家領導人由全民直選產生，並非源於國會多數黨，因此在施政上可能會與多數黨有相異之處，形成「黨政分離」的樣態，也促使國家領導人在國會受到更強的監督力量（廖達琪、陳月卿、李承訓，2013）。在此

憲政體制差異之下，臺灣因國家領導人或行政部門的具體政策較容易受到立法部門（政黨）的監督，使得民進黨於官方網站上較未出現整黨統一的具體政策內容，多為政黨意識形態或基本規範論述。



## 二、制度層次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援外組織的運作模式、執行政策的目標、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係三面向來進行比較。而前兩章的討論可歸納成表 4-7：

表 4-7、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援外組織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援外組織	SIDA	GAC	國合會
運作模式	隸屬外交部，透過政府與各單位的合作，對外提供發展合作與人道主義援助，並依循國際承諾執行政策。	加拿大合作發展署於 2015 年併至 GAC 中，透過與合作夥伴建立關係，擴大與強化國際援助範圍及效能。	隸屬外交部的財團法人組織，負責執行政府開發援助與其他政府委辦之援外計畫的專責單位。
執行政策的目標	致力於減少各地的貧窮與壓迫、關注可持續發展，促進各國的安全、民主與和平，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指導下拓展重視面向，認可「性別平等本身是目的，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以消除全球貧困與促進更加和平、繁榮和包容的世界為目標，幫助最貧窮和最脆弱的人或國家，支持全球和平與穩定，適時提供基於需求的人道主義援助。	核心價值為「進步、發展、關懷」，以此與合作夥伴整合經驗、知識、技能或資源，創造平等、繁榮的永續未來。
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係	原於性別主流化的發展下，即重視性別觀點，實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提升了以性別平等為主的業務比例、更新並強化性別主流化的方法，從而使瑞典的外交政策組合採取相關作為。	在原國際援助優先事項，便在所有行動中促進性別平等、支持性別主流化的實踐；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實施後，加強女性賦權的推動，擴大援助的範圍與效能，並設立評估標準持續監督政策。	援外行動中雖有以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為目標的相關計畫，但限縮於經濟層面或與對友邦國家的行動中，未能深刻理解到性別平等價值與人類永續發展之間的關聯。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在表 4-7 的援外組織比較與分析中，瑞典與加拿大皆受到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而拓展援外行動的關懷項目，但在加拿大的案例中，外交政策目標也受到援外組織長期以來設定的經濟減貧面向所影響，而使政策內文集中關注相關事務。臺灣

案例則呈現出國家援外組織缺乏對於經濟賦權以外的性平價值實踐。

三國的援外組織在運作模式上皆強調與各單位合作，而儘管臺灣國合會屬於財團法人機構，但仍負責辦理官方援助計畫。三國在後冷戰時期對外援助思潮的影響下，強調發展合作關係的建立，提升工作穩定性，並以合作與和平的觀點，促進可持續的和平、安全與繁榮發展 (Blair, 1998)，因此三國皆表示，只要是能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行為者，都是該國援外行動的合作對象，包含國家政府、多邊組織、公民社會、私部門、財團法人、社會企業、地方社群組織等。

而在對外援助的目標中，瑞典受到了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將性別平等視為目標，提升其重要性。除此之外，三國亦皆強調創造平等、繁榮、可持續的發展，但瑞典的案例更說明性別平等本身亦是個目的，相較 GAC 僅將其視為可持續發展與減貧的手段、國合會只說明創造平等、繁榮的未來，瑞典更體現政策運作對於制度組織的更新與變化。

不同時期的援外組織比較，也顯現了加拿大長期將可持續發展與減貧視為最重要的目標，並影響了杜魯道對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目標設定，體現了制度對於外交政策的影響力。瑞典與加拿大援外組織在既有國際承諾框架與性別主流化中，已相當重視性別平等發展，而瑞典在實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後，SIDA 提升了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視為援外行動的目標；加拿大在政策實施後則沒有變化，皆將目標設定為經濟賦權與減貧，但在杜魯道政府的帶領下，也促進性別平等的發展與正向改變，如將過往的「男女平等」以「性別平等」的論述取代，關注到更廣泛與交織性的平等發展問題。在臺灣的案例中，可能因國際困境與難以發展與友邦以外國家的合作關係，使得國合會援外行動未關注經濟層面以外的性別平等實踐，在各項行動計劃的觀察中，也發現對外行動未將性別平等視為優先的目標、性別觀點未貫徹到援外組織的所有計畫，也因此較瑞典與加拿大缺乏相關經驗，提升實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成本，無法藉由長期的國際行動經驗來發展政策雛型。

而臺灣與兩國的比較差異中，可能因為臺灣的援外對象多為邦交國家，以經濟援助的方式不僅較能看到成果，經濟援助亦為各友邦國家較迫切的需求面向，導致以女性賦權或性別平等為主要目標的計畫並非第一優先要務，也影響相關行動的資源挹注。



### 三、公民社會層次

依前兩章與本章的討論與分析，本節將就瑞典、加拿大與臺灣民間組織的意見反應與政府回應兩面向進行比較。而前兩章的討論可歸納成表 4-8：

表 4-8、瑞典、加拿大、臺灣民間組織反應比較

國家	瑞典	加拿大	臺灣
民間組織	CONCORD Sverige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工作小組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彩虹平權大平台
反應與相關意見	肯定政策中發展合作的性別平等、經濟賦權、和平與安全政策、性暴力、性與生殖健康權利等議題，亦指出農業援助、非正規經濟、國際武器貿易、移民與難民政策、環境與氣候政策等方面中需補充改善。	小組指出政策中不足之處，主要分為裁軍與非軍事化、經濟正義、性與生殖健康權利、更高的整合與連貫性等四面向，同時強調 SOGIESC 的交織性與重視結構性的問題。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主張發展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藉此強化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與資源共享，提升國家正面形象與監督政府性別平等發展；彩虹平權大平台則認同臺灣發展政策的潛力，但更須注重國內的性別平等實踐。
政府針對意見的回應	政府於 2018 年的外交政策手冊與 2020 年的行動計劃中，分別針對農業援助、國際武器、貿易、難民援助與氣候政策給予回應，強調各領域的性別主流化。而農業援助、難民援助或氣候政策中，民間組織建議未獲全面的回應。	政府僅針對裁軍與非軍事化進行回應，透過 2017 至 2022 的國家行動計畫，表示將與其餘部門合作，實施針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控制，將性別觀點與性別影響評估應用於《減少武器計畫》或多邊參與的裁軍協商中。	臺灣無論官方或是民間社會對此議題陌生，民間社會缺乏討論、政府亦未針對此文章進行回應。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與繪製)

經由表 4-8 的比較，雖然在瑞典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之前，公民社會未針對此議題進行討論，但在瑞典政府提出後，民間組織給予的建議獲得政府修正與回應，印證民間組織的關注確實影響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施政面向，也因為組織關注範圍更為廣泛，促進外交政策涵蓋更多領域。但在加拿大的案例中，小組意見回饋僅有裁軍與非軍事化的問題獲得政府回應，尤其經濟正義論述指向的政策目標設計，未得到政府的回應。而在臺灣的案例中，民間社會僅有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與彩虹平權大平台進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討論，且內容僅論述了瑞典與加拿大政策架構，並呼籲臺灣重視國內性別平等與發展自身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其餘具體發展、注重面向、側重重點、臺灣風格或品牌等方面，則未有明確的概念與


討論，顯示了民間社會對此議題缺乏想像，也無法回應到政府層次，促進國家對此議題的關注。

臺灣與瑞典、加拿大兩國在此比較中，呈現出缺乏社會討論的樣貌，此原因可能有以下三點，第一即為臺灣本身並無具體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內容，難以進行回饋與建議，且瑞典與加拿大兩國亦是在國家政府提出政策之後，民間組織才形塑聯盟予以回應。第二，外交政策領域與民間組織長期關注之內政性別平等發展不同，外交領域不僅牽涉到國家主權的展現與國際現實等環境因素，也與執政者的方針與目標有關，難以透過倡議行動引起民眾或是國家的廣泛關注。第三，臺灣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本源於時任外交部政務次長的支持，也因此才委由婦權會進行相關研究，在次長調任、缺乏持續支持與關注之下，就難以延續既有的關注與討論，形塑具體的政策內容與方向。

#### 四、小結

經由比較研究分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內政治影響因素中，行動者層次的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具有關鍵影響角色。瑞典案例的瓦爾斯特倫因個人價值觀、過往經驗與對外交政策的主導職權，促使其能夠將自身關注領域置放於政策內文加以實踐；加拿大案例的杜魯道則因個人對政策的高度興趣與強化正面形象的動機，於加拿大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強調性別平等對經濟發展的正向影響，儘管方慧蘭在不同場合的演講或聲明中，欲透過個人外交職權或是對外交政策理解的方式，來延伸政策對不同領域的關懷，然最終仍未影響該國政策目標的設定與關注面向。而洛夫文在本文擷取的演講與聲明中，更未提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且對於性別平等的關注也集中在經濟領域，這些表態皆與學者分析瑞典外交政策的特質不同，顯示了洛夫文亦未主導該國政策的制定與規劃。

除此之外，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與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回應也不同程度的影響瑞典與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側重面向。加拿大的案例中，兩任總理時其的援外發展行動目標皆指向了經濟賦權與減貧，但瑞典案例卻呈現出援外組織受政策影響，提升對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視為一項須被實踐的政策目標；而在公民社會層次的分析裡，瑞典政府在民間社會的建議下進行相較加拿大更大程度地政策修正。



而兩國皆能夠順利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也源於國家長期的性別平等發展，在平權的環境基礎下，減輕政策執行的成本，並透過該國人權關懷的外交經驗，來強化政策的推動。但政策形成、目標設定或是關注面向仍由該國外交政策主導者來進行，也體現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政策領導人之間的重要連結。

在臺灣的案例與比較中，儘管於性別平等發展上處於亞洲領先的角色，並持續透過與非政府組織協力方式參與相關活動、拓展國際空間、持續進行倡議，卻仍缺乏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主要原因為缺乏政策領導人、制度層次缺乏性平觀點的援外行動、公民社會缺乏相關討論。在本文探索的資料中，無論是國家領導人蔡英文或是外交部長吳釗燮，自上任以來對於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概念缺乏詳細說明與價值論述，兩人在公開場合的演講與聲明亦多著重宣傳臺灣性別平等發展，較少闡明外交行動如何促進國際的性別平等實踐。不過兩人也持續在演講、聲明或外交政策主軸下，強化臺灣的外交行動、拓展國際空間、加強與他國的合作或連結，顯示出兩人互助互利的國際主義傾向。學者研究表明，性別平等價值與一個國家的國際聲望有關 (Bush & Zettrberg, 2021)，在臺灣性別平等機制設立與國內性別平等高度發展之下，如果能將性別平等價值融入至外交政策中，推動具有臺灣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有相當機會可以拓展臺灣國際空間、形塑正面的國際形象、強化與他國之間的連結，同時也能促進國際性別平等發展，邁向更為和平的全球環境，顯示出於臺灣政治環境而言，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有強大的正面效益。因此若其中一人能成為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主導政策的推動、目標設定、關懷面向、執行方式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是相當適合臺灣外交的發展。

而制度層次雖然並非影響一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推動的關鍵，但於援外行動中缺乏相關經驗的培養與政策範例，將增加政策領導人推動之成本，或是僅能在既有的行動中制定相關計畫，導致無法擴展到更廣泛領域的關懷，因此在援外組織執行的政策與目標中若能關懷至更多與性別平等或女性賦權相關的議題，便可以促進日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在設定時關注的領域與方向。

瑞典案例顯示民間組織的回饋也可以促進政府修正該國政策內容，而在臺灣婦女運動發展中，婦女團體地倡議行動也促使臺灣政策的改進與推陳出新，如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家庭暴力防治法、性別教育平等法等，顯示出民間社會也能有一定程度對國家的性別平等政策產生影響。但民間組織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討論

非常陌生，因此為了促進國家政府對此問題的重視，本文認為可以強化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於各倡議組織的關注，透過陳情、投稿或社群媒體宣傳等方式，並以臺灣性別平等發展、拓展國際空間、建立國際正面形象、促進國際性別平等發展等為目標，提升臺灣社會對此議題的重視，並期許在民間社會的討論之下，回饋給政府以推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動。

總體而言，由於臺灣性別平等的卓越發展以及國際空間拓展的需求，相當適合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但在缺乏政策關鍵領導人、缺乏專業知識與關懷的援外組織、缺乏民間社會的倡議討論之下，會增加推動政策的成本與困難。也因此本文欲藉此機會，分析改善的面向，透過倡議行動來提升臺灣社會對此政策的關注度，期能強化社會的重視，形塑屬於臺灣風格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 第五章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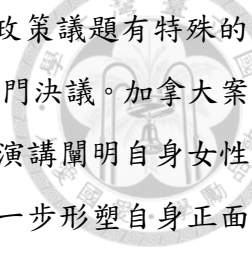
經由本文三個章節的分析與論述，探討了瑞典與加拿大國內政治因素對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形成的經驗，同時分析臺灣國內政治三層次的因素，藉由國際比較發掘各國之間的差異以及於推行於臺灣的挑戰，以此回應本文三個研究問題與理論對話。希望藉由本文的書寫與議題關注，得以促進臺灣性別平等的倡議與推動，促進公民社會對於外交政策的多元想像，於國內、國際社會透過實際行動促進平權發展與女性賦權。

### 壹、研究結果

#### 一、領導人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受到該國政策領導人的高度影響，成為主要的國內政治影響因素。瑞典與加拿大的研究案例中，皆可發現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主導了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推動與側重面向、目標設定，不過兩國政策領導人在職位上有所不同，受到了該領導人的生平經驗、價值觀所影響，瑞典案例中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為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鍵領導，透過個人參與性別平等事務的經驗，培養出對於平權廣泛的關懷，以及對於女性、和平與安全的重視，使得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將性別平等視為一重要的政策目標，同時也將性暴力等議題納入到政策中，呈現出相較過往對性別平等與女性安全更高度的重視。而加拿大案例中的國家領導人—總理杜魯道則為該國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關鍵領導，在許多演講與聲明中持續強調驕傲的女性主義者身分認同與性別平等對經濟賦權的重要影響，因而在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中強調在經濟面向的論述，包含減貧、女性企業、女性勞動參與、女性職場改善等，同時將政策目標置放於經濟賦權，性別平等成為實踐目標的手段，而其積極透過政策推動與身分論述，來強化自身正面與積極的形象，彰顯了於該國政策領導的影響力。

Hermann (2001) 指出國家領導人僅會在特殊狀況下親自參與外交政策，如有高度興趣、國家遭逢外交危機而衝擊國家利益或引發人民關注、國家領導人必須親



自參與和外國元首之間的高峰會、國家領導人本身對某項外交政策議題有特殊的利益等，否則在多數情況下，外交政策將交由外交部長或相關部門決議。加拿大案例中，杜魯道在 2017 年推動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前，已透過演講闡明自身女性主義者的身分認同，透過政策的發布與制定可以強化此角色，進一步形塑自身正面積極的政治形象，提升自身於國際或國內事務的影響力，也顯示出其對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高度興趣和參與力道；相反地，瑞典案例中洛夫文本身於各演講或聲明中即較少提及性別平等的推動，儘管曾表明自身是女性主義者、推動女性主義政府、關懷性別平等議題，但演講與聲明集中於經濟面向的關懷，亦鮮少述及外交政策，缺乏對外交事務參與的興趣，使得相關決策與內容，未能反映洛夫文的經濟重視，多交由外交部長瓦爾斯特倫主導，使其成為該政策的關鍵領導人，發揮經驗、實踐其對於平權的關懷。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制定及產生與政策領導人高度相關，不僅與本文假設相符，也可由學者研究解釋，由於政策與領導連結過於緊密，在未體制化的情況下，政策可能在政府更迭後難以延續（K. Aggestam & True, 2020）。瑞典案例便呈現此現象，2022 年 9 月的瑞典國會選舉後，由右翼聯盟取得較多席次，同年 10 月瑞典保守派領袖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在國會當選總理，該內閣新任外交部長比爾史特龍（Tobias Billstrom）上任後便宣布終止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體現了 K. Aggestam 與 True（2020）的研究發現，亦證實了本文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高度個人取向分析，關鍵領導人主導了政策推動與形成，但尚未真的成為任何一個國家的政策傳統。

## 二、國內政治因素的影響

除了行動者層次的關鍵影響外，本文在比較兩國國內政治發展因素中，也發現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層次亦會對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且在加拿大與瑞典中有不同的影響力道。

國家性別平等發展趨勢與脈絡可以作為該國提出相關政策的經驗基礎，政府過往推動性別平等作為、成立相關組織、提出相關政策、參與性別主流化的經驗等，皆能成為未來進行相關政策規畫時的依據，且當國內民意對於性別平等高度支持時，具有平權色彩的外交政策便能更順利、減少阻礙地推動。而加拿大與瑞典在過

往高度性別平等發展之下，輔以相關經驗，即可以順利地推出名為「女性主義」的外交政策，此不僅象徵政府試圖破解社會對於女性主義一詞的疑慮，更希望以此表示比過往政策更為性別平等與變革性的訴求，也呈現國家女性主義的精神與運作。

而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與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組織聯盟反應也對兩國外交政策的側重面向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然此部分於瑞典與加拿大呈現相當不同的面貌。加拿大的案例中，援外組織過往的關注面向、政策內容或目標設定，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幾乎一致，形同承接了過往援外行動的側重面向，並沒有在女性主義立場的加持之下，以更廣泛領域的關懷或提升性別平等重要性來進行外交政策論述；不過在瑞典的案例中，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影響之下，使得援外組織在關懷面向與具體措施中，都拓展至更廣泛的領域與實踐，並透過不同的外交行動組合，實現不同面向的性別平等。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組織反應因素中，瑞典案例呈現雖然在 2014 年之前，民間社會並未針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倡議，然而從 2016 至 2020 年，CONCORD Sverige 針對外交政策的經濟、農業援助、性暴力、氣候政策、難民等面向進行回饋與建議，也促使政府於 2018 年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手冊與相關行動計畫，進一步回應了民間組織的倡議內容，以尋求在具體施政中可以有更廣泛的關注；而加拿大的案例中，儘管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小組針對該國裁軍、非軍事化、經濟正義、整合性等面向進行回饋，但政府仍缺乏對於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修正與回應，僅在行動計畫中提及裁軍規劃。

整體而言，制度層次的援外組織、公民社會層次的民間組織都一定程度的影響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提出與目標設定。然而當一國政府缺乏政策的關鍵領導人主導該外交政策的推動、制定與實施，儘管這些上述因素提供推動政策相當適應的發展基礎，也難以預見該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出現，如在其餘性別平等高度發展的北歐國家，當行動者層次的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沒有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欲求或行動，國家也難以形塑該政策。Skjelsbæk 與 Torunn (2020) 的訪談研究中，指出了挪威外交政策、性別平等與福利政策長期受社會共識所推動，其中性別平等被認為是挪威社會的核心價值觀，而有利於性別平等的規範也逐漸成為挪威外交政策的顯著特徵，但在與參與和平調解和促進工作的挪威外交官訪談研究結果中，該國似乎仍不願將其政策定義為「女性主義」，因其可能對國內和外交政

策產生無法預期的衝擊或影響<sup>29</sup>。此顯現出在缺乏政策領導人之下，儘管其餘的國內政治因素具有良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基礎，也可能使該國無法成功推動此政策。



### 三、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國家女性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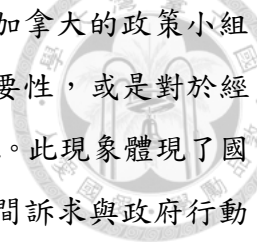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由政府主導平權的發展與推動，正體現了國家女性主義理論指出由上而下的國家力量，尤其本文在分析中闡述了國家領導人的關鍵影響與重要性，不僅顯示此類型的外交政策與行動者層次間的強大連結，更顯示其相當仰賴國家政府的領導，可以分以下兩個層面探討與說明。

第一個層面指涉以國家的力量推動性別平等事務，瑞典與加拿大的案例顯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推動之前公民社會缺乏相關討論，最後由政府主導政策的形成與施行，並在日後持續藉由行動計劃來運作政策關注重點，在瑞典的案例中，公民社會的討論與建議，也在日後受到政府的重視，進而修正與補充政策內容，更顯示出政府透過相關作為制度化女權組織與公民團體的倡議內容。第二個層面指涉女性主義者在擁有實權的制度位置上擔任行政或官僚人員，在瑞典與加拿大的案例中，無論是國家領導人的洛夫文、杜魯道或是外交部長的瓦爾斯特倫、方慧蘭，都曾經於公開演講或是聲明中表態自身為女性主義者，儘管使用頻率或強調力道有所不同，但都呈現出女性主義者透過擁有實權來實踐對性別平等的關懷，體現出國家女性主義的另一個面貌。本文分析此類型外交政策與行動者層次間的強大連結，導致國家領導人或外交部長在缺乏政策重視之下，難以激發社會的關注，同時也因為外交場域的政策事務相較於內政較不受國內民眾關心，尤其將其連結到「女性主義」易具爭議或較不主流的價值立場後，更可能導致閱聽人對此政策懷疑或是困惑，這也使得此政策相當仰賴政府領導的力量，須由政策領導人堅定立場與論述重要性來進行倡議，以彰顯在國際社會中的政策影響力，並帶動其餘國家或是國內民眾對此議題的關注與了解，期能進一步促進全球廣泛的性別平等發展。

而在公民社會層次的分析中，也印證國家女性主義理論可能的限制，即民間女權運動的訴求或倡議在體制化過程中可能被抹滅，如瑞典或加拿大的案例中，公民

---

<sup>29</sup> 如曾有訪談者指出因挪威的外交政策、性別平等或福利政策等向來以共識為主導，倘若宣布採納女性主義目標，可能破壞挪威國內長期對外交政策的共識傳統 (Skjelsbæk & Torunn, 2020)。



社會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訴求或建議未被完全採納，尤其加拿大的政策小組以更基進的角度論述和平建設過程的陽剛霸權與去軍事化的重要性，或是對於經濟正義的關注及改善，皆未在加拿大後續的行動計劃中獲得回應。此現象體現了國家女性主義指出在倡議內容體制化過程的時候，會盡可能於民間訴求與政府行動中取得平衡或妥協，但也可能削減倡議中部份的訴求與關注面向。不過從另一個方面觀之，或許因外交政策與主權議題高度連結，並與軍事、國防、貿易等領域相互連結，導致民間社會量能在影響施政方向上難度較高，未必是國家女性主義理論的限制，而是外交政策在討論意涵上有其特殊屬性。

#### 四、臺灣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挑戰

本文呈現出臺灣具備足夠的性別平等發展基礎，尤其張婉琪（2020）、陳乃嘉（2020）皆指出臺灣在亞洲平權發展名列前茅的地位下，率先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可以為國家拓展國際空間、強化國際連結、領導區域的平權發展，此也符合當前蔡英文與吳釗燮的踏實外交主軸，強化臺灣在互助合作的良善國家形象與突破一中原則造成的外交限制，張婉琪（2020）的文章更指出可以藉由政策強化跨部門與公私組織合作，共享更多的資源來參與國際性別平等事務。

而在國家平權發展的經驗基礎外，對臺灣的挑戰可從兩個面向論述。第一個乃行動者層次的面向，如何啟發政策領導人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注與重視或許是最重要的課題，尤其國家領導人蔡英文在多個場合關注性別平等並注重女性自覺，每一次的表態都是促進臺灣在平權發展的支持與推動，儘管受限在國際困境與一中原則下，導致相關倡議行動限縮於經濟領域，或是僅能持續地強調國際連結與拓展國際空間，不過也可以發現蔡英文對於性別平等的支持傾向，而現階段缺乏但相當關鍵的便是提升對「女性主義」的認識、宣導，甚至是認同，尤其在許多場合的演講或聲明中，未觀察到蔡英文對「女性主義」的態度，也間接使得國內選民對此概念陌生，甚至可能抱持疑慮或負面感受，若以國家領導人的身分表態對女性主義議題的關注與支持，就有可能促進相關政策的產生，並將既有對平權的關懷轉化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第二個面向則是關注結構性問題，在一中原則與國際困境的阻礙下，臺灣要參與國際事務多半只能透過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形塑的非官方形式，但在資源不穩定、女力外交專案缺乏制度化、相關行動僅如零星活動式的產出，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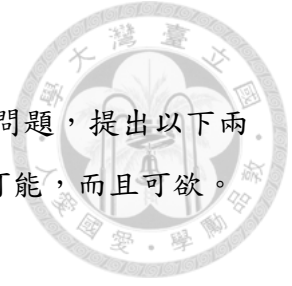
難以形塑成具體政策；而制度層次方面，也受限於國際環境，使得國合會與邦交國或友好國家的互動，僅停留在經濟賦權領域；公民社會層次的討論源於外交部政務次長的支持，在次長調任後也失去能量，導致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討論與關注，使得政策在缺乏政府官員的支持下難以發展成形，這三個面向的關注都指向了臺灣在國際現實的結構中難以透過官方正式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發展合作或人道救援的對外行動，仍需大量依靠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關係進行國際事務參與。

因此在這兩面向的討論下，或許提升公民社會對於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多元想像可以是一條出路，意即不一定要在官方正式的外交模式中形塑外交政策，或許透過穩定資源、公私部門連結的強化、制定目標與內容等將既有的性別平等對外行動制度化，可以成為屬於臺灣品牌特色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但前提仍是需要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重視的政策領導人，所以持續監督行動者也很重要，透過廣泛討論發展在既有結構問題下的途徑，也許就可以提供行動者對政策更具體與清晰的想像，並結合政策制定者個人對性別平等的關注，形成具體內容與目標。

## 貳、研究建議與限制

女性主義理論的觀點分析性別不平等的原因，並透過對理想社會的想像，提出漸進式或革命性變革的方案（顧燕翎，2020）。本文以女性主義的觀點探索國際政治，並藉由國內政治因素分析國家外交政策的形塑成因，透過比較來指出政策發展關鍵因素乃行動者層次的政策領導人，同時也指出臺灣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發展上缺乏對性別議題高度關注的政策領導，而缺乏制度層次的經驗與公民社會層次的倡議，也連帶提升政策發展的成本。

本研究分析瑞典與加拿大的國內政治因素發展，並將臺灣納入進行國際比較，乃是為了聚焦國內層面的影響力，同時以最早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兩個國家作為研究個案，涵蓋更長遠的動態發展與脈絡分析，然此部分也顯示出本研究的限制，如國際政治因素是否會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影響？如何透過國際社會的理論與觀點進行詮釋？抑或將更多國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納入討論，以比較出各國之間的發展異同。而在本文國內政治因素分析時，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層次也僅分別以援外組織與民間組織聯盟作為研究對象，雖已涵蓋本研究關注的平權行動與國內倡議內容，但仍可以拓展研究廣度，觀察更廣泛的研究標的對女性主



義外交政策的影響。

因此本文為展望臺灣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與解決上述問題，提出以下兩點研究建議，期能發揮女性主義的精神，使社會改革不僅變得可能，而且可欲。

### 一、拓展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觀點與國家比較

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研究建議上，本文認為未來研究可以分析與比較更多國家的政策發展成因，並拓展研究角度，納入對於國際政治因素的分析。

自 2014 年至 2022 年 7 月，雖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仍缺乏一致的定義，但表示採用政策的國家持續在增加，除了 2014 年的瑞典與 2017 年的加拿大，法國（2019 年）、墨西哥（2020 年）、西班牙（2021 年）、盧森堡（2021 年）、德國（2021 年）和智利（2022 年）等國都相繼表示將以「女性主義」命名屬於該國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UN Women，2022）。而各國政治脈絡與因素發展皆不同，若能進一步納入更多國家的分析與探討，將更可以解釋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特殊與重要性，並論證在各國發展脈絡裡，行動者層次的政策領導人是否仍扮演關鍵角色，或是在不同國家的發展脈絡下，其他層次是否會更具影響力。

而本文以國內政治的觀點進行分析，比較瑞典、加拿大與臺灣的發展，聚焦國家內部社會的脈絡與探討，然而影響國家外交政策的因素相當廣泛，除了國內觀點以外，國際觀點諸如地緣政治、權力平衡理論等，都可能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如加拿大發展多邊主義外交政策，便是為了突顯自身與鄰國美國不同的側重面向，而美國如何影響加拿大的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便是一項可以持續深究與分析的問題。

最後，便是在既有的研究框架下拓展研究標的與分析。本文在制度層次以援外組織、公民社會層次以民間組織聯盟為研究標的，雖已盡可能符合各國外交政策的關注方向與納入更廣泛的民意討論，然此並未能完全代表「制度層次」與「公民社會層次」兩面向的全面分析。因此未來在相關研究中，本文建議可以拓展分析廣度，如制度層次可以觀察其餘部門的運作、公民社會層次納入各家民意機構對政策的支持度等，以期能更廣泛地分析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比較各國發展脈絡的異同。

## 二、臺灣社會與政策的發展方向

在臺灣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發展方面，本文認為應持續透過倡議行動，使得民眾關注國家領導人與外交部長的相關政策是否具備女性主義觀點，包含是否使用交織性觀點、性別分析、性別統計、性別影響評估等，行動計畫中是否以性別平等為目標實踐、是否突破過往的經濟賦權而注重其餘面向等。由於現今實施的踏實外交主軸注重拓展國際空間、藉由援外行動促進國際連結，因此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具備良好的適用性，所以未來研究若能更深入且清晰地區分臺灣在外交領域或援外場合中「宣揚性別平等成果」與「實踐性別平等價值」的差別，將能促進我們更深刻地瞭解臺灣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關聯。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Brandal, N., Bratberg, Ø., & Thorsen, D. E. (2021)。北歐不是神話：一套打造永續幸福國度的方法（劉維人譯）。台北市：經濟民主聯合。（原著出版於 2013 年）
- Tickner, J. A., & Sjoberg, L. (2013)。女性主義。載於 Dunne, Tim., Kurki, M., & Smith, S. (主編)，國際關係理論：學科的面貌（葉宗顯譯）。新北市：韋伯文化國際。（原著出版於 2010 年）。
- Yin, R. K. (2001)。個案研究法（尚榮安譯）。台北市：弘智文化。（原著出版於 1994 年）。
- 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中華民國委員會（2022 年 3 月 4 日）。外交部攜手婦權會：共同推動性別平等週。2023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s://ctpecc.org.tw/events/386>
- 中華民國立法院（無日期）。本屆立委。2023 年 6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ly.gov.tw/Pages/List.aspx?nodeid=109>
- 中華民國外交部（2019 年 12 月 26 日）。外交部 2019 年年終工作回顧：踏實外交成果豐碩、共享價值捍衛民主自由。2023 年 4 月 9 日，取自：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0672](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0672)
- 中華民國外交部（2020 年 9 月 24 日）。外交部攜手 NGOs 推動女力外交 一蕭美琴大使與美國無任所大使柯莉暢談疫情下的女性領導。2023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8742dce7a2a28761&s=0ac6a522a00389f](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8742dce7a2a28761&s=0ac6a522a00389f)
- 中華民國外交部（2021 年 12 月 22 日）。2021 年外交成果回顧：穩健推動「踏實外交」，有效強化國際社會支持臺灣的力量，提升我國國際形象與能見度。2023 年 4 月 9 日，取自：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7020](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7020)
- 中華民國外交部（2022a 年 3 月 9 日）。台灣性別平等週登場—蔡總統出席「女力之夜」向國際發聲。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8&s=97498](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8&s=97498)

中華民國外交部 (2022b 年 5 月 19 日)。外交部長吳釗燮出席「後疫情時期協助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經濟復甦暨婦女賦權計畫」首場區域論壇「中美洲婦女經濟賦權現況、挑戰及展望」會議開幕典禮。2023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7856](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ms=73&s=97856)

中華民國外交部 (2022c 年 9 月 16 日)。外交部長吳釗燮贈勳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駐臺灣大使哈菁絲，肯定深化兩國邦誼的貢獻。2023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6&sms=74&s=98613](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6&sms=74&s=98613)

中華民國外交部 (2023 年 2 月 14 日)。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貝里斯總理夫人兼婦幼特使羅莎娜。2023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99643](https://www.mofa.gov.tw/News_Content.aspx?n=95&s=99643)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6a 年 10 月 25 日)。總統：新政府秉持「踏實外交、互惠互助」營造互惠雙贏的邦誼。2023 年 4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825>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6b 年 11 月 4 日)。總統運用臺灣經驗為下階段的世界婦女運動做出貢獻。2023 年 4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0872>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7a 年 3 月 8 日)。總統出席「106 年度國際婦女節」開幕活動。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143?](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143?DetailNo=%E6%80%A7%E5%88%A5%E5%B9%B3%E7%AD%89)

[DetailNo=%E6%80%A7%E5%88%A5%E5%B9%B3%E7%AD%89](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143?DetailNo=%E6%80%A7%E5%88%A5%E5%B9%B3%E7%AD%89)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7b 年 8 月 11 日)。總統出席女權高峰會重申政府促進性別平等的決心。2023 年 4 月 3 日，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1533>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8 年 11 月 8 日)。總統接受「世界女記者暨作家協會」專訪。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3866>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9a 年 3 月 8 日)。總統接見「國際婦產科醫學聯盟人員」。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4131>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9b 年 3 月 26 日)。出席太平洋婦女領袖聯盟會議總統盼攜手展開全面跨國合作更加澈底落實此區域性別平權。2023 年 4 月 2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4210>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9c 年 4 月 16 日)。總統出席「**臺美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婦女賦權場次**」。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4280>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9d 年 11 月 5 日)。落實性別平權總統：**臺灣盼幫助更多婦女及兒童免於暴力威脅享有尊嚴及平等的生活**。2023 年 4 月 2 日，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4997>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1 年 3 月 6 日)。總統為衛福部「**2021 年國際婦女節系列活動-Feel No Fear 無畏的力量勇氣論壇**」錄製致詞影片。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5945>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2a 年 3 月 8 日)。總統為「**淨零臺灣 女力行動**」起跑記者會錄製致詞影片。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586>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2b 年 3 月 8 日)。總統出席「**女力之夜外交酒會**」。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587>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2c 年 3 月 14 日)。出席駐台使節慶祝婦女節午宴總統：**支持「打破偏見」活動共同實現一個沒有歧視的世界**。2023 年 4 月 2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602>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2d 年 4 月 12 日)。視訊接見瑞典國會暨歐洲議會議員聯合訪團總統盼共同持續深化臺灣和瑞典、歐盟的合作交流。2023 年 4 月 1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6661>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2e 年 12 月 9 日)。總統為「**2022 女科技人大會-邁向工作與生活共榮的新職場**」錄製致詞影片。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7176>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3a)。總統與副總統。2023 年 4 月 11 日，取自：

<https://www.president.gov.tw/Page/40>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3b 年 2 月 15 日)。總統出席「**『女力拉美加論壇』開幕典禮**」。2023 年 7 月 6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7316>

中華民國總統府 (2023c 年 3 月 8 日)。慶祝國際婦女節總統：**讓臺灣每一個階段的女性都能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也能為自己的選擇感到驕傲**。2023 年 4 月 1



日，取自：<https://www.president.gov.tw/News/27348>

民主進步黨（2019）。**黨網**。2023年4月11日，取自  
<https://www.dpp.org.tw/upload/download/%E9%BB%A8%E7%B6%B1.pdf>

民進黨性別平等事務部（2023a年2月1日）。**「平等事務部」成立！蛻變，再前進**。2023年4月12日，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550706547090426&set=a.340182881476128>

民進黨性別平等事務部（2023b年2月13日）。**【性別平等與女性權益，不是互斥，而是互相圓滿】**。2023年4月12日，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559397406221340&set=a.340182881476128>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無日期 a）。**部長歡迎詞**。2023年7月6日，取自：<https://taiwanngo.tw/Post/80482>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無日期 b）。**外交部女力外交專案**。2023年7月6日，取自：<https://taiwanngo.tw/Category/2530#>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2018年8月17日）。**外交部舉辦我國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合作經驗首場分享會「女權時代：那些年我們一起推動的女力外交」圓滿落幕**。2023年4月1日，取自：<https://taiwanngo.tw/Post/50425>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2019年11月8日）。**外交部長吳釗燮應邀在臺灣首次主辦的「第四屆世界婦女庇護安置大會」閉幕典禮上致詞**。2023年7月6日，取自：<https://taiwanngo.tw/Post/52186>

外交部非政府組織國際事務會（2020年9月24日）。**外交部攜手 NGOs 推動女力外交 一蕭美琴大使與美國無任所大使柯莉暢談疫情下的女性領導**。2023年4月9日，取自：<https://taiwanngo.tw/Post/53504>

全球合作暨訓練架構（2021年10月27日）。**「邁向平等之路：落實女性公共參與權」線上國際研討會**。2023年7月6日，取自：  
[https://www.gctf.tw/tw/issues\\_detail34\\_0.htm](https://www.gctf.tw/tw/issues_detail34_0.htm)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2）。**2021年性別圖像**。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2023）。**2022年性別圖像**。

成令方（2015年3月6日）。**臺灣性別平等法律帶來的社會改變**。BBC NEWS。



2023 年 4 月 17 日，取自：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3/150306\\_taiwan\\_women](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a/2015/03/150306_taiwan_women)

吳秀貞、蔡昀穎 (2020)。接軌國際邁向性別平等。社區發展季刊，171，13—24。

吳得源 (2005)。加拿大多邊主義外交與治理——持續與轉變。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 (1)，1—29。

吳振達 (2018)。瑞典外交政策與柔性權力的運用。國會季刊，46 (3)，32—54。

吳釗燮 (2018)。迎向挑戰 勇於承擔 —— 臺灣能讓世界不同。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年報：2017 年，4—5。

吳釗燮 (2019)。勇敢自信與世界同行 —— Taiwan Can Help。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年報：2018 年，4—5。

林岱緯 (2019)。憲政本土化與憲政民主發展——加拿大憲法變遷的啟發。臺灣國際研究季刊，15 (3)，83—100。

林宗憲 (2003)。中等國家之國際參與：加拿大外交政策及其對臺灣之啟示。全球政治評論，(4)，117—134。

陳乃嘉 (2020)。想像一個更平等的世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同志觀點。國際性別通訊，(33)，12。

陳瑄毓 (2014)。國內政治對外交政策的影響：以日本領土爭議為例。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碩士論文。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22a 年 3 月 1 日)。願景與目標。2023 年 4 月 14 日，取自：

<https://www.icdf.org.tw/wSite/ct?xItem=304&ctNode=31101&mp=1>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22b 年 3 月 7 日)。中小企業。2023 年 4 月 14 日，取自：


<https://www.icdf.org.tw/wSite/ct?xItem=63033&ctNode=31298&mp=1>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23a 年 4 月 18 日)。認識國合會。2023 年 4 月 30 日，取自：

<https://www.icdf.org.tw/wSite/ct?xItem=2293&ctNode=31098&mp=1>



-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2023b)。國合會 111 年度工作報告。
-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無日期)。優先領域簡介。2023 年 4 月 14 日，取自：<https://www.icdf.org.tw/wSite/lp?ctNode=31497&CtUnit=142&BaseDSD=7&mp=1>
- 張清敏 (2001)。外交政策分析的三個流派。《國際關係理論》，18—23。
- 張琬琪 (2020)。全球性別平等運動新時刻及我國參與策略。《國際性別通訊》，32，6—8。
- 彩虹平權大平台 (無日期)。關於我們。2023 年 5 月 5 日，取自：<https://equallove.tw/about>
-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2022)。112 年度預算。2023 年 4 月 18 日，取自：[https://www.iwomenweb.org.tw/Upload/WebArchive/4284/112%E5%B9%B4%E9%A0%90%E7%AE%97\(%E8%A1%9B%E7%A6%8F%E9%83%A8%E2%86%92%E7%AB%8B%E6%B3%95%E9%99%A2%E5%8D%B0\).pdf](https://www.iwomenweb.org.tw/Upload/WebArchive/4284/112%E5%B9%B4%E9%A0%90%E7%AE%97(%E8%A1%9B%E7%A6%8F%E9%83%A8%E2%86%92%E7%AB%8B%E6%B3%95%E9%99%A2%E5%8D%B0).pdf)
-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 (無日期)。基金會簡介。2023 年 4 月 17 日，取自：<https://www.iwomenweb.org.tw/cp.aspx?n=7DEC7150E6BAD606>
- 黃長玲 (2001)。從婦女保障名額到性別比例原則—兩性共治的理論與實踐—。《問題與研究》，40 (3)，69—82。
- 黃奎博 (2011)。外交與決策分析。載於張亞中、左正東 (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三版，頁 191—216)。新北市：揚智文化。
- 黃梅波、朱丹丹 (2011)。瑞典的對外援助及其管理。《國際經濟合作》，5，57—64。
- 黃淑玲 (2014)。全球典範！？瑞典性別主流化實施模式。《公共治理季刊》，2 (2)，69—82。
- 黃競涓 (2011)。女性主義／國關理論：若即若離抑或各行其道？。載於包宗和 (主編)，《國際政治理論》。臺北市：五南。
- 楊婉瑩 (2004)。婦女權利會到性別平等委員會的轉變：一個國家女性主義的比較觀點分析。《政治科學論文集》，21，117—148。
- 廖達琪、陳月卿、李承訓 (2013)。半總統制下的國會監督—從法制面比較台灣與法國國會的監督能量。《問題與研究》，52 (2)，51—97。

- 
- 蔡英文 (2015)。英派：點亮臺灣的這一哩路。台北市：圓神出版社。
- 蔡明彥 (2013)。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的連動。台北：鼎茂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蔡志恆、方凱弘、黃煥榮 (2007)。先進國家的性別平等法制與推廣策略---以美、英、加、澳四國性別主流化政策為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會晤公共事務系，當代社會與國家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71—217。
- 簡舒培 (2021)。性別比例原則對政黨政治甄補的影響—民進黨中央黨職女性菁英的政治參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劉蕭翔 (2007)。國際政治與國內政治互動之評析。歐洲國際評論，3，107—136。
- 譚偉恩 (2007)。女性主義視野下的國際安全。國際關係學報，23，123—156。
- 鄭欣妮 (2012)。以性別主流化觀點檢視我國援外政策。國立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顏詩怡 (2020)。女性主義是潮牌嗎？淺談瑞典與加拿大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國際性別通訊，33，10—11。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2000 年 10 月 31 日)。第 1325(2000)號決議。2023 年 6 月 10 日，取自：<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0/720/17/PDF/N0072017.pdf?OpenElement>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2008 年 6 月 19 日)。第 1820(2008)號決議。2023 年 7 月 15 日，取自：<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8/391/43/PDF/N0839143.pdf?OpenElement>
-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2016 年 3 月 11 日)。第 2272(2016)號決議。2022 年 10 月 18 日，取自：<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16/069/24/PDF/N1606924.pdf?OpenElement>
- 顧燕翎 (2000)。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臺北市：女書文化。
- 顧燕翎 (2020)。臺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台北市：貓頭鷹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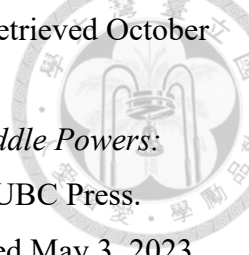


Reference:

- Achilleos-Sarll, C., Haastrup, T., Thomson, J., Faerber, K., Cohn, C., & Kirby, P. (2023).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s) of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5(1), viac068, <https://doi.org/10.1093/isr/viac068>
- Aggestam, K., & Rosamond, A. B. (2016). Swedish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king: Ethics, politics and gender.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30(3): 323-334.
- Aggestam, K., & Rosamond, A. B. (2018). Re-politicising the Gender-Security Nexus: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ERIS – Europea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 30-48. <https://doi.org/10.3224/eris.v5i3.02>
- Aggestam, K., & Rosamond, A.B. (2019).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3.0: Advancing Ethic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Global Politics. *SAI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9(1), 37-48. doi:10.1353/sais.2019.0003.
- Aggestam, K., Rosamond, A. B. & Kronsell, A. (2019). Theorising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3(1), 23-39. <https://doi.org/10.1177/0047117818811892>
- Aggestam, K., & True, J. (2020). Gendering Foreign Policy: A Comparative Framework for Analysi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6(2), 143–162, <https://doi.org/10.1093/fpa/orz026>
- Aggestam, K. & True, J. (2021). Political leadership and gendered multilevel games in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97(2), 385-404. <https://doi.org/10.1093/ia/iaa222>
- Aggestam, L. (2001). An end to neutra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In Niblett, R., & Wallace, W. (Eds.), *Rethinking European Order: West European Responses, 1989-97* (pp. 182-206).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 Aylward, E., & Brown, S. (2020). Sexual orienta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in Canada'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75(3), 313–328. <https://doi.org/10.1177/0020702020953425> .
- Bäck, H., & Björkdahl, A. (2017). Does Female Leadership Matter? An Analysis of Swedish Foreign Ministers and their Parliamentary Speeches, 1955–2016. (pp. 1-32). (STANCE Working Papers Series; Vol. 2017, No. 10).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Lund University.

- 
- Bergman, A. (2007). Co-Constitutio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Welfare Obligations: The Case of Sweden's Social Democratically Inspired Internationalism.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1), 73–99. <https://doi.org/10.1177/0010836707073477>
- Bergqvist, C., Blandy, T. O., & Sainsbury, D. (2007). Swedish State Feminism: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Outshoorn, J., & Kantola, J. (Eds), *Changing State Feminism*.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https://doi.org/10.1057/9780230591424\\_12](https://doi.org/10.1057/9780230591424_12)
- Bjorkdahl, A. (2008). Norm advocacy: A small state strategy to influence the EU.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5(1): 135-154.
- Bjorkdahl, A. (2013). Ideas and Norms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3): 322-337.
- Blair, H. (1998). Civil Society and Building Democracy: Lessons from International Donor Experience. In Bernard, A., Helmich, H., & Lehning, P. (Eds.), *Civil Society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Paris: North-South Centre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Development Centre, OECD, 1998), 65–80.
- Bouka, Y., Hlatky, S. v., Martel, S., Martin-Brûlé, S.-M., Iniesta, M. M. d. A., & Zahar, M.-J. (2021). Is Canada's Foreign Policy Really Feminist? Analysis and Recommendations. *Network for Strategic Analysis*, 1-12.
- Brodie, J. (2008). We are all equal now: Contemporary gender politics in Canada. *Feminist Theory*, 9(2), 145–164. <https://doi.org/10.1177/1464700108090408>
- Brown, S., & Swiss, L. (2018). Canada's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 Game Changer or Fig Leaf. In Graham, K., & Maslove, A. (Eds.). *How Ottawa Spends 2017-2018*: 117-132.
- Bush, S. S., & Zetterberg, P. (2021). Gender Quotas an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5(2): 326-41. doi:10.1111/ajps.12557.
- Canadian Teachers' Federation. (n.d.). *About Us*.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from: <https://www.ctf-fce.ca/who-we-are/about-us/>
- Canadian Voice of Women for Peace. (n.d.). *Recommendations for Canada's New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November 3, 2022, from: [https://live-amnesty.pantheonsite.io/sites/default/files/VOW%20GAC%20FFP%20Review%20Submission\\_Nov%202020.pdf](https://live-amnesty.pantheonsite.io/sites/default/files/VOW%20GAC%20FFP%20Review%20Submission_Nov%202020.pdf)

- 
- Caprioli, M. (2005). Primed for Violence: The Role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Predicting Internal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49(2), 161-178.
- Centre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n.d.).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 CFFP*. Retrieved August 8, 2022, from: <https://centreforfeministforeignpolicy.org/feminist-foreign-policy>
- Coalition for Equitable Land Acquisitions and Development in Africa. (n.d.). *Global Affairs Canada: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Dialogue*. Retrieved November 2, 2022, from: : <https://live-amnesty.pantheonsite.io/sites/default/files/CELADA%20FFP.pdf>
- CONCORD Europe. (n.d.). *About CONCORD*. Retrieved December 19, 2022, from: <https://concordeurope.org/>
- CONCORD Sverige. (2014, December). *BREV TILL UTRIKESMINISTER MARGOT WALLSTRÖM SOM UPPFÖLJNING AV MÖTE OM FEMINISTISK UTRIKESPOLITIK*.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22, from: <https://concord.se/brev-till-utrikesminister-margot-wallstrom-som-uppfoljning-av-mote-om-feministisk-utrikespolitik>
- CONCORD Sverige. (2016). *Hur Feministisk är Sveriges utrikespolitik*. Retrieved September 16, 2022, from: <https://concord.se/wp-content/uploads/2018/05/granskning-fem-utr-pol-2016.pdf>
- CONCORD Sverige. (2017). *Hur Feministisk är Sveriges utrikespolitik*. Retrieved September 16, 2022, from: <https://concord.se/wp-content/uploads/2018/05/hur-fem-ar-sv-utr-pol-2017.pdf>
- CONCORD Sverige. (2018). *CIVLSAMHÄLLET'S DEKLARATION FÖR EN FEMINISTISK UTRIKESPOLITIK*.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22, from: <https://concord.se/wp-content/uploads/2018/05/civsam-utr-pol-2018.pdf>
- CONCORD Sverige. (2020). *FEMINIST POLICIES FOR CLIMATE JUSTICE*. Retrieved September 14, 2022, from: <https://concord.se/wp-content/uploads/2020/06/fem-rapport-2020-final.pdf>
- CONCORD Sverige. (n.d.a). *DET HÄR ÄR VI*. Retrieved October 17, 2022, from: <https://concord.se/det-har-ar-vi>
- CONCORD Sverige. (n.d.b). *JÄMSTÄLLDHET*. Retrieved October 17, 2022, from: <https://concord.se/vara-fragor/jamstallldhet>

- 
- CONCORD Sverige. (n.d.c). *JÄMSTÄLLDHET – SÅ TYCKER VI*. Retrieved October 17, 2022, from: <https://concord.se/vara-fragor/jamstalldhet>
- Cooper, A. F., Richard A. H., & Nossal, K. R. (1993).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Vancouver: UBC Press.
- Criminal Code Help. (n.d.). *Sexual Assault Laws in Canada*. Retrieved May 3, 2023, from: <https://www.criminalcodehelp.ca/offences/sexual-offences/sexual-assault/>
- Davies, S. E., & True, J. (2017). Norm Entrepreneurship in Foreign Policy: William Hague and the Prevention of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3(3), 701–721.
- Demeritt, J. H. R., Nichols, A. D., & Kelly, E. G. (2014). Female Participation and Civil War Relapse. *Civil Wars*, 16(3), 346–368, DOI: 10.1080/13698249.2014.966427
- Donaghy, G. (2003). All god's children: Lloyd Axworthy, human security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1996–2000.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10(2), 39–58, DOI: 10.1080/11926422.2003.9673326
- Elakkary, S., Franke, B., Shokri, D., Hartwig, S., Tsokos, M., & Püschel K. (2014). Honor crimes: review and proposed definition. *Forensic Sci Med Pathol*, 10, 76–82. <https://doi.org/10.1007/s12024-013-9455-1>
- European Agency. (2023, March). *Country information for Sweden - Legislation and policy*. Retrieved May 5, 2022, from: <https://www.european-agency.org/country-information/sweden/legislation-and-policy>
-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0). *CONVERSATIONS ON CANADA'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March 20, 2022, from: <https://live-amnesty.pantheonsite.io/sites/default/files/CSO%20Backgrounder%20Canada%20FFP.pdf>
-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Working Group. (2021, January). *BE BRAVE BE BOLD Recommendations for Canada'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November 2, 2022, from: <https://live-amnesty.pantheonsite.io/sites/default/files/FFP%20Be%20Brave%20Be%20Bold%20EN.pdf>
- Ferguson, K. E. (1984). *The Feminist Case Against Bureaucrac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 Fillion, S. (2018). *As Sweden and Canada Push a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Others Resist the Label*. Pass Blue, 12 February. Retrieved June 15, 2020, from: <http://www.passblue.com/2018/02/12/as-sweden-and-canada-pushtheir-feminist->



- foreign-policy-other-nations-resist-the-label/
- Fish, D. (2014, November). *Justin Trudeau calls for gender and racial diversity on the bench*. Precedent. Retrieved March 4, 2023, from: <https://lawandstyle.ca/culture/circuit-justin-trudeau-calls-gender-racial-diversity-bench/>
- France Diplomacy. (2022, February). *Feminist Diplomacy*. Retrieved 10 June, 2023, from: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french-foreign-policy/feminist-diplomacy/>
- France Diplomacy. (2021, February). *France'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gender equality (2018-2022)*. Retrieved 10 June, 2023, from: <https://www.diplomatie.gouv.fr/en/french-foreign-policy/human-rights/women-s-rights/france-s-international-strategy-for-gender-equality-2018-2022/>
- Freeland, C. (2012). *Plutocrats: the rise of the new global super-rich and the fall of everyone else*.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Freeland, C. (2013, January). *The 99 percent matriarchy*. Reuters. Retrieved March 5, 2023,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reutersmagazine-davos-freeland-idUSBRE90K0HZ20130121>
- Goldmann, K., Berglund, S., & Sjöstedt G. (1986). 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Sweden. *International Affairs*, 63(4), 685–686.
- Goldmann, K. (1991). The Swedish model of security poli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4(3), 122-143, DOI: 10.1080/01402389108424862
- Gourevitch, P. A. (1978).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2(4), 881-912.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2a, August). *CIDA's Policy on Gender Equality*.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228104009/http://www.acdi-cida.gc.ca/acdi-cida/acdi-cida.nsf/eng/EMA-218123616-NN9>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2b, August). *CIDA's Gender Equality Action Plan (2010-2013)*.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0322193345/http://www.acdi-cida.gc.ca/acdi-cida/ACDI-CIDA.nsf/eng/NAD-101311435-KPF#a2>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a, June). *Canada'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 Retrieved June 15, 2020,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policy-132](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policy-132)



politique.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b, June). *Address by Minister Freeland on Canada's foreign policy priorities*.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7/06/address\\_by\\_ministerfreelandoncanadasforeignpolicypriorities.html](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7/06/address_by_ministerfreelandoncanadasforeignpolicypriorities.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c, July). *Statement b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Minister of Public Safety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on World Day Against Trafficking in Persons*.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7/07/statement\\_by\\_ministerofforeignaffairsandministerofpublicsafetyan.html](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7/07/statement_by_ministerofforeignaffairsandministerofpublicsafetyan.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d, June). *Mainstreaming of a Gender Perspective*. Retrieved October 28,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funding-financement/mainstream-integration.aspx?lang=eng&\\_ga=2.50080614.196555518.1667023045-796851661.1666506659](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funding-financement/mainstream-integration.aspx?lang=eng&_ga=2.50080614.196555518.1667023045-796851661.1666506659)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7e, June). *Statement b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nd 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ce on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7/06/statement\\_by\\_ministerofforeignaffairsandministerofnationaldefenc.html](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7/06/statement_by_ministerofforeignaffairsandministerofnationaldefenc.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a, September). *Canada and EU to advance global peace and security at Wome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Retrieved November 2,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9/canada-and-eu-to-advance-global-peace-and-security-at-women-foreign-ministers-meeting.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b, September). *Canada concludes successful Women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9/canada-concludes-successful-women-foreign-ministers-meeting.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c, March). *Canada reaffirms its support for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agenda and hosts panel on Elsie Initiative on Women in Peace Operations*.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3/canada-reaffirms-its-support-for-women-peace-and-security-agenda-and-hosts-panel-on-elsie-initiative-on-women-in-peace-operations.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d, August). *Statement for 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 
- World's Indigenous Peoples*. Retrieved November 2,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8/statement-for-international-day-of-the-worlds-indigenous-peoples.html>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e, August). *Canada commits to further supporting the rights of LGBTQ2 and intersex persons*. Retrieved November 2,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8/canada-commits-to-further-supporting-the-rights-of-lgbtq2-and-intersex-persons.html>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f, April). *Foreign Minister to attend meetings in Bangladesh on the Rohingya crisis*. Retrieved November 2,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4/foreign-minister-to-attend-meetings-in-bangladesh-on-the-rohingya-crisis.html>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g, February). *Speech by the Honourable Chrystia Freeland,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to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trieved November 3,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2/speech\\_by\\_the\\_honourablechrystiafreelandministerofforeignaffairs.html](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2/speech_by_the_honourablechrystiafreelandministerofforeignaffairs.html)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8h, March). *Statement by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8/03/statement-by-minister-of-foreign-affairs-on-international-womens-day.html>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a, March). *Statement by Foreign Affairs Minister on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9/03/statement-by-foreign-affairs-minister-on-international-womens-day.html>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b, June). *Statement to mark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Retrieved November 1, 2022, from: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19/06/statement-to-mark-international-day-for-the-elimination-of-sexual-violence-in-conflict.html>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c). *History of Global Affairs Canada*. Retrieved October 31,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gac-amc/history-histoire/index.aspx?lang=eng>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d, July). *Action Area Policies (Canada'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 Retrieved October 28,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fiap\\_action\\_areas-paif\\_champs\\_action.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fiap_action_areas-paif_champs_action.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19e, April). *Gender Analysis*. Retrieved October 28,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funding-financement/gender\\_analysis-analyse\\_comparative.aspx?lang=eng&\\_ga=2.50080614.196555518.1667023045-796851661.1666506659](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funding-financement/gender_analysis-analyse_comparative.aspx?lang=eng&_ga=2.50080614.196555518.1667023045-796851661.1666506659)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0a, January). *Partnership to fund gender equality and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and girls in Canada and abroad*. Retrieved October 28,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gac-amc/campaign-campagne/gender\\_equality-egalite\\_des\\_genres/index.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gac-amc/campaign-campagne/gender_equality-egalite_des_genres/index.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0b, November). *Women's Voice and Leadership Program*. Retrieved October 25,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ender\\_equality-egalite\\_des\\_genres/wvl\\_projects-projets\\_vlf.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ender_equality-egalite_des_genres/wvl_projects-projets_vlf.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0c). *Child, early and forced marriage*. Retrieved November 4,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human\\_rights-droits\\_homme/child\\_marriage-mariages\\_enfants.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human_rights-droits_homme/child_marriage-mariages_enfants.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a, April). *Legal instruments of gender equality*. Retrieved October 25, 2022, from: <https://women-gender-equality.canada.ca/en/transparency/laws-regulations/legal-instruments.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b).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Gender Equality Toolkit for Projects*. Retrieved Octo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funding-financement/gender\\_equality\\_toolkit-trousse\\_outils\\_egalite\\_genres.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funding-financement/gender_equality_toolkit-trousse_outils_egalite_genres.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1c, May).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 Indicators*. Retrieved October 28,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fiap\\_indicators-indicateurs\\_paif.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fiap_indicators-indicateurs_paif.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a, September). *Gender equality timeline*. Retrieved 15 May, 2023, from: <https://women-gender-equality.canada.ca/>



en/commemorations-celebrations/gender-equality-week/gender-equality-timeline.html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b, September). *About Global Affairs Canada*. Retrieved October 31,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global-affairs-affaires-mondiales/corporate-ministere/about-au-sujet.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c). *Raison d'être, mandate and role: who we are and what we do*. Retrieved October 31,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global-affairs-affaires-mondiales/corporate-ministere/mandat-mandat/index.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d, December). *Canada's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riorities*. Retrieved October 31,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index.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index.aspx?lang=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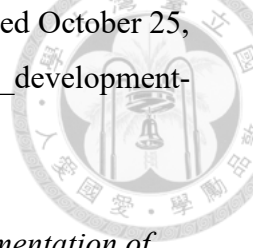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e, October). *Canada'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Retrieved Octo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fiap-paif.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priorities-priorites/fiap-paif.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f, December). *Small and medium organizations for impact and innovation*. Retrieved Octo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funding-financement/small\\_medium\\_organizations-petit\\_moyenne\\_organisation.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funding-financement/small_medium_organizations-petit_moyenne_organisation.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g).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rights of women and children*. Retrieved October 27,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lobal\\_health-sante\\_mondiale/improving\\_health-ameliorer\\_sante.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lobal_health-sante_mondiale/improving_health-ameliorer_sante.aspx?lang=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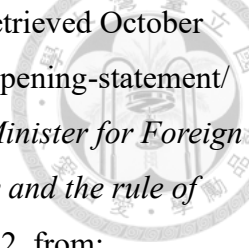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h, August).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ights*. Retrieved October 25,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lobal\\_health-sante\\_mondiale/reproductive-reproductifs.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lobal_health-sante_mondiale/reproductive-reproductifs.aspx?lang=eng)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i, June). *Elimi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 Retrieved October 25,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ender\\_equality-egalite\\_des\\_genres/violence\\_against\\_women-violence\\_contre\\_femmes.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ender_equality-egalite_des_genres/violence_against_women-violence_contre_femmes.aspx?lang=eng)

-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j).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Retrieved October 25, 2022,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pe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ender\\_equality-egalite\\_des\\_genres/women\\_peace\\_security-femmes\\_paix\\_securite.aspx?lang=eng](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world-monde/issues_developpement-enjeux_developpement/gender_equality-egalite_des_genres/women_peace_security-femmes_paix_securite.aspx?lang=eng)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k, July). *Global Affairs Canada implementation of Canada's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Retrieved March 3, 2023,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women-peace-security-femmes-paix-securite/2017-2022-implementation-plans-mise-oeuvre-gac-amc.aspx?lang=eng#a5\\_1\\_2](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women-peace-security-femmes-paix-securite/2017-2022-implementation-plans-mise-oeuvre-gac-amc.aspx?lang=eng#a5_1_2)
-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2l, July). *2020-2021 Global Affairs Canada departmental progress report for Canada's National Action Plan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from: [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women-peace-security-femmes-paix-securite/2020-2021-progress-reports-rapports-etapes-gac-amc.aspx?lang=eng#a4\\_2](https://www.international.gc.ca/transparency-transparence/women-peace-security-femmes-paix-securite/2020-2021-progress-reports-rapports-etapes-gac-amc.aspx?lang=eng#a4_2)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a, October). *Speech at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Sweden seminar ahead of United Nations Day*. Retrieved September 2,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4/10/speech-at-united-nations-association-of-sweden-seminar-ahead-of-united-nations-day/>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4b, November). *Speech by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rgot Wallström at the seminar about #femdefenders, arranged by Kvinna till Kvinna*. Retrieved October 12,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4/11/speech-by-the-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margot-wallstrom-at-the-seminar-about-femdefenders-arranged-by-kvinna-till-kvinna/>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a, September). *Planet 50-50 by 2030 step it up for gender Equality*.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22, from: <https://www.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Headquarters/Attachments/Initiatives/StepItUp/Commitments-Speeches/Sweden-StepItUp-CommitmentText-201509-en.pdf>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b, January). *HeForShe Ambassador Stefan Löfven*. Retrieved October 13,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articles/2015/01/heforshe-ambassador-stefan-lofven/>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c, January). *Speech at launch of UN Women "HeForShe IMPACT 10x10x10 Initiative"*. Retrieved October 6,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5/01/speech-at-launch-of-un->



- women-heforshe-impact-10x10x10-initiative/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d, June). *HeForShe launched in Sweden*. Retrieved October 6,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articles/2015/06/heforshe-launched-in-sweden/>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e, July). *Gender equality in health*. Retrieved October 6,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articles/2015/07/gender-equality-in-health/>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f, July). *Speech by Prime Minister Stefan Löfven at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Financing for gender equality – results and good practice*. Retrieved October 6,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5/07/financing-for-gender-equality--results-and-good-practices/>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g, September). *Global Leaders Meeting on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Empowerment – A Commitment to Action (UN Women)*. Retrieved October 7,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5/09/global-leaders-meeting-on-gender-equality-and-womens-empowerment--a-commitment-to-action-un-women/>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h, September). *Speech at Global Citizen Festival*. Retrieved October 5,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5/09/speech-at-global-citizen-festival/>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i, March). *The intended speech of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rgot Wallström at the meeting of the League of Arab States in Cairo 9*.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5/03/the-intended-speech-of-the-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margot-wallstrom-at-the-meeting-of-the-league-of-arab-states-in-cairo-9/>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j, July).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rgot Wallström at the Sciences Po joint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the Paris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PISA) and the Master in European Affairs Class of 2015, Pari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5/07/speech-by-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margot-wallstrom/>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k, October). *Opening Statement by Foreign*



*Minister Margot Wallström: "Syrian Women Peacebuilders"*. Retrieved October 12,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5/10/opening-statement/>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5f, December). *Speech by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in Lund, 11 December 2015: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 challenges in turbulent tim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5/12/speech-by-the-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in-lund-11-december-2015/>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6a, February). *Speech by Margot Wallström at the Meeting of the Small Group of the Global Coalition against Daesh*.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6/02/utrikesministern-till-mote-med-koalitionen-mot-daesh/>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6b, April).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at the Georgetown University's Institute for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6/04/speech-by-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at-the-georgetown-universitys-institute-for-women-peace-and-security/>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6c, May). *Speech by th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at A Call to Action for addressing Gender-based Violence in Emergencies*.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6/05/speech-by-the-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at-a-call-to-action-for-addressing-gender-based-violence-in-emergencies/>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7a, March). *Speech at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debate on Resolution 1325 on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7/10/speech-at-the-un-security-council-debate-on-resolution-1325-on-women-peace-and-security/>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7b, October).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rgot Wallström: How can we make our region more stable and secure?*.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7/10/speech-by-how-can-we-make-our-region-more-stable-and-secure/>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a). *Handbook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June 15, 2020,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4ae557/contentassets/fc115607a4ad4bca913cd8d11c2339dc/handbook---swedens-feminist-foreign-policy.pd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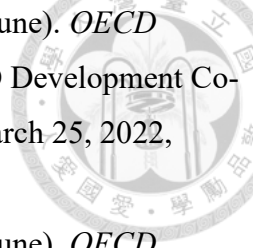
-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8b, March). *Speech b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rgot Wallström at #WikiGapSthlm at KTH Roy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trieved October 22,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18/03/speech-by-minister-for-foreign-affairs-margot-wallstrom-at-wikigapsthlm-at-kth-royal-institute-of-technology/>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19a). *The Swedish Foreign Service action plan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2019–2022, including direction and measures for 2021*.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0). *The Swedish Foreign Service action plan fo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2019–2022, including direction and measures for 2020*. Retrieved February 1, 2023,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499195/contentassets/2b694599415943ebb466af0f838da1fc/the-swedish-foreign-service-action-plan-for-feminist-foreign-policy-20192022-including-direction-and-measures-for-2020.pdf>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n.d.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Retrieved April 10, 2020, from: <http://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policy/multilateral-cooperation/>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n.d.b). *Objective of democracy policy and human rights*. Retrieved April 10, 2020, from: <http://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policy/democracy-and-human-rights/goals-and-visions/>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n.d.c). *The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ida)*.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government.se/government-agencies/the-swedish-international-development-cooperation-agency-sida/>
- Hermann, M. G. (2001). How Decision Units Shape Foreign Policy: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3(2), 47-81.
- Huang, Q. (2022). Anti-Feminism: four strategies for the demonisation and depoliticisation of feminism on Chinese social media.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16. DOI: 10.1080/14680777.2022.2129412
- Hudson, V. M., Caprioli, M., Ballif-Spanvill, B., McDermot, R., & Emmett, C. F. (2008/09). The Heart of the Matter: The Security of Women and the Security of States. *Quarterly Journ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3(3). 7-45.
- Hydén, T. (2019).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llustrated. *Turkish Policy Quarterly*, 18(1), 11–18. Retrieved April 10, 2020, from:



- [http://turkishpolicy.com/files/articlepdf/swedensfeminist-foreign-policyillustrated\\_en\\_5255.pdf](http://turkishpolicy.com/files/articlepdf/swedensfeminist-foreign-policyillustrated_en_5255.pdf).
-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re. (n.d.). *SheTrades*. Retrieved February 2, 2023, from: <https://www.shetrades.com/>
- Jane Goodall Institute of Canada. (n.d.). *About*.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from: <https://janegoodall.ca/about/>
- Jordaan, E. (2003). The concept of a middl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tinguishing between emerging and traditional middle powers. *Politikon*, 30(1), 165-181. DOI: 10.1080/0258934032000147282
- Kantola, J., & Squires, J. (2012). From state feminism to market femin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33(4), 382–400.
- Karim, S., & Beardsley, K. (2016). Explaining sexual exploitation and abuse in peacekeeping missions: The role of female peacekeepers and gender equality in contribut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3(1), 100–115. <https://doi.org/10.1177/0022343315615506>.
- Keating, T. (2001). *Canada and World Order: The Multilateralist Tradition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issinger, H. A. (1966). Domestic Structure and Foreign Policy. *Daedalus*, 95(2), 503-529.
- Kouvo, S. (2019). A Challenging Agenda for Troubled Times: The Swedish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Retfærd*, 4, 65-88.
- Kuisma, M. (2007). Social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Welfare State After the ‘Golden Age.’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42(1), 9–26. <https://doi.org/10.1177/0010836707073474>
- Lalancette, M., & Raynauld, V. (2019). The Power of Political Image: Justin Trudeau, Instagram, and Celebrity Politics.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63(7), 888–924.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217744838>
- Leblond, P., & Fabian, J. (2017). *Modernizing NAFTA: A New Deal for the North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IGI Paper 123. Retrieved April 4, 2020, from: [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modernizing-nafta-new-deal-north-american-economy-twenty-first-century](http://www.cigionline.org/publications/modernizing-nafta-new-deal-north-american-economy-twenty-first-century).
- Lee, D. (2018). *What i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of Canada's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 University of Ottawa.

- 
- Lee, S. (2002). Canadian values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10(1), 1-9. DOI: 10.1080/11926422.2002.9673303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2021, April). *Constitution*. Retrieved October 24,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wp-content/uploads/sites/292/2021/04/The-Constitution-of-the-Liberal-Party-of-Canada.pdf>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a). *Liberal*. Retrieved October 23,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legacy-uploads/wp-content/uploads/2012/12/LPC-mission.vision.values\\_web.pdf](https://liberal.ca/legacy-uploads/wp-content/uploads/2012/12/LPC-mission.vision.values_web.pdf)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b). *Gender and Diversity Impact Summary: A Stronger Canada*.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gender-and-diversity-impact-summary-a-stronger-canada/>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c). *Help for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People*. Retrieved October 25,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help-for-the-worlds-most-vulnerable-people/>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d). *Promoting Democracy and Human Rights*. Retrieved October 22,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promoting-democracy-and-human-rights/>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e). *Gender and Diversity Impact Summary: An Equal Canada, For Everyone*. Retrieved October 23,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gender-and-diversity-impact-summary-an-equal-canada-for-everyone/>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f). *Gender and Diversity Impact Summary: Building a Better Canada, For Everyone*.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gender-and-diversity-impact-summary-building-a-better-canada-for-everyone/>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g). *Gender and Diversity Impact Summary: A More Resilient Economy*.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gender-and-diversity-impact-summary-a-more-resilient-economy/>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h). *Women in the Economy*.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women-in-the-economy/>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i). *Free Menstrual Products*.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free-menstrual-products/>
-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n.d.j). *Making Workplaces Fairer, For Everyone*.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2, from: <https://liberal.ca/our-platform/making-workplaces-fairer->

- for-everyone/
- Lunz, K., & Bernarding, N. (2019, February).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 imperative for a more secure and just world*. HEINRICH BÖLL STIFTUNG. Retrieved October 16, 2022, from: <https://eu.boell.org/en/2019/02/13/feminist-foreign-policy-imperative-more-secure-and-just-world>
- Mason, C. L. (2019). Buzzwords and fuzzwords: flattening intersectionality in Canadian ai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25(2), 203-219. DOI: 10.1080/11926422.2019.1592002
- Mies, M. & Shiva, V. (1993). *Ecofeminism*. London: Zed Books.
-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2013). *Partiprogram*.
-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a). *Politik som gör skillnad*. Retrieved October 13, 2022, from: <https://www.mp.se/politik/>
-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b). *Ju starkare vi blir, desto mer kan vi uträtta*. Retrieved October 13, 2022, from: <https://www.mp.se/om/>
-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c). *Feministisk utrikespolitik för klimat, fred och Demokrati*. Retrieved October 13, 2022, from: <https://www.mp.se/politik/utrikespolitik-och-global-rattvisa/>
-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d). *Sverige ska stå upp för fred, demokrati och global rättvisa*. Retrieved October 12, 2022, from: <https://www.mp.se/politik/bistand/>
-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e). *Människan*. Retrieved October 13, 2022, from: <https://www.mp.se/om/partiprogram/manniskan/>
-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f). *Ett samhälle fritt från diskriminering*. Retrieved October 13, 2022, from: <https://www.mp.se/politik/diskriminering/>
- Miljöpartiet de gröna. (n.d.g). *Feminismen måste gå längre*. Retrieved October 13, 2022, from: <https://www.mp.se/politik/jamstalldhet/>
- Milner, H. (1997). *Interest, Institutions, and Information: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Moravesik, A. (1991).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5(1), 19-56.
- Nylund, M.-L., Håkansson, S., & Bjarnegård, E. (2022). The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 of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Sweden. *Journal of Women, Politics & Policy*, 0(0), pages 1-17.

-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4, June).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eer Reviews: Sweden 2013*.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eer Reviews, OECD Publishing, Paris. Retrieved March 25, 2022, from: <https://doi.org/10.1787/9789264196254-en>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19, June). *OEC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eer Reviews SWEDEN 2019*. Retrieved March 25, 2022, from: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9f83244b-en.pdf?expires=1679843145&id=id&accname=ocid53016431a&checksum=8ECB ECD5B908D8F9417414B4F1D577D4>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1, June). *A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to advance gender equality globally*.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oecd.org/development-cooperation-learning/practices/a-feminist-foreign-policy-to-advance-gender-equality-globally-d3b5aeab/>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n.d.).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Gender Index 2023*. Retrieved July 6, 2023 from: <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SIGI2023#>
- Our World in Data. (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Retrieved May 15, 2023, from: <https://ourworldindata.org/grapher/recent-ILO-LFP?tab=table&time=1990..2021&facet=none>
- O' Reilly, M., Súilleabháin, A. Ó., & Paffenholz, T. (2015). *Reimagining Peacemaking: EWomen's Roles in Peace Processes*. 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 Retrieved April 13, 2020, from: <https://www.ipinst.org/wp-content/uploads/2015/06/IPI-E-pub-Reimagining-Peacemaking.pdf>
- Østergård, U. (1997). *The Geopolitics of Nordic Identity – From Composite States to Nations-states*. Copenhagen: Da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 Park, S. N. (2021, June). *Why So Many Young Men in South Korea Hate Feminism*.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July 15, 2023, from: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6/23/young-south-korean-men-hate-liberals-feminists/>
- Parisi, L. (2020). Canada's New 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 Business as Usual?.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18. doi: 10.1093/fpa/orz027
-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6a, March). *Prime Minister Trudeau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2016 Catalyst Awards Dinner in New York City*.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2, from: <https://pm.gc.ca/en/videos/2016/03/16/prime-minister-trudeau-delivers->



remarks-2016-catalyst-awards-dinner-new-york-city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6b, September). *Prime Minister Trudeau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ONE Campaign Town Hall with Bono*.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2, from: <https://pm.gc.ca/en/videos/2016/09/17/prime-minister-trudeau-delivers-remarks-one-campaign-town-hall-bono>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a, September). *Prime Minister concludes successful week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trieved October 22,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news-releases/2017/09/21/prime-minister-concludes-successful-week-united-nations-general>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b, July). *Prime Minister announces support for women entrepreneur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Retrieved October 22,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news-releases/2017/07/08/prime-minister-announces-support-women-entrepreneurs-developing>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7c, October).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Women's History Month*. Retrieved October 22,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statements/2017/10/01/statement-prime-minister-womens-history-month>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a, February).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Week*. Retrieved October 22,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statements/2018/02/04/statement-prime-minister-international-development-week>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b, March). *Prime Minister Trudeau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Equal Voice International Women's Day event*.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2, from: <https://pm.gc.ca/en/videos/2018/03/08/prime-minister-trudeau-delivers-remarks-equal-voice-international-womens-day>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c, April).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gender equality as top priority of Canada's G7 Presidency*.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statements/2018/04/26/statement-prime-minister-gender-equality-top-priority-canadas-g7>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d, May).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women winning the right to vote in federal elections*.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statements/2018/05/24/>

- 
- statement-prime-minister-100th-anniversary-women-winning-right-vote
-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e, October).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statements/2018/10/17/statement-prime-minister-international-day-eradication-poverty>
-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f, May). *Canada's strategy to respond to Rohingya crisis*. Retrieved October 22,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news-releases/2018/05/23/canadas-strategy-respond-rohingya-crisis>
-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g, August). *Statement by the Prime Minister on World Humanitarian Day*. Retrieved October 22,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statements/2018/08/19/statement-prime-minister-world-humanitarian-day>
-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18h, January). *Prime Minister announces funding for the Global Partnership for Education*.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2, from: <https://pm.gc.ca/en/news/news-releases/2018/01/25/prime-minister-announces-funding-global-partnership-education>
- 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2021, December). *The Honourable Chrystia Freeland*. Retrieved October 25, 2022, from: <https://pm.gc.ca/en/cabinet/honourable-chrystia-freeland>
- Rayside, D. (2022, September).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Britannica. Retrieved October 26, 2022, 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Liberal-Party-of-Canada>
- Raaum, N. C. (2005) Gender equality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 nordic comparison.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8(4), 872-897.  
DOI:10.1080/01402380500217003
- Robinson, P. (2008). The role of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In Smith S. *et al.* (Eds.),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Actors, Cas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amond, A. B. (2020). Swedish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nd “Gender Cosmopolitanism”.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6(2), 217-235.  
<https://doi.org/10.1093/fpa/orz025>
- Rosenau, J. N. (1971).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Free Press.
- Sanders, R., & Jenkins, L. (2022). Special issue introducti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anti-feminism.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 11(3), 369-378.  
doi:10.1017/S2045381722000144
- Sainsbury, D. (2004). Women's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Sweden: Discursive

- 
-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al Presenc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7(1), 65 - 87.
- Skjelsbæk, I., & Tryggestad, T. L. (2020). Pro-gender Norms in Norwegian Peace Engagement: Balancing Experiences, Values, and Interest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16(2), 181-198. DOI: 10.1093/fpa/orz028.
- Smith, H. A. (2003). Disrupting Internationalism and Finding the Others. In Sjolander, C. T., Smith, H. A., & Stienstra, D. (Eds)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24–39. Don Mills, ON, Canad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ocialdemokraterna. (2013). *ETT PROGRAM FÖR FÖRÄNDRING*. Retrieved September 19,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download/18.12ce554f16be946d04640b87/1568881590520/ett-program-for-forandring\\_2013.pdf](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download/18.12ce554f16be946d04640b87/1568881590520/ett-program-for-forandring_2013.pdf)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a, June). *Våra Värderingar*. Retrieved September 22,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t-parti/om-partiet/vara-varderingar>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b, September). *Ideologi - den demokratiska socialisten*. Retrieved September 22,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t-parti/om-partiet/ideologi>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c, June). *Partiprogram och riktlinjer*. Retrieved September 23,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politik/partiprogram-och-riktlinjer>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d, August). *Feministisk utrikespolitik*. Retrieved September 21,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politik/a-till-o/feministisk-utrikespolitik>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e, September). *Säkerhetspolitik*. Retrieved September 24,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politik/a-till-o/sakerhetspolitik>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f, August). *Feminism och jämställdhe*. Retrieved September 20,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politik/a-till-o/feminism>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g, September). *Så stoppar vi mäns våld mot kvinnor*. Retrieved September 23,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politik/bekampa-kriminaliteten-och-bryt-segregationen/vald-mot-kvinnor>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h, August). *Abort*. Retrieved September 24,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politik/a-till-o/abort>
- Socialdemokraterna, (2022i, August). *HBTQ+frågor*. Retrieved September 24, 2022, from: <https://www.socialdemokraterna.se/var-politik/a-till-o/hbtq-fragor>

- 
- Stetson, D. M. & Mazur, A. (1995). *Comparative state feminism*.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Stupp, C. (2017). *Sweden pushes gender equality onto Rome agenda*. EURACTIV. Retrieved October 6, 2022, from: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economy-jobs/news/sweden-pushes-gender-equality-onto-rome-agenda/>
- Sundström, M. R., & Elgström, O. (2019). Praise or critique?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 the eyes of its fellow EU members,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21(4), 418-433. DOI: 10.1080/23745118.2019.1661940
- Sveriges Radio. (2013). *Omar Mustafa to leave role as head of Islamic group?*. Sveriges Radio. Retrieved February 3, 2023, from: <https://sverigesradio.se/artikel/5504206>
- Sveriges Riksdag. (2022, April). *Ett särskilt brott för hedersförtryck*. Retrieved May 3, 2023, from: [https://www.riksdagen.se/sv/dokument-lagar/arende/betankande/ett-sarskilt-brott-for-hedersfortryck\\_H901JuU17](https://www.riksdagen.se/sv/dokument-lagar/arende/betankande/ett-sarskilt-brott-for-hedersfortryck_H901JuU17)
- Sweden Sverige. (n.d.). *Equal power and influence for women and men – that's what Sweden is aiming for*. Retrieved May 12, 2023, from: <https://sweden.se/life/equality/gender-equality>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13, March). *Fred och säkerhet*. Retrieved January 4, 2023,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30327223020/http://www.sida.se/Svenska/Om-oss/Vara-amnesomraden/Mansklig-sakerhet/>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17, October). *Mainstreaming gender equality and women's rights. Sweden'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http://www.sida.se/English/publications/Publication\\_database/publications-by-year1/2017/october/mainstreaming-gender-equality-and-womens-rights/](http://www.sida.se/English/publications/Publication_database/publications-by-year1/2017/october/mainstreaming-gender-equality-and-womens-rights/) (Retrieved from Nylund, M.-L. (2017). *A fully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 A postcolonial feminist analysis of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Dissertation). Retrieved October 4, 2022, from: <http://urn.kb.se/resolve?urn=urn:nbn:se:uu:diva-339481>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0a, December). *Finansiering av biståndet*. Retrieved March 25, 2023,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01219210108/https://www.sida.se/sa-fungerar->

- 
- bistandet/finansiering/.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0b). *Sidas årsredovisning 2020*. Retrieved March 25, 2023, from: <https://cdn.sida.se/publications/files/-sidas-arsredovisning-2020.pdf>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0c). *Sida's work for Gender Equality*. Retrieved January 18, 2023, from: <https://cdn.sida.se/publications/files/sida662353en-sidas-work-for-gender-equality.pdf>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0d). *Resultat av svenskt bistånd 2019*.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sa-fungerar-bistandet/sa-har-mater-sida-resultat/resultat-av-svenskt-bistand-2019>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1a, October). *Multilateral organisations*.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en/for-partners/multilateral-organisations>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1b, November). *Prioriteringar i biståndet*.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sa-fungerar-bistandet/prioriteringar-i-bistandet>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1c, September). *Syftet med biståndet*.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sa-fungerar-bistandet/syftet-med-bistandet>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1d, December). *Två sorters bistånd*.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sa-fungerar-bistandet/tva-sorters-bistand>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1e). *Peace and conflict toolbox*.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en/for-partners/methods-materials/peace-and-conflict-toolbox/>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1f). *Portfolio Overview 2021: Gender Equality. pp1-2*. Retrieved December 22, 2022, from: <https://cdn.sida.se/app/uploads/2022/03/31133549/Summary-Portfolio-Overview.pdf>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2, October). *Gender Equality*.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en/sidas-international-work/thematic-areas/gender-equality>
-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2023, February). *Så styrs*

- Sida*.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om-sida/sa-styrs-sida/>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n.d.). *Tillsammans bidrar vi till en bättre värld*. Retrieved October 15, 2022, from: <https://www.sida.se/> Swedish Gender Equality Agency. (n.d.). *Gender Equality Policy in Sweden*. Retrieved May 12, 2023, from: <https://swedishgenderequalityagency.se/gender-equality-in-sweden/#:~:text=1979%20The%20Gender%20Equality%20Act&text=Men%20and%20women%20were%20formally,The%20law%20is%20gender%20neutral>
- Swiss, L., & Barry, J. (2017). Did Changes in Official Language Lead to Spending Shifts? In Tiessen, R., & Baranyi, S. (Eds), *Obligations and Omissions: Canada's Ambiguous Actions on Gender Equality*, 23–48. 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 The equality effect - e<sup>2</sup>. (n.d.). *the equality effect - e2*. Retrieved March, 20, 2023, from: <http://thequalityeffect.org/>
- The World Bank. (n.d.). *Proportion of seats held by women in national parliaments (%)*. Retrieved May 12, 2023, from: <https://gender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sg-gen-parl-zs/?view=bar>
- Thompson, A. (2020, August). *Chrystia Freeland*. The Canadian Encyclopedia. Retrieved November 12, 2022, from: <https://www.thecanadianencyclopedia.ca/en/article/chrystia-freeland>
- Thompson, L., & Clement, R. (2019). Defining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1-8. Retrieved April 10, 2020, from: <https://www.icrw.org/wp-content/uploads/2019/03/Defining-Feminist-Foreign-Policy-Brief-revised.pdf>
- Thompson, L. (2020).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 Framework*.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Research on Women.
- Thomson, J. (2020a). What's Feminist about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Sweden's and Canada's Foreign Policy Agendas. *International Studies Perspectives*, 21(3), 424-437. DOI: <https://doi.org/10.1093/isp/ekz032>.
- Thomson, J. (2020b). The Growth of Feminist (?) Foreign Policy. Retrieved January 18, 2021, from: <https://www.e-ir.info/2020/02/10/the-growth-of-feminist-foreign-policy/>
- Tiessen, R. (2015). Gender essentialism in Canadian foreign aid commitments to women, peace, and secur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70(1), 84-100.

- 
- Tiessen, R., & Carrier K. (2015). The erasure of “gender”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Harper conservativ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iscursive shift from “gender equality” to “equality between women and me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21(2), 95-111.
- Tiessen, R., & Swan, E. (2018). Canada’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Promises: An Ambitious Agenda for Gender Equality, Human Rights, Peace, and Security. In: Hillmer, N., Lagassé, P. (Eds) *Justin Trudeau and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Canada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187-205.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319-73860-4\\_10](https://doi.org/10.1007/978-3-319-73860-4_10)
- Tiessen, R., & Smith, H.A. (2021). Canada’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Under the Harper Conservatives (2006–2015) and Trudeau Liberals (2015–2019) in Global Perspective. In: Murray, R.W., & Gecelovsky, P.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anada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anada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algrave Macmillan, Cham.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7770-1\\_6](https://doi.org/10.1007/978-3-030-67770-1_6)
- Trudeau, J. (2014). *Common Ground*. HarperCollins.
- United Nations Women. (2022, September).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An Introduction*. Retrieved December 14, 2022, from: [https://www.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Brief-Feminist-foreign-policies-en\\_0.pdf](https://www.unwomen.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9/Brief-Feminist-foreign-policies-en_0.pdf)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17, March). *Speech of Stefan Löfven, Prime Minister of Sweden at the Global Launch of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16*. Retrieved October 5, 2022, from: <https://hdr.undp.org/content/speech-stefan-lofven-prime-minister-sweden-global-launch-human-development-report-2016>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n.d.). *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 Retrieved December 28, 2022, from: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thematic-composite-indices/gender-inequality-index#/indicies/GII>
- United Nations. (n.d.a). *Office of the Special Representative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Sexual Violence in Conflict*. Retrieved July 6, 2023, from: <https://www.un.org/sexualviolenceinconflict/>
- United Nations. (n.d.b).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irst Committee)*. Retrieved July 10, 2023, from: <https://www.un.org/en/ga/first/>
-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021). *Sweden as a Donor*. Retrieved March 27, 2023, from: <https://web.archive.org/web/20211026015645/https://www.unhcr.org/neu/swedish-government>

- 
- Velke, M. (2018). *Sveriges feministiska inrikespolitik : En granskande studie om den jämställdhetspolitik som regering Löfven bedrivit under mandatperioden 2014-2018*. (Dissert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urn.kb.se/resolve?urn=urn:nbn:se:lnu:diva-75006>
- Verezhak, V. (2022). Implementation of Sweden's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Reality of Politics*, 21(3), 150-170.
- Wallenfeldt, J. (2022a, July). Stefan Löfve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October 11, 2022, 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Stefan-Lofven>
- Wallenfeldt, J. (2022b, September). *Justin Trudeau*. Britannica. Retrieved October 24, 2022, 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Justin-Trudeau>
- Wallström, M. (2010). A Womanly Virtue: Female Representation as Global Security Strateg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32(1), 30–34. <http://www.jstor.org/stable/42772665>
- Wallström, M. (2012). Introduction: making the link between transitional justice and conflict-related sexual violence. *William & Mary Journal of Women and the Law*, 19(1),1-6.
- Woetzel, J., Madgavkar, J., Ellingrud, K., Labaye, E., Devillard, S., Kutcher, E., Manyika, J., Dobbs, R., & Krishnan, M. (2015). *How advancing women's equality can add \$12 trillion to global growth*.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trieved April 13, 2020, from: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employment-and-growth/how-advancing-womens-equality-can-add-12-trillion-to-global-growth>
- World Economic Forum. (2021).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Retrieved May 10, 2023, from: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GGR\\_2021.pdf?\\_gl=1\\*dgdija\\*\\_up\\*MQ.&gclid=CjwKCAjwg-GjBhBnEiwAMUvNW7yJ47xS8IJAZFp7pn77\\_0f1M6n6T0yh7uEHe7dI2hoXIehrE1HRPxoC3FkQAvD\\_BwE](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GGGR_2021.pdf?_gl=1*dgdija*_up*MQ.&gclid=CjwKCAjwg-GjBhBnEiwAMUvNW7yJ47xS8IJAZFp7pn77_0f1M6n6T0yh7uEHe7dI2hoXIehrE1HRPxoC3FkQAvD_BwE)
- World Economic Forum. (n.d.). *Chrystia Freeland*. Retrieved October 31, 2022, from: <https://www.weforum.org/people/chrystia-freeland>